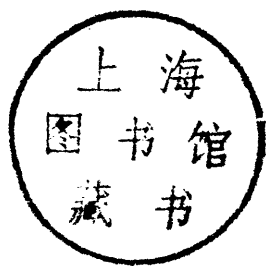


藝文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 蘇俄的婦女

澤息卡斯密司著

孫亮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178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七 月 付 印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八 月 出 版

版 權 所 有

每 冊 定 價 大 洋 一 元 三 角

外 埠 加 郵 費 一 成



# 目 錄

王格爾德蘇俄研究叢書總序

譯者序言

- 第一章 舊日的生活
- 第二章 婦工
- 第三章 鄉村的婦女
- 第四章 婦女參與公共生活
- 第五章 婦女和教育
- 第六章 新舊家庭的過渡
- 第七章 婚姻法的制定
- 第八章 革命的道德
- 第九章 住所的設計
- 第十章 母親和嬰孩
- 第十一章 人民的治食工作
- 第十二章 將來社會的建設

~~230276~~

## 王格爾德蘇俄研究叢書總序

俄國革命將我們這飽受戰爭流毒的世界給唬毀了；將在這二十世紀當中的一個很冒險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大試驗給開始實行了。牠所直接影響到的區域非常廣袤；牠所創始的轉變非常激烈；而牠對於全世界的國際關係的已往的和未來的影響則更不可衡量。單就這幾方面看來，我們已經可以說：牠——無論是好是壞——總算是近世史內最偉大的一件史績。好些的美國人

都在忘記：在列寧和他的共產黨徒奪得政權之後，我們又度過了十年。很急激的革命的改弦更張期業已過去。現在蘇俄所正在慘淡經營的便是要來一步一步按步就班地建設一些事業——一些和我們的完全不同的事業，一些很奇特的事業，一些前程杳茫不可預測的事業。

自從建國以來，我們美國便是一個諸多發現的場所。不只是在科學的範疇內，我們有我們的發明；即北極和那素無人知的新大陸也是我們發現的。在這方面，我們實在犧牲過不少的生命，不少的金錢。但是到了今日，我們對於那個面積約佔全世界總面積六分之一的大國却不能得有相當的了解，却只是一味懵然。我們和蘇俄只隔着一個大西洋；而我們對於她的偏見，誤解，以及胡亂的宣傳却和這個大西洋等其深。我們對於蘇俄還是如各國政府設法防疫一般地遇事多方窒塞。這樣帶來的結果無池；只是糊塗，只是無知。即我們的最高的政府人員之一對於這種糊塗這種無知也會老實不客氣地公開承認。格利推事(Tudg Gray)在他的一個

判詞上說：「對於一切的蘇俄的現存情形，我也是和其他的美國人并無兩樣地什麼也不懂。」

每個科學家都相信：「糊塗」是世界上的最危險的勢力之一。所以我們對於蘇俄，無論她的制度怎樣壞或怎樣好，我們總要知個究竟。我們現在所能聽到的只是一些道塗說的消息，和荒無實據的宣傳。

在已往的十年當中，蘇俄政府業經飽受擲揄，飽受離間；甚而至於有些嫻於詞令的演講家們竟想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的方法，用幾句動人聽聞的言詞便把蘇俄給很輕倩地帶到棺材裡去。但就實事觀察起來，則蘇俄并不因此而中天；而反更如蒸蒸日上地進入富強之域。她的國勢較之以往還強；她的領袖的指導任期較之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內閣都久遠。現在我們用科學方法和無偏無黨的精神來考究蘇俄的時期，業已成熟了！我們對她摒棄一切的恣口慢罵的言詞和根本動搖的輕信的時期業已成熟了！現在蘇俄成立業已十年，而我們對她還是不能得有什麼真的發現。我們深信：世界上的人類們絕對不會永遠地是這樣糊塗的。

無論我們把共產黨們看做社會的公敵，或是人類的救主，在我們對於他們未下判語之前，我們總得把一般和他們有關係的事實考究一下。無論我們對於他們的判語是怎樣，我們總得承認：他們正在從事於一個新的政治統御工具的創製。他們的這種創製的試驗應該受有科學方法的考察，而不應受有含有敵意的軍隊的光臨；應該受有帶有理性的批評，而不應該受有無理取鬧的謾罵。

在已往的時候，我們國內充滿了種種關於蘇俄的風傳，所以羅斯博士 (Dr. F. Ross) 在他的一本關於蘇俄的著作中，居然寫出了下面的一句話來：「我這本書是專為那些對於一切關於蘇俄的惡宣傳業已厭業的美國同胞們作的，」在這本書的毒氣戰 (Poison Gas Attack) 一章內，他指出了四十九件摸風捕影的虛傳，而逐一加以糾正。其他的作家也作有同樣的論調。紐約世界 (The New York World) 的編輯華爾特，立曼 (Walter Lippman) 曾把蘇俄革命時代的載在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的俄國消息加以整理。他發

現出不少的與事實遠不相符的風說來。即以那些存心以誠摯的態度來考究蘇俄的作品而論，他們當中還是充滿了缺欠。牠們不是失之於太籠統；便是失之於雖屬對於某事特多論究，而仍言之不詳，所以都沒有什麼壽世的價值。總而言之，大多數的作家都只是在俄國住不上幾個禮拜；而同時他們的自身還不懂得俄文。以這些人去作觀察的工作，自然是可靠極也有限的了。

本叢書——王格爾德蘇俄研究叢書 (Vanguard Studies of Soviet Russia)——的目的便是要來把一些關乎蘇俄的各種重要部份的可靠的精確的消息傳遞給大家。我們業已竭盡力之所能把牠們弄到至精至微之處。在我們選派各書的作家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得着那些在某一方面曾經得有特殊的經驗，或受有特殊的訓練，因而成爲萬人共仰的專家的人們來擔任我們的工作。現在我們所能得到的本叢書的作家幸而只有下列的兩種人：(一)久居蘇俄，連作品也是在這兒寫成的；(二)爲著述本叢書而特地兒跑到那兒去，作一種特殊的觀察。我們曾經用盡種種方法，把這部叢書弄成一部

包羅萬象——自然是專就蘇俄而言——的鉅著；而其中的某一冊則只討論某一方面的問題。人們研究問題，總是不厭精詳；而所需要的讀物必定要是筆墨漂亮堪以入目的讀物，那末，他們頂好是求之於本叢書了。本叢書所研究的上自政府的組織，下至學校的編制，無不俱包并俱，鉅細不遺。所研究的範圍既廣，則其中犯複之處自所難免。但這種犯複不獨無傷大雅，而且亦為我們所正需求，因為各個作家的治學方法不同，而他們從同一的實據當中所引伸出來的結論也就自難一致，「見智見仁」也自足人翫味。此外各家互相矛盾的地方，雖則為量不多；而我們也必力為保存，以期不泯真相。總之，各家的所見所聞如盡一致，則牠們的可靠程度自屬甚高，如不相同，則讀者諸君正可藉此而較量異同，細心考察，兩者俱有牠們的價值在。

在另一方面，我們并未敢奢望：一些的無理取鬧的惡宣傳不來和我們搗亂，致使真假混淆，分辨不易。但是我們至少也敢大胆地說：在美國內，甚而至於在全世界內，據我們所能知道的，并未曾有過像我們這次那些多

的專家曾經作過像我們這次那種大規模的對俄考察的工作。除非別人家也曾下過這種的苦工，而同時所得的結果又復和我們所得的大相矛盾，則他實在不配批評本叢書。就令這些假設通通存在，而我們當中的爭議也只有「時間」能夠作我們的評判員。換一句話，世界上基本上就沒有一個專家曾經採取過一種誠摯的態度，去對於這個共產主義在人類有史以來第一遭破天荒大試驗，加以細心的考察——即錯誤的考察也沒有。

我們這部叢書不但載有很有價值的事實；而牠的自身的價值恐怕也要是長垂不朽的。我們相信：未來的歷史家假如要對蘇俄革命後的騷動加以研究，則他絕不會把這部叢書束之高閣而不一來問津。蘇俄的新政制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最殘酷最好殺的獨裁政制嗎？蘇俄的新政制是建樹一個以工業的「德模克拉西」為基礎的新世界的第一步企圖嗎？我們絕不敢輕易胡作定評；但我們對於這些史蹟却會詳加敘述，詳加描寫。

最後，我謹向諸位作家致謝，因為他們曾經不辭勞苦地找出一些事實的真相來；而同時更不惜將牠獻到



社會上去；向那些曾經幫忙過我們製成這部叢書的朋友們致謝，向一切的那些曾經或用體力或用腦力來幫忙我們印成這部叢書的朋友們致謝。

哲羅姆·大衛斯 (Terome Davis) 序於  
耶路大學 (Yole University)。

(這是胡慶育君的譯文，錄自他所譯的蘇俄政治之現況——太平洋書店出版)

## 譯者序言

我們敢說在帝國主義者與被壓迫民族之間，和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很顯明地我們都可以找着一道鴻溝——這道鴻溝不但使他們不能彼此真正地合作，而且這一小部分的人們竟用各種的方法力圖永遠能夠壓制這大部分的人們使後者不能翻身才心滿意足。在這個宇宙裡，好像再沒有別的不平等，別的鴻溝了。但是，事實是這樣告訴我們嗎？今日的婦女是和男子完全平

等嗎？如果不是的，那末，豈不是我們在前述之外，又尋得一道鴻溝？雖然，前述的兩種階級的鬥爭是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而這兩性中的差別是以同數的人壓制同數人，雖然，前述的兩種階級的鴻溝難於填平劃一，而這兩性中的較比容易，但是，若是沒有人去提倡——不但提倡而且實地地去做——男女平等的工作，牠——這道鴻溝——會自然消滅嗎？我敢信男女各方的平等足以幫助解決前述的兩種鬥爭，並且增加我們的力量去打倒帝國主義。

我們中國現在真是萬幸地得見革命的告一段落了。在這一一切的新建設，新計劃上，是否對於婦女問題也注意了？我們中國現在也常聽見「婦女平等」的呼聲了，但是她們有無具體的辦法，具體的工作大綱？我們知道蘇俄在革命後，在各方的制度都改革了，他們尤其注重婦女的問題，組織了許多的機關去做這種的工作；他們也得到相當的成績。我們現在對於這一方的工作上不是很好參考參考人家的過程嗎？我們不是要把人家的一舉一動都奉為金科玉律，不可改變的圭臬，而

是要放大眼光去看看甚麼是可採的，甚麼是不可採或是應當及早避免的。

本書的著者在某章裏說：「好像是我儘根據他們自己的觀察赤裸裸地貢獻給讀者諸君，而自己的意見不會參加多少。」後面她又表示自己不敢自信的話，所以處處我們都看見她把她親眼看見親耳聽見的事實與談話活跳跳地寫出來，因為她恐怕——深深地懼怕——把俄國的實情看錯了。著者又將她所得的一點一片的事實連串起來再把她們分開若干章使讀者諸君易於明瞭，同時又不致感覺這些事實的乾燥無味。讀者諸君在這裏不但能夠對於關於在俄國婦女的問題和牠的連帶問題，例如治食問題和嬰兒撫育問題等等，得悉其梗概，而且還能在讀完之後得到一些旁的印像。

譯者疎懶成性，竟能在課餘把這本小書翻完，也算不易；不過時間太倉卒，還未經仔細的校閱，就拿去付印，內中的毛病一定不免，譯者敢不冒昧地請求諸君的指教。

最末，我要對那兩位幫我忙的先生致謝，他們是我

的好朋友：胡君慶育與韓君慶濂。

譯者識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號，上海。

## 第一章

# 舊日的生活

由家至國，所有能解除婦女在各方差別的告示和法律，都已在蘇俄實行了。第一次頒布的命令就解明結婚爲一可任意結合與解散的聯合，國家對牠的唯一事務就是保險給與孩童相當的照料和供養；承認母職爲一社會職守，須受政府的保護與賜給；取消未婚父母

的私生的污辱；建設「等工等酬」的原理；並給婦女以公民的完全的權利和義務。

但立法不能在十年之中，就滌洗這好些世紀積下來的偏見。祇有經驗與教育的背景，才能發達思想的和行爲的新習慣。

一位昭著的共產黨員名雅盧斯拉夫斯基 (Yaroslavsky) 的，曾這樣寫：「草製良善的法律是一件事，增進實在的情形使那些法律發生效力，又是一件事。在這裏我們須老實不客氣地說：要是我們的生活缺少一整個的激烈新建設，我們必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在激烈的新建設正在進行中，要給一清楚的今日俄國的家庭寫真，實屬難事；在未經審查改變中的家庭關係，是完全不能見出婦女的新身分的。但無論其爲何種形式，必須等到新世代教育出來，等到頑舊的私見與陳垢一併掃除乾淨，等到新屋，新組織業已成立，新家庭才能得到相當的效果。現在所能見着的無非是些可能，趨勢，與始點。

關於家庭生活而在一切革命成功當中之最要的是

給婦女，無論其為妻，為母與為公民，完全的平等。使她享受這種平等的方法便是讓她認識下列的兩種事實：(一)「平等」的意義，(二)把她們細綁在家裏作工的舊的社會力量的意義。

在過去程中，使多數家庭結合在一起的要素有二：(一)是為妻者與孩童對於丈夫與父親的經濟倚靠，(二)是家庭中其他人物對於婦女的倚靠，例如食物和衣服的預備以及他項在日常生活當中的事務，現在這些倚靠都已解去了。男子和妻子是彼此經濟獨立的，並互擔兒童供養之責；同時公共的家，白晝的育嬰房，公共的飯廳和洗衣房都漸漸代替婦女的地位，管理日常生活的瑣細。

在西方各國，婦女獲得的政治上之權利，祇給她們一架兵器去為社會的和經濟的解放奮鬥得更有力些。經濟權利乃是最重要的權利。缺少了牠，其他的一切權利都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她們却把牠看為最後一項。但在蘇聯，其方法則正得其反，經濟權利居於首位。我們可以如此假設，無論革命給與何物，牠必給與男女



相同的。憲法無問題地已規定一切在十八歲以上的人民的權利，不論其為何性別，信仰與國籍，只問是從事於社會有用的工作，並不壓制他人為利己事務的，就在蘇維埃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這也將管家婦劃入，因為她們的工作是認為有益於男子的生產工作。(註一)但普通重勢是以婦女經濟的解放較政治的為要。婦女既傳得龐大的不識字與貧窮的遺傳，這是很清楚的，如果她們要獲得充分的物質的與智力的獨立，使她們的政治平等發生效力，惟有由經濟自由與教育二途。

從經濟方面與政治方面着眼，在舊制之下，男女被壓迫的情形之程度，並無多少異別；但在社會方面，則女子更為不堪。婦女在社會和家庭中與男子的關係，就如工人農夫與上等階級的關係一樣。所以照這樣說起來，革命應當賜與婦女的，比男子更多了。加倫斯基 (Kerensky) 政府對於這件事實，並沒注意，亦無改革關於家庭關係的舊法律的企圖。但在布爾斯維克 (Bolshevik) 政府得勢後的一月中，當牠尚在奮鬥的時候，牠已涉及改革結婚與家庭的原基兩大事業了。

要想明瞭婦女在今日俄國的地位，須先從牠的根源着手。舊制的俄國還是處處可見。在鄉下的街市上，仍見農婦負着殘酷的重量，如柴木，番薯或米麥之類，在不斷地悚動；在卑賤的房子裏，仍聞老農們表示寵愛，呼其妻以「老馬紅蘿蔔」或「黃芽菜頭」的，普通的慶祝還是咒罵呢！在村會裏，仍有非法漁利的富農（註二）（Kulaks）結合羣衆，抵制婦女，不准她們到蘇俄的各處。有時一個工人甚至要打他妻子因為她去赴了一個會。就在較比開通的社會裡，還見舊俄的存在好像去年的樹葉還未脫完。我嘗聽過人說現在共產黨內，仍有人主張他們的妻子席於公共的廚爐角邊，比和他們同坐在理事會的桌前好得多多。

老的成語也能敘述這種的故事。「一隻小雞不是一隻鳥——一個婦女 (baba) 不是一個人」——「要早飯，打你的妻子，要中飯也如此」；「我以為我見兩個人，不料是一個男人和他的妻子」——婦女的路——門口到火爐——以及數十句與此同口吻的成語。

她們和全世界的婦女的生活比較，也相差不多，但

較之他處婦女更爲鄙賤和衰弱，因爲人民的退化和東方的氣味侵入俄國生活中，同時帶來以婦女爲財產的一種重男惡觀念。

俄國的婦女，從小就在男子權威之下。她是她父親的女兒，以後便是她丈夫的妻子。她母親的主意不算事的。當她結了婚，她是將身體與靈魂一起交付她丈夫了。祇有教堂的結婚是公認的，教堂規定結婚生活的規條。「爲妻者須懼其夫」是僧老施行婚姻聖事的一種刻簿的警告。這年輕的新娘就須怕這個男子，常常不是她自己選擇的，並從此以後要對他須遵照大俄帝國的聖法「順從他爲全家之主，與他以愛以誠和無限的服從的同住，並以主婦的資格給與他快樂及敬從。」(註三)

爲妻者是應分跟隨她丈夫，無論他往何處去的。設若她離開了他，他可以讓巡警把她拿捕回來，並且不忠誠的妻子可以囚禁起來的。沒有丈夫的允許，爲妻者不能得一張護照或供一職。離婚案件是由教堂法庭決定，所准的是在有限的情形；最重大的理由是犯姦淫得證據的。但是律師和「證據」非要大筆款項不辦，所以這奢

侈的離婚祇能行於富足人家了。法律如此待遇男子，差不多離婚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時常常一個無罪的女人却被判為不忠而將她的孩兒奪去。祇有十四分之一的遺產分給女兒，其餘的十三分均與兒子或幾個兒子。在婚後，婦女所有的財產與金錢一併歸之於她丈夫管理。

因工作和薄待的雙方擔負，農婦們漸漸的邁老，醜陋了，脾氣惡燥了。她們的兄弟們上學讀書，小女孩們要去看守更小的。你還可以看見八九歲的女孩們替她們的母親忙着看護小孩子，她們自己的童臉也都變老了。她們一到能工作時期，就到田上工作。當她們成年，她們的父親就給她們選擇丈夫，並賣與出價最高者。鄉下的結婚含有極少的情趣與感情在內。一個十六歲的活潑姑娘的結婚不祇是解脫她自己的束縛，並可便利她丈夫的家。對他們，她是一個新手，並須用力的工作來償還她所費用的。小孩子又一個個的增添。

高的生育率不能避免地隨着高的死亡率，平均在一百嬰兒之中，有二十七個，有些地方達至五十或七十五，在生下的第一年便死去。生產的母親的死亡也很

多。可憐在村莊裏，醫藥的救治不足，那些操作過度的產婆，在每年中祇能於幾千嬰兒之中接生出一小部分。時常村裏的「產婆」(babka)(註四)叫來了。母親躺在爐灶上的好多蟬螂等之間，那粗而積垢的手就把小兒接出，又將嬰兒包在破布裏。這個產婆灑淋聖水在產母和嬰兒的頭上，說驅逐惡鬼，却滿不顧水濁的危險啊！教堂又傳說婦女在分娩的時候是不潔淨的，所以在從前的許多家室，母親被移到牛棚裏在一塊羊皮上生育她的小兒，就是今日也還是這樣。

小產的事情是要受重罰的，所以這種產婆勸產婦把生產斷根，是產婦極歡迎的。於是產婆在開割時，用些釘子或鈕鉤子或紅蘿蔔之類，或加些有毒的酒釀，使產婦以後不再生產。生育的節制在鄉村裏是自然一點不懂，就在城市裏，也流行得很不廣。

農婦們就這樣遷延地過看她們的苦生活，同男子在田上工作一樣的辛苦，生育兒女和喪失兒子，擔水煮飯，冬日紡紗織布，乳牛奶——所得的酬報是鞭打與薄待。冬天的幾個月是農婦特別難過的時期，因為老農們沒

有多少工作，成天悶在家裏，酒和性慾是他們生活的全部。女子不能逃避這個，也沒有能反抗的。間有之，亦必被捉拿，所以她們也不值得算回事了。

在城市裏，窮人窩裏的婦女生活，殊不見佳。丈夫們從田裏移到工廠去，脾氣越發凶野了，他的家居住在更人多，更不堪的景況之下。妻子與孩童也到工廠作工。而婦女受資本家的壓迫比男子受的更加厲害。工作時間長，工錢反而少，還要運用重物；並且總不敢曠工，直等到她的懷孕使她不能不停了才不得已地告假，事後即回廠工作，死怕職業失去了。在工業上對於保護婦女連最簡單的規律也沒有，直至一九一二年才有一種很有限的社會保險法通過了，但裏面加了許多限制，使牠又無異廢物了。

又有許多的婦女被強迫地去當娼妓——妓館是一個合法的機關，開張的日子還有僧士們來祝福呢！許多不要的私生子都丟到井裏或河裏去。育兒院裏也滿了私生子，法律絲毫不予顧及。父親不能合法的承認他自己的私生兒子，就算他願意承認也是沒有用處，除非這

小兒他自己能證明他的父親，則又不能得着一點微薄的供養。就是如此，等他父親一死，他就和家庭斷絕關係，因為人家都不當他與他們有關係的。

在資產階級的人家，生活雖較閒暇和快愉，婦女的生活則仍是照樣的鄙賤。小資產階級的製造家或商人的女兒成日的關在閨房之中，平常是不准見她的未婚夫的，直至婚期才是初次見面。貴族們當中也是一樣的嚴厲。少年人到各處都有人護送，但是結果反暗中十分的放肆。每城都有一個「小蠟團」(Little Candle Club)在那裏許多少年人縱慾的醉狂，效法他們的長輩的那種較公開的放肆，那種的樣子實在是非言可喻。人不知的，或人不見的，就麻麻糊糊算為不要緊的了。

但是那些被捉着的女子是要被逐出家的，或者強迫她嫁給一個無論多麼粗鹵的男子。隱藏着的腐敗，還假裝道德，不用贅述了。這是法律外表太過於嚴厲，禁止離婚過當的自然結果。就是提到離婚二字於公衆之前也要認為不無淫亂，他們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年輕的人是先要被驅逐出去的，因為小孩子不能聽「秘密話」

啊！較上等階級的女子受得美術，音樂和詩學的教練，她們是好像亮晶晶地受過學校的一些表面的教育了。在學校裏，她傳受得俄國事事都很滿意，俄皇 (Czar) 是多麼慈愛地爲人民祝禱。她好像念過許多的書，但一點也不懂得人生。而且她們有一點的思想的可能就要受遏制。受教育還須有父親或丈夫的准許，所以有些婦女去結婚爲的是要入大學，因爲丈夫的主意可以超過父親的。但是她們不能入男學校，祇能入那幾個專爲婦女立的專門大學——唯有不多的，天才和毅力最高的能以享受這種高府的教育。一個婦女要得到學位，必把她的相片登在報紙上；當做奇聞。貧窮階級的女子簡直沒有機會。革命前立了一個女學專爲建築，工程與工藝三科，但是總之婦女要想得一個職業，不知多麼困難。許多跑去配藥或做牙醫。女律師得有規定權利的又如鳳毛麟角，女建築家偶然會有一個半個。有一次一個女建築家給普勒歐布刺亨斯卡雅鎮 (Preobrajenskaya) 起個車站，許多人正反對她之際，不幸房頂傾陷了，被一般人更加得意起來。在俄國的婦女，能入公共生活或得



到職業的，實在是不多見的事，因為要有極大的勇氣，體力，與智力才能打破環境的重圍。

智識階級自然是在上述之外。在她們的小社會裏也有十足的自由與同情，所以她們是可以過任意的生活的。我們還可以說：至少等到她們的運動含有政治意味，她們的生活才會發生改變的。

人民忘記戰爭是破壞份子中使人民在過去最不堪的之一了。他們忘記俄國的損失比那一國全大。從開戰起至和平協議，計算起來，有一四，三〇〇，〇〇〇人，其中四，〇〇〇，〇〇〇人是婦女，死在疆場，瘟疫和飢餓。實在是因戰爭始有俄國家庭的破產。許多沒有死掉的也好多年或永遠不回家去了。於是就臨到革命與內爭——加多混亂，分裂家庭相縛的關係。謀食者走了——全家的人都要出外尋業，彼此越來越疏遠。婦女跑到工廠裏去替代男子工作。男子回來了，就把女子趕出去。她們回到鄉間，因為工廠停了，城裏沒有麵包了。當鄉裏也沒有吃的了，她們再跑回城市。飢荒一項離散家庭，比其他事件加起來，還要厲害。大幫人口宿在車

上，大幫人口飢餓，疾病，死於饑餓與瘟疫。千千萬萬的人民離家東奔西跑去尋覓食物。父親偷偷地跑出去自己找點食物來充饑，因為他沒有辦法去顧及全家啊！母親飽受飢餓又目不忍睹地望着五六個無力可救的弱體至於發暈發狂。母親們交換自己的兒童來當食物；人們也互殺以充饑餓，一年年地下去，沒有麵包……

於是所有的力量都聯合起來成爲一最大的恢復的實力。當新的仍在建設期間，舊的有繼續工作的必要。第一件事就是修理橋樑和鐵路，並使那些舊的機器再來動作。祇要舊機仍存在，就有舊的物產生出來。在將來的形式尚未實現以前，新機器須有製造，新的生活資料須有創造。新家庭，人類彼此之間以及與社會的一切新關係，都要等到人類之互相關係在新的環境之下，得有擴張和表白牠們自己的機會了，才能充分地發達。這是很能感覺得的，新環境業已計劃完畢，並且模成形式了。這是很能感覺得的，婦女的生活已然離開從前的囚禁與偏見了。這些很有限的家庭團體也在變成社會更大部分的模樣。革命又能向各方同樣的進展，牠的物

質方面須占首位。家庭的革命仍在進行，破壞的方略也仍在進行，所建設的還難看見。

[註一]

參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憲法選舉權部第六十四條與第六十五條。

[註二]

按原文 Kulak 一字英譯為 Fist 即「拳頭」之意。此字的本意是指那般吝嗇而有錢的農家專以放債收利以及各種漁利貧窮階級的方法以飽自己的錢囊的，他們這種人按照蘇俄的憲法是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一種。本書以下簡作「富農」者全是這指一類人。

[註三]

此段見大俄帝國聖法第十冊第一章第百〇八條。

[註四]

「巴不卡」(babka)是指沒有受過相當訓練的產婆而言。

## 第二章

# 婦 工

滿溢日光的巍巍大屋宇。織機上梭子來回地急動織着色彩明亮的布疋。在織着那明亮的線時，婦女們的聲音，歌唱和那機器的搖動聲，尖利聲恰相奏和。婦女得自由地在紡錘的四圍移動，這裏結一根斷了的線，那裏整理一軸捲紗。老邁的臉上滿了辛苦的皺紋，鞠躬式的身與粗歪的手。年輕的玫瑰色的臉蛋兒，直立的軀幹與伶俐的手指……。我永不會忘記我在莫斯科(Moscow)

的紅路撒 (Red Rosa) 絲廠所見的景況——一張清楚的圖畫，那裏僱用的工人多是婦女。這也是我在俄國訪問的第一間工廠，時在一九二三。指點我的老婦工是在此作了許多年代的。現在她是個工頭，並能解明機器的繁雜的構造如同一個美術家似的驕傲。

「自革命以來，工人得到些什麼？」我這樣問她。

「斯弗余」(Svoyu) 是她雙脣台動出來的第一個字，這字是「我們自己的」的意思。

她又接着說：「您沒有看見機器旁的女子嗎？她們是如何的留心着每一根斷了的線？在昔我們的工作是很紛亂不齊的。或者出產較今為多，因為我們彼時須每日作十二小時或十四小時的工作，而現在祇工作八小時。但是現在，每一個人都做得比從前好。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這個工廠和牠的出產全是我們自己的！每月督理員都來報告我們，他也是我們中的一個，所以每個人都知道買原料是用了多少錢，在修補方面，工資方面又是多少——多少錢是收入。我們知道要是我們的出產增多，我們的工資也隨之而增。您沒聽見她們唱嗎？從

前那裏是這樣！從前他們打我們——但是現在我們可自由了。」

工廠的隔壁在昔日是一座大白樓，那是從前的經理，工人們呼他「豬仔」(The Fat One) 的的住所。現在一部份做爲白晝的育嬰房，一部份是幼稚園。在另一間大廈裏，從前那位經理放置他的獵來的勝敵紀念品的地方，現在成了俱樂部的大禮堂，圖書館和課室；那保藏所又改爲一個完備的健身房。在工廠委員會裏，會長還是個女人呢！她的辦公室裏有兩位熱心的婦工塔刺蘇發(Tarasova) 與非利普發(Philipova) 同志在爲整頓在她們全廠中的不識字女人而計劃着。

大概紅路撒工廠是最完美的幾間工廠之中的一個了。人不能處處看見這樣的自由的和快樂的空氣。但是在莫斯科的三山(Three Hills) 大織工廠，有八千工人之多，牠的幼稚園與白晝的育嬰房，牠的醫院與藥房，牠對於育兒的方法的展覽與富足團體生活的運動還能給與我們以更深刻的印像。但他方的情形我也看見。工人的妻子和她們的兒女，因育嬰房以工廠不能盡量的收

容她們也不能收容她們的孩子，便居住在羣衆的地方擁擠着。在工廠工作八小時之後的婦工們回到家來再給大家庭洗衣做飯也是有的。

在大織造業的中心，伊凡諾夫·佛茨尼仙斯克 (Ivanovo-voznensensk) 地方，我見有新舊同樣的對立，在那裏的工廠是舊式的和不講衛生的。生產已經達到戰前的標準，但是那些舊機器業已使用至其極度，要想再多生產唯有建築新屋和接用新機器了。但當我問那些婦人現在的情形是否較前為佳，她們總是給這樣的重語：「我們現在有了孩子可以在產前休息兩個月，產後又是兩個月，同時還能領取完全的工資——所以我們可有功夫撫養嬰兒，並得特別的工錢——並且我們還有照例的假期！」在革命以還，這種顧惜母親的保險法律好像給與婦工們比較別的改革給與她們的為深切的印像。安全的方法，吸塵的傢伙，良美的通氣機在各處都安置了。在地底潮濕的染房工作的婦工，她們的工作時間祇有六小時而且還得到牛奶與膏油的特別滋養。

他方也有以生活價值太高而發出怨聲的，你看經

理們苦得要想逃避法律了。圖謀生產回復常態和自從重新建築幾年以來工廠經理們所要解決的一些艱難的經濟問題，一變而為使工人知曉實業情形的一事了。分工合作與大批生產的介紹已使工作急進，而且工廠的空氣有些是較前兩年為有紀律——但是工人們還是不怎肯受約束，不像他處工廠的樣子。

在羅斯托甫 (Rostov) 的香煙大工廠裏，我尋得牠實行同樣的保護法。在這裏我被「夜養病院」感觸得最甚。這類的組織分布得很廣，牠們是專為得了采薪之憂而還不至於睡下，祇需特別保養和特別食物的人預備的。這些人日裏到工廠去作工，晚上不回家就直接跑到養病院來。也有許多患癆病的和毒症的都在此醫好了。這一間(我訪的)住有廿五個工人，其中多是婦女；住院的日期各不相同，以病情為定，甚至住幾個月的亦有之。一位婦工完工後剛從淋浴出來的指示我們去看了許多華麗的和清潔極分的屋子，好像她滿腔在焚着快樂之焰，因為有這麼好運氣被送到這裏來。

俄國婦女大批的被僱在工廠裡不是一件新奇的



事。婦女在織造工業內作工有數十年的歷史了。在二十世紀開始以來，她們在其他工業中的比較低下的工藝職業上，也逐漸增多。廠主們常覺得婦女比男人來得「靜而可靠，」大概是因為她們的工資較廉才這樣說的。但是她們的職業範圍有限，而且男工不承認婦工與他們站立在同等的地位。等到大戰發生以後，婦工在工業的各方都得到相當的雇用。本來這樣一變應有革命的影響並使許多舊的偏見除去。可是在戰後婦工的職業又失去了。一九一七年印刷業決定把所有的婦工解辭。在彼得格勒 (Petrograd) 有六百已婚的婦工由斯科盧 (Skorohad) 解散出來，把她們的地位送給回國的兵士。嘿德工廠造紙工業也有同樣的辦法。但不久發現了這種方針和蘇維埃政府的宗旨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在一九一八年的四月，職工會彼得格勒理事會對全體工人與工廠委員們宣示以下的一篇文字：

「如何抵禦失業的問題已經臨到工會之前了。在許多的工廠和店舖裏，這個問題解決得很簡單……解散婦女，並以男子代替。但蘇維埃已轉得政權，勞動階級

也得到一個機會，就是去重新組織我們國家的經濟在一新的基礎之上。但是前面所說的行爲與這新基礎相合嗎？……抵禦失業最有效力的方法便是國家生產力的復元，與重組織國家立於社會主義基礎之上。在危機期間，當工廠和店舖正從事減除工人的時候，我們須對於解除工人問題，加以十分的留意。我們應將每一件事情單獨的解決。我們不問這工人是男是女，祇看我們的需要的程度……唯有持着這種的態度，我們始能保留婦女在我們的組織裏，並防止工人團體破裂……」

這種的態度在其他的工會和政府的組織也見提倡，於是大幫婦工的辭退，加了限制了。一九二一年工業集中的時候，不幸又發生一次大解散工人的事體，跟着工會遂又重新提出男女平權的問題，關於解散婦工一更有事告示特別地宣示：在同等手藝情形之下，男工與女工是立於被辭的平等地位的，但是那些單獨的婦女有了不滿一歲的小孩兒的享有優權。設若這種婦女不能不辭去，她們也不得被逐出廠外，而且她們的孩子仍可留在白晝的育嬰房，幼稚園或學校裏。有孕或撫

養嬰兒兩個原因不能作辭去她們的動機，並且婦女在分娩假期間不准被辭。這些條件還留存在勞動法典裏呢！

這幾年來，婦女在工業的數目逐漸增加，男工的數目則又三倍於女工。一九二六年的一月，在工業裏共有七〇八，〇〇〇個婦女受用，比之上年增加了一七三，〇〇〇人，總佔全工業的工人總數百分之二七·四。婦女佔工會之四分之一，工會至少含有百分之九十的僱工和幾乎百分之百的工業工人。這幾年來，婦女在工會的成分還沒多大的改變，牠的確數是從一，四六五，四〇〇增至二，二一七，二〇〇。實際上所有在工業和專業的婦女完全包括在工會之內。現時婦女工作在織業，成衣，製造食物，醫藥和公共衛生，以及在教育協會等業的居其大半。過半數的全數工業婦女是受用於織造業。此外，有六萬以上的婦女受用於五金業，在那裏祇有幾個婦工升到較高的地位。所餘尚無組織的婦工是農業的工人與私人僱用的僕役，可是在這裏的情形改變得很快。

在一九二六的一年當中，有組織的僕役數目由四七·〇〇〇增至一三三·〇〇〇，如同其他工業的工人，她們也受同樣的勞働法典治理，並另外有一特別法令嚴厲地規定供職與時間等的限制。簡單說，僕役可分兩種：那些工作在旅館，飯店和別的設立的；與那些為私人家庭僱用的。在前者裏面，沒有例外的全是工會會員。法律對於她們是很關心的，並且工會特別的賣苦力去為她們開會，籌備分班和消遣的事宜，又要使時間合適，不使工作時間防止她們所當和其他工人享受的同樣利益。這一種的工人多是伶俐的，並且受過相當的教導。旅館的使女對於早晨的新聞紙也有尖利的與通達的趣饒，關於這一層，她雖和她所侍候的那位任有公職的旅客相較，也不能說誰上誰下，在這般僕役之中確有好多在革命時身當要職的呢！

私人家庭裏所用的僕人就落後得多了。她們所受的待遇自然以何種的主人為遷移。僕役們——平常都是一家一個——多分是僱用於新經濟政策實行後的新興資本家(註一)(Nepmen)，專業均與官員的階級，智識

階級以及舊日的資本家與貴族等幾種人的家裏。換言之，就是受用於最不生利的一部分人間而積有大筆錢財養活他們的安逸的妻子的，在這裏受用的僕役得有常年的職業，但對於小兒的料理，食物，與其他的家庭瑣細的各種公共設施，則幾乎完全不發達。在開通的家庭裏，僕役是家庭中的一份子並是他們的合作人。在他處則壓迫的事實仍是存在，但是現在怎樣也沒有從前那般厲害，並且這是可以預言的：非要等到那些婦女都自己知道她們不應受惡待，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自然現在對僕的態度業已完全改變了，她們是和其他社會工人一樣的自重與被重。我記得有一位經長期在舊制之下受役的婦人總不免以自己為卑賤，當我問她現在的待遇如何，她就聳聳肩把改變答的這樣：

「唉！現在我們可以睡得舒服得多了，因為他們須給我們以相當的床，並且以後他們不能再暴虐我們了。」

婦女活動於工會的工作事業的，並不與婦女在工會裏的會員人數符合。在較高的管理機關，祇有百分之六·四的工人是婦女。在有薪水的工會組織人當中，百

分之一二·六是婦女，總工會中央委員當中，百分之十五是婦女。但在較低的部分中；婦女較為活動。在工廠委員裏面，婦女佔百分之二十，此外，並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婦女在勞働保護委員會。

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在第七次的職工會會議裏，替綽麥洛華（Tichomerova）報告婦女工作時說：在工人俱樂部的一，〇二〇，〇〇〇會員之中，百分之三十三是婦女，上年不過是百分之二九·八。差不多有二十五萬的婦女在各關係工人俱樂部的各種「學會」活動。下面是婦女參加各種運動的一覽表：

學會的類別	婦女佔的百分率
(1) 縫紉，成衣等	九四·八
(2) 唱歌班	五七·三
(3) 圖書館	五〇
(4) 文學	四二·九
(5) 戲劇	三八·七
(6) 普通教育	三五·八
(7) 自然科學	三三·四

(8)體育	三一・四
(9)生產問題	三〇・六
(10)勞工科學的組織	三〇・四
(11)政治(初步的)	二九・五
(12) <u>馬克斯主義</u>	二八・三
(13) <u>列寧主義</u>	二八・二
(14)工會運動	二七・〇
(15)反宗教	二三・二
(16)棋團	七・二

在這些團體的人員，又要加上她們在代表會議的工作。(註二)從統計表中，我們很難計算這些工作對於婦女的影響如何，但是牠們供給一個準則的資料，就是使我們知道婦女入工會從事偉大的文化工作的面積的準則。每一個工廠與機關都有牠的「牆報」，對於婦女問題有特備的紀載。在這些規定的俱樂部之外，工會又組織「紅角」(Red Corners)；在這些地方他們安置些報紙，書籍和佈告等物，預備給工人不在俱樂部裏的享用。婦工與工人的妻子要是不赴任何有規定的運動，也有時

得由旅行或賽會連絡。此外又特備「家庭夜會」來吸引婦女。男子們帶他們的妻子與兒女去赴會，會的秩序單上還有「特項」，並且附帶着有這樣良好的設置，就是使一個保姆看守他們的嬰孩們另在一間房子裏。有時這反倒變為規定的夜育嬰房了。

工會既有這麼許多的運動，工廠便不祇是限於工作的地方而已。所有的新的社會的設立都圍繞着牠——俱樂部，班堂，遊戲場，醫院，戲院，圖書館等等。工人用不着為想得高薪而設法超人而死勁去奮鬥，使自己或全家得到一個較窮的人所不能到的娛樂。工廠的生產增加，遊藝和教育的機會也由之而增加。當一個工人要過一天假日的時候，他不再帶他的妻子和十三個小孩子去柯尼島 (Coney Island) 過一天炎熱和死板的日子，大家祇咆哮和流汗珠兒。他現在得乘他的工會所備的小船遊航到莫斯科或第聶珀爾 (Dnieper) 或端河 (Don) 之畔。小孩子們可以上去作一個「先鋒」的野餐，他的妻子也得一日的休息與自由。有許多婦女還覺得這太討厭而反不願意得着這些利益。但是她們進步得



很快。一年中工人送到休養院或養病院去休息的，不下萬人。

婦女失業年年地增加，到一九二四年數目達至六〇〇・〇〇〇，約是註冊失業的總數之半。差不多在去年以前，男女的失業常度地遞增。當工廠關閉的時候，這裏發生往鄉村搬動的趨勢，等到工業復元，不祇舊工人因人滿之患不能收用，就是新的——聽過加工資和增進環境的——也不能全用，因為那些工業還不夠發達的程度去全數的僱用他們。是的，失業增加也會受約束，但是一時的工業發達減至最低度，是無可懷疑的了。因為當時對於技巧工人有無限的需求，所以那般男女失業的全大部分在不技巧的方面上。

共產黨，工會和勞働部（註三）（俄稱Narkomtrud）以減少婦女失業為有定的任務，並以下列方法達到這個目的：（一）限制解散婦女的與不僱用婦女的理由；（二）設法增加她們的操習機會。失業保險包括失業者的五分之一，又因大多是分配於技巧工人之中，所以男子得「贈金」的反較婦女為多。贈金是由五盧布（註四）

(rouble) 至十五盧布，但是以外還有其他利益給與失業者，例如：免租住所，公共事務的免費，免稅和納費的減輕等等。並且一個失業的婦工，在分娩期間，能夠得着特別贈金，和醫藥免費的利益，與有業工人的待遇無異。其他解決失業的方法如公共工作與「勞働協作社」是。受這種方法治理下的失業者，有四分之一是婦女。

蘇維埃政府的全部的勞働法，對於婦女方面是十分注意——八小時的工作，社會的保險，養病的待遇，休養院，年假，特別的工作制服，保護危險之方法與衛生事業，十四歲以下的童工之禁止，十四歲至十六歲的童工練習工作時間只許四小時，六小時為十六至十八歲的。總之，在這一方面，婦女得的比男子多，因為在過去不衛生的和危險的情形之下，婦女本來是受害較之男子為甚。在這些與男子同得的利益之外，根據母職的社會價值的承認與婦女在生理上的不同點，婦女又有特別法律的規定。四個月分娩假的給與工業中的工人也給與那般需要特別用力的非工業中的婦女，可是辦公室的工人祇許假三月。小產以後的也給與三星期

的假。設若婦女在這四月後疾病，在疾病兩個月以內的，不能因此而被革職。嬰兒的贈金要逢雙生時加倍。尋覓職業的有孕婦女，在她臥床不起未滿三月以前，不許加之任何區別。

在勞働法典裏面，詳細地規定婦女准舉的重量。十八歲以下的婦女不准作舉重的工作。若僱用了負重的婦女，她們所負重量的標準只准是男子負的一半。在工作於踏板機的或需特別費力的職業的婦女，每月特給假兩天。印刷業的許多部分，如化學工業以及旁的需工人們暴露在塵埃的職業，有毒的氣質或其他處於危險狀況的，都不准婦女擔任。偶有工作在不衛生的環境周圍者，就須有牛奶與膏油的特別供給。起先婦女不准作夜工，很少是例外，並且禁止婦女參入許多列明的危險事業。結果倒發生區別的事，增加婦女失業者，所以婦女本身自動地去反對牠。後來這些法律便暫時放鬆些，在特別情形之下，婦女得作夜工，並加入一些從前所禁的事業來。但是寬鬆及不到處女，或孕婦或育兒的母親。有些工作如司機人，加油人，和汽機的火夫等是絕對

禁止孕婦與育兒的母親擔任的。又有勞働稽查人員時常地去免了一些對於婦女身體好像會發生傷害的的工作。

在其他方面，更有反對區別婦女的力量，就是推薦婦女去任無論何種的工作，不管她們對於那類工作是否合宜。於是礦業工會就有這樣的一個試驗：增加礦業學校內的女生數額至百分之十。有些婦女還要求撤去所有保護婦女的法律，說牠使婦女受種種區別。

利阿贊諾發 (Riazanova) 在她所作的婦女的勞工 (莫斯科勞働社 (Moscow Woker) 出版，一九二六)裏面，反駁過這一點的觀察。大概這本書是從俄國對於這個題目最完備的研究。她所述要點約如下列：

「但是婦女在開礦的專藝職業上，到底能夠得到相當的成績嗎？工會是不是應當爲此力爭？我本人的意見是以爲讓婦女去開礦是很沒有道理的，因爲婦女在生理上不合宜於那種的工作，對於孕婦，更是不能。這並不是「給婦女平權」的正道。」

利阿贊諾發又指出幾種別的勞働對於婦女特別難

任的，如劈柴和建築的工業。她警告婦女們並對鼓勵婦女入新職業的趨勢力倡反抗的運動，因為不祇害了她們自己，而且當她們不能得效，婦女的整個運動也被影響而至於退化。

「在工人還不能倡起工業本身的方法的激烈的改革以前，」她繼續着，「在擇業還是靠着環境的機會，並且對於新世代沒有按着趨向和能力的特別研究以前，把「最弱的分子」由「異常危險」的部分驅出是最初的一步……在這樣的一個理想社會裏：兩性的兒童的體育都加以相當的注意，未滿十六歲之兒童不准任專職，那集合的生活與治食方法的組織把婦女由爐石解放出來，在這些情形之下，男女的關係是如何，自然很難加以預定——但是雖按照勞働的理想情形和在最衛生的生活景況之下，母職功用的實踐是必要置婦女於特殊地位之上，並須有特別的保護方法的。」

雖然在所有的婦工之中，祇有百分之十六是在技巧階級，三六，九是半技巧的，並其餘是不技巧的，但在今日的俄國，無論那一種事業都有婦女在內。有許多婦

女還保守她們在戰時得來的地位做電車司機與汽車司機。婦女沒有一門不入，她們任洋鐵匠，製鎖匠，車機人，繪圖員，電機生，水手，兵士，建築家，紅軍隊軍官，(註五)還有做船長的呢！

婦女的「經濟獨立」的一句成話是在俄國很少聞得的。革命前重點是在求全勞働階級的經濟獨立。革命後對於婦女「自食其力」的權利，却也沒人過問。理想上是每一個有強健身體的男子或婦女不祇是有工作的權利而且是有工作的義務。但實際上，在俄國大多數的已婚婦女，經濟方面還是靠着她們的丈夫。這種的情形非等到婦女獲有充分的技藝，去參入較高薪的工業部分，並在家庭預算中能貢獻比現今更有具體的一部時，是不能改變的。雖然「等工等酬」的法律業已成立，但在一九二六年之末，全工業中的婦女平均每人每月所得是四一·七四盧布，而男子平均每人是六十盧布。這不祇是因為婦女多半是不技巧，而是當婦女做與男子同樣的工作時，也以較低的景況處置她們，因為許多男子反對與婦女工作得相等的工資。這種現象是以在農業工人

中間比在工業中的爲多見。

在我現住的政府田地 (Sovboz) 這裏，婦女普通受用的一些地位祇有那些「婦女的工作」的本身職業，例如烹調，洗衣等事，但在正耕種的一季中，許多婦女也去做耕鋤，割草，洗掃，摘取和收成等工作的零工。這些是叫做「巴特刺基」(betrachi) 婦女——本村最窮的農婦，其中還有許多是寡婦，她們沒有傢俱去耕種自己的田地，祇好等人家僱用。這些婦女的三分之一是組織在土地森林職工聯合會之下。在全農業的各種企業裏，有一個大家承認的規定，就是：婦女每日零工值八五戈比 (Kopeks)，男子則一〇一盧布。這一類的農婦要算俄國各種工人中的最落後的了。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問她們爲什麼她們不堅持跟男子得同多的工資。她們總聳聳肩很自暴自棄地說：「舊時我們才得十五或二十戈比一天——現在我們得到從前的四倍或五倍——爲甚麼我們還多要？誰不知婦女比男子便宜！」

很奇怪，還是一個美國指導提出這樣的計劃，就是：付給零工的工資應按工作的種類而定，不當以工人

的性別爲根據。新章程實行的第一天，有三個男子和三個婦女在整理一個花園，那幾個男子一聽得這個新規定，即刻丟下手裏的器具。

「同婦人工作得一樣的工資嗎？世界上沒有這個道理！我們多羞恥——大家都要笑我們。誰不知道男子比婦女強健，能做得更好……」

唐突地那幾個婦人插入。

「那末，好罷！如果你們真比我們做得好，來證明牠。把花園分開作——你們做那端，我們做這裏……」

不祇她們先作完，而且她們做得好的多，男的不能和她們爭噪了。在別的工作也發生過同樣的事，不料又是婦女先作完出來。男子們不再怨告這個新的規定，他們祇好承受「婦女的工資」。雖然，爲公道起見，我還須加一句，就是：雖在田裏的工作，也仍限於最簡單的工作才是如此。甚麼時候需要技藝，那就婦女作得十分的壞，所以我們很容易明白男工比婦工多得工資的緣故。偶然或者會有一個婦女的工作能抵幾個男子的，但是太不容易見了。



當婦女一寸寸地進展她們在這男子世界的地位，對於安置婦女於各種工業上的有系統的研究，俄國也越來越注意。勞働部治理下的婦工中央委會，在全國各地都有分會並在莫斯科又有科學的勞働機關。牠已經從事於婦女中的工業和她們的社會病症的特別研究：舉重對母職功用的影響，和各種用力的勞働，地底下的工作，搖動與夜工等等對於婦女普通生理上發達的影響。

這些委會所得的材料就以斷定對於婦女在新工業部分的操練的將來政策。同時另有身體查驗專施與那些要入需用體力的工業的女子們，牠們又盡力使工廠設立的工業學校的收額人數和婦工在廠的百分相符。

這些工廠的工業學校或稱費布撒埠徹 (Fabzavuchés) 的在教育制度內要算佔得很重要的地位了。學生普通就是徒弟，他們的年齡是十四與十五之間。這種工讀的學徒是每一個工廠都要有一部份的。徒弟練習期以兩年至四年為限。學生們在工廠作四小時工作，再去讀四小時的書。在學校他們可以得到較高技藝的工業

所需之學理智識與普通教育。入這種學校以前須有相當的初淺教育。在我所訪見的一些工廠學校，我觀察得女子的數目與她們的成績程度都極不齊。牠的比例差不多總比工廠的婦工少。但是這也是事實，差不多各處我都見得女子人數的漸加。在幾間織業學校，女學生們還能漏臉（出風頭），但在羅斯托甫（Rostov）的香煙工廠就大不相同，從前那裏有十二個學生，現祇餘兩個，那位講師還對我講這兩個剩下的學生又是腦弱。在五金工業，起先連一個女學生送到工廠學校的也沒有。可是漸漸她們也進去了，按照調查的平均計算，女子的成績較男女的為遜並她們獲得較少的專門創造力與技藝，但她們已能證明自己可以完全去做司機與繪圖的工作。在極少的情形之下，也有能作高藝的，機器上的工作的。在所有的工廠學校裏，一九二三至二四年間有百分之十六·五是女子；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有百分之二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有百分之三七；並在預告的統計裏指示從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數目應增至百分之四十。

集團的和單人的學徒制度也漸漸施用於教導婦

女，使她們有較高大的技藝。這個方法是讓技巧的工人去做不技巧輩的先生。在一九二六年中，有九千婦女升入「技巧」的，並八萬升入「半技巧」的階級，都是賴着這個制度的好處。有些縣府以糾結本地的婦女勞動委會力謀升進婦女至技巧的職業為牠們規定的運動。

還有一個運動提倡升進婦女至較高管理的地位。雖然沒有幾個得到在工業中的高位，但那些得着的，已把她們的家務舊習改得很好，她們已能嚴厲地強行經濟制度，並能增加生產。

當舊習慣還種在衆人的心中，革命產出一般新婦女。強壯的，剛毅的和無懼的，她們自己正在發展一種比選舉權與「自食其力」有更遠的深意的獨立。戰爭與革命不祇指示她們能作男子的工作，而且她們可以獨自的生活。無論是在管理地位上或工人的職分裏，她們不再像從前那般的做順從的和卑賤的小動物。她們漸漸對於工作本身感覺得有興趣。她們得到尊嚴與自重，並對於研求學問與技藝有無窮的好胃口。是的，這種新婦女仍是少數，但是，她們確實已經離開餘衆了。



[註一]

按 Nepmen 一字原是從 Nep 字而來，然後者却又是 New Economic Policy 三字組成；這三個字的義意就是「新經濟政策」。這個新政策是因爲俄羅斯的理想共產主義與她的全國經濟實況相差太遠，於是不得已才採這種的過渡時代的辦法的，在這個新政策裏一變從前共產黨所執的絕對辦法，牠也承認以人民的資本振興工業，承認貨幣的流通，允許農民出售農產品等等的變通方法了。

[註二]

詳見本書第四章

[註三]

按蘇俄的憲法共有人民委員十八人——要將最高經濟議會也算在內，就有十九個人民委員機關——一組成人民委員會，各委員分擔各部的事務，也就是各部的部長。所以譯者按着原著在這裏把 Na-  
rkomtrud 一字譯作「勞働部」，而後面也有譯作

「人民勞働委會」的，其實都是一箇字。

〔註四〕

俄國的「盧布」一個合一百個「戈比」。「盧布」就好比是我國的「元」，「戈比」就好比是「分」。

〔註五〕

紅軍隊不但能做保護國家，保護人民的工作，而且在紅軍隊裏面的兵士能夠得到淺近的教育，他們與人民的感情都是極好，因為他們都十分和氣，常幫助人民做事，而且在另一方面軍法又是森嚴得很，裏頭很不容易濫入不良的分子。不過事實上，這紅軍隊的大部是由俄皇時的舊軍官組成，共產黨黨員祇約佔十分之一。但是這一小部分却很能監視他們，勢力也非常的大。

### 第三章

## 鄉村的婦女

一個無偏無倚的調查家要得俄國婦女的真像，必須隨意地選擇伽馬列耶夫卡 (Gamaleyevka) 或格拉綽夫卡 (Grachovka) 或佛茨尼仙斯克 (Voznesensk) 或馬斯羅甫，庫特 (Maslov Kut) 的鄉村，任意地進訪十幾間屋子。牠們全是泥磚或木頭起成的，材料是以各城邑爲遷移。但是屋裏則全不約而同。一間房子——最多兩間——火爐佔去大半的地方，大概全是泥地。一張

粗桌，幾張破凳，一架木床，上面鋪着一塊醜醜的羊皮，鍍金的偶像在一個牆角，旁邊圍着變了顏色的假花，一條光彩奪目的繡花巾帕，和一個從天花板吊下來的搖籃。至少有三個小孩子可見——並各處都充滿了那不能忘記的悶氣味道。

婦女，若不是在田工作或在院子裏，或在河邊洗衣，準在紡線或烘餅或暈狂的來回搖着嬰兒止他的哭聲，或很難過的坐着不想什麼，不做什麼。她們對於調查者所問的答話大概如此：

「唉！從前怎樣現在還怎樣！要有個好丈夫，在舊時能快樂，現在也是能快樂。不然，在從前祇有鞭打和呪詛，在現在又豈不是呪詛——」

「是呵！講離婚多麼悅耳——但是我怎樣撫養我生的兒女？說到這一層，就兩個人比一個人好啦！離婚妻子生活費（註一）（Alimenta）？是的，我懂這個——但是我早知我丈夫荷包裏沒錢分給我，那末，這又有何補益？如果我丈夫離開我，或著我在別處得到一塊地，我怎能獨自耕種牠？還是合作可以湊活！」

「學習讀書寫字？你想我有什麼功夫去做——牛要哺乳，豬要喂，水要擔，一會兒嬰兒呼喊了或又有一個病了——讓這般小的去讀書罷！」

「是的，小孩兒上學——但是在那裏他們能學些甚麼？學校毀了他們呀！小孩子從前總肯聽父母話去做事，現在他們回家反教我們做這個那個。這成甚麼事體！你怎能盼望小孩子學點東西回來，要是連打都不打他們呀！」

冬天的一日我在馬斯羅甫庫特找了一條街，進去看過全街的屋子，這還是所謂明白的農家對我說的話呢！

後來我走到市場，對三個活潑的戴着頭巾的婦女發問，她們正閒談着，我問她們對於經多年壓迫沒得到的這許多權利作些如何的感想，

「唉！吾愛，」一個這樣地答，「那全是白費的！又有什麼分別！祇要是上帝賜給我們米麥敷用一年的，那就得了——不然，你所說的女權能幹什麼？」

我走到一羣在政府田地工作的俄村貧窮婦女的面



前。

「你們現在準比從前好了？」

「什麼使你想到現在準比從前好？從前我們由黎明作到黃昏——但是我們不用老不停的工作。我們甚至可以停下來唱歌，並在日光下躺着，我們要睡覺，工頭也不來管——因為他自己也如此！但是現在就不同，他們要我們專心在工作上。我們三點鐘回家。也許回到家還要作工。要是從前，我們回到家已經天黑不能作工了。」其餘的人癡笑着表示贊同。她們承認那些有男子和馬匹幫她們作的婦女是比較快樂，但她們自己——寡婦和孤獨的人們——田地也沒什麼用處，因為光是她們自己沒有法子耕種。

婦女擔負重量，婦女耕種，割草，收穫，打禾，烘餅，在供給生活的範圍內的各方都有相當的地位。和男子在田裏工作，幫着割細那黃金的禾束——俄國的命脈。年復一年，她們擔着這種的重任，尤其是在「秋收」(Strada)的辰光，她們的生活最苦，嫩白的臉兒盡為風日所摧殘了。無情的，粗暴的生活製成許多無情的粗暴

的動物。雖然她耐苦已久，還不能得到她的理想。男女是同一棵樹上的枝子，同一個過去的產品。他們有許多相同的特點。他們都說謊和偷竊，因為這是唯一的方法，為在工作所得的赤貧的和醜陋的蠅頭以上，多得一點。一日她們要倚賴牠，就不得不像鬼似的工作。但在外工作，她們自己的田地空着長野草。她們可以對禽獸十分的慈愛，但對人是不能不十二分的殘恨。但這也會正相反的。我們不用蓋括她們，因為她們全是東西。我曾見一個不誠的老父親和家畜同居在通風的廬裏，因為他的女兒不准他回家。但我又聽過在荒年之際年輕的農夫為給與老人糧食的議案投票，連自己一點也沒有。現在不祇是男子會鞭打呪詛。婦女還能說一串的話使你的血都要變冷，祇要你懂得。有一次我還聽見一個婦人打她丈夫，並人家告訴我有時反而男子要去農工婦女部(註二) (Genotdel) 哀告他們的妻子對他們的惡待。自古傳說以為祇有男子在假日飲酒。但在復活節的那個禮拜日我看見一對女醉鬼在街上亂跳和老農們一樣的癡狂。但是實在她們的原性和習慣都很堅硬，還需一

代以上的時間才能洗掉她們在許多世紀積下來所懷的迷信與懼怕之層疊。大體而言，婦女們仍固守過去，羣聚教堂，並信仰老僧傳說的神怪和惡鬼的故事，比男子信仰牠們厲害得多了。

馬斯羅甫庫特的婦女在街頭來往，聚着在談論她們的困難和鄰舍的雜事。她們常會在她們的屋前，幾點鐘的這樣呆坐着，剝食瓜子，數說這不好那不好，歸總全是怨言——但是人家一請她們去會場幫忙改革，她們就很驕傲的搖搖手。這個鄉村的農工婦女部組織人那達利亞格律時多發 (Nathalia Gruzdova)，一個奮勇的小婦人曾入過黨校的，也不能為她們完成多少。但是好在她還不氣弱，失望。

「對於較老的，我們盡力去做就是了，」她跟我說，「但是輸了也是不能使這般老者明白什麼。我還是側重那般年輕的。」

在這裏已經見到一點成績。去年是第一次她們選舉代表到蘇維埃——一共選了三個，經過一羣的藐視的非法漁利的富農的反對，對婦女的唯一功用發出許

多污謗，才幸而成功。但幸中之不幸，這三個代表選得不好，她們不怎作事，所以在蘇維埃的「富農」也不去鼓勵她們。本年這裏不仿他處把婦女在蘇維埃的數目增多，她們却決定另選三個靠得住肯做事的代表。政治代表會開了，還有什麼教員會議，母親會議，討論到底誰是最合乎這種職務的人材。我曾赴在鄉村閱書室開的一個代表會，先有蘇維埃的會長演說，講地方蘇維埃的意義與功用。然後所有在本村有被選資格的婦女的名字都一一提出加以考慮。對每個都直爽的評論一番。

關於馬利亞大衛多發 (Maria Davidova) 有一位說：「她知得很多！」——但又有一個人站起來說：「是的——她知得多因為她喝得多——我們不要這類人到蘇維埃——」

關於別的一個她們說：「她連自己家務都弄不好，她還會有感覺去改良鄉村嗎？」

當那斯梯亞史忒班諾發 (Nastia Stepanova) 的名字提出，就全堂反應一種贊許的低聲。

「她是個好的活潑的婦人——我們要她罷——她

而且是個力士，一定不怕對男子直言她想說的話的」。

那斯梯亞在一角坐着臉忽然變紅，不由得地立了起來。

「但我不識字——我什麼都不懂」她辯護着。

「不要緊；你可以學習——你能說話，是不是？那就是在蘇維埃會議最重要的事。繕寫有別人做的。」於是她的名字就接收了。

對於詹尼亞朱柯發（Genia Jukova）發生熱烈的辯論，因她爲的父親是個「富農」而本年「富農」是不准選舉與被選至蘇維埃的。

「她的父親是「富農」與她有什麼關係？她自己是個教員並且是個能幹的人，她必會爲貧窮的農民的利益設想的。」

她也被接收了。於是就讀到那達利亞格律時多發的名字，她就是本村農工婦女部的組織人。

「自然我們的那達利亞要在內——她知道的比我們知道的加起來還要多——她還能讓男人盡本分，手段高極了！」

她們先為她們的代表鼓吹，要本村所有的團體簽字承認。在一個與蘇維埃會員同開的特別會裏，所有的男子，共產黨會長也在內，都待遇婦女謙遜得很，但是却說：允許去扶助她們如同給小孩兒一塊糖一樣。當那位婦女組織人戲笑地詈罵男子，會長答說：「你不能希望我們把婦女真當回事的，你說能嗎？」但是選舉婦女到蘇維埃是政府的政策，當選舉日的一天，會長親自給了一番誠懇的演詞，主張這三個代表是一定要選的，並雄詞痛說婦女在政事上所佔的重要地位。「富農」們既然失了選舉權，婦女選舉也就少了攻擊，而且本年在蘇維埃的工作上她們確佔着重要的部分了。

要召集在馬斯羅甫庫特的婦女開會是很困難的（除非秩序單上有一「奇項」），鄰村阿堪遮斯柯耶（Archangelskoye）的大堂不能容所有來赴會的婦女。三月八日，婦女日，她們從本縣（Tayon）的四方到來，開會時間是定的正午，但是從早到晚她們繼續地到會，有些走路來的，有些坐馬車的，從四十「維爾賽特」（註三）（Vefst）而來。她們好耐性等了一天，到六點鐘才宣佈開

會。晚上大堂太擁擠了，有幾百人祇得站在堂外的街上。每一村有一個發言代表給賀詞並報告上年在本村的婦女工作：關於合作社她們作了什麼，在蘇維埃又怎樣，多少人學會認字書寫，和下年的計劃。有些說得很好，聲音清楚明亮。但有許多說的唔唔呀呀，還要人去提詞，並且沒等說完就下講臺，跑下來就哭了。看見這種情形，看見這千百家聚在暗色堂中的婦女的明珠似的眼睛，在過去的暗昧的舊例之外，開始感覺得人生對她們的關係，真是神怪極了。

有一天，有一個消息傳到我這裏說有三十個婦人從普里庫斯克（Prikumsk）地方來此訪視農田。她們的發言代表告訴我，說她們的代表團有二百婦女，出不起旅費的會裏給籌款。普里庫斯克是類乎一縣的地位，所以在社會方面牠比馬斯羅甫庫特村較為顯着。牠的代表包括各種人材，從藥房的主人，一個大個子，捲髮，帶着長的金耳環，穿着燦爛的紅衣，帶着頭紗，披着輕飄的白麻外套，以至於一個衣黑的矮小的老農婦持杖跛行好似一個小巫，種種人物，無不俱備。這位老婦年

約七旬以上了，從她的無牙的牙肉中還流露些不清不楚的俄文。她的一對明珠還能顧視周圍。

她們到各處看過一遍之後，她們又回來品茶並回答我問的幾個問題。

我請她們將十年來在她們城裏婦女的生活改變，給一個寫真的報告。

這個會的領袖——一個篤實的少婦寫了許多筆記的——明顯地是智識階級出身，站起來回答我的問題。

「你須知在我們那裏蘇維埃的權力一直到一九二〇才達到。在這個時候以前那裏只有內爭。但蘇維埃政府給了婦女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完全權利。她承認……」一個農婦讓她不要說了。

「我來講罷！」她說，於是就說開了。

「先說罷，朋友，這種事情從來沒有有過的！你想想——這麼許多婦女，聚在一起出來旅行。巴佈士卡 (Babushka) 以前還沒坐過火車呢！整年的我們不是上班就是開會。你看我，現在學會認字寫字了——我要看見告白，我自己可以懂得牠，不用像個傻子似的跑到



隣舍去！我還有別的告訴你。我們不再懼怕了。那是最要緊的。我們不怕我們的丈夫。樣樣事不用去得我們丈夫的允許。嘿！自我作了代表以後，我不再信教了——我明白這些教會的事務多麼虛而無味，牠們怎樣的騙了我們這麼許多年代，我想在我們這些人之中沒有再到教堂去的。」

如果別人不要說話，大概她一定說不完的接下去。等到討論節育問題，才稍有停頓。從我對於鄉村婦女的經驗所得，以為她們必不怎懂得這個問題，但是她們却出我意料之外，好像懂得很清楚呢！當我們正講着新道德的時候，這藥房女人轉過來跟我說：「請你告訴我，朋友，設若我把你的丈夫奪去，你會對我取什麼態度？」

我回答未完，她們又關於美國發問。她們要知道革命甚麼時起的，有一個農工婦女部沒有。她們特別地要我們明瞭俄國婦女運動並沒有什麼特重女性的意味。

「我們不是讓女人去反抗男人，」會長這樣的解釋，「我們不要舉一個婦女任職祇因為她是婦女，像你們在

美國那樣做法呀！譬如說罷，我們投票反對一個「富農」階級的婦女就如反對富農「階級」的男子是一樣的。」

當覺悟來到鄉村的時候，牠不一準是健全的方式。甚麼農工婦女部，戲院，圖書館，離婚法令以及較進步的農業方法不是牠的本來的面目。至於婦女一層，一般因合作社不能供給致而缺少化粧品的却很講究地以菜汁和乾粉之類代替。在星期日和假日高腳跟的鞋兒一閃一閃地在村街的塵土裏轉動。建設俄國新制度的一部分人們與普通的人類大致有甚麼殊別？關於這一層並沒有什麼希奇，照着。所可認為非常的祇是滿佈在俄國各村的婦女，不論牠有多少人數，她們對於新制度所貢獻之最優的已經響合，她們正學習讀書寫字，組織白晝育嬰房，開辦戲劇團，或甚至給與男子農業方法的更良善的模範。

村婦和男子在土地上有同等的權利，又有同等的權利代表家庭出席村會，在舊時她們是不讓到的，更莫提發言了。大約有一百萬農婦耕種自己的田地，做全家之家長。許多婦女也能大膽地表白自己的意思，雖然餘

衆則還是照樣的懼怯與落後。現在少年人也得到人的尊敬，不像從前那樣受蔑視連對於不關他們的事就不准插一句嘴說半個字。上年在蘇俄(R.S.F. S.R.) (註四)與烏克蘭(Ukraine)有十萬婦女被選入村蘇維埃，一九二七年更多，並有一六九個農婦參入最近在莫斯科的全聯邦國蘇維埃議會。婦女參加選舉的面積是在有選舉資格的百分之五至九十之間，但是數目仍在逐年增加。單在西伯利亞(Siberia)的村蘇維埃裏已有八千婦女，並在四十九個西伯利亞的村中，是婦女做蘇維埃的主席。

她們要保守她們固有的地位，不是容易的。鞏安那薩拉馬托發(Anna Salamatova)可以供爲譬喻，她是被選爲佛茨尼仙斯克村的領袖。但是村間的人並不讚美她的工作。本地有個農夫，是個大家庭的鰥夫，他以爲這位安那把所有管家務的能力全耗費在村務上，是很不值得的，而且是可恥，於是他向她求婚，結果她答應了。她並不知道他是希望她辭去她的職務，可是當她發現是這樣，她才覺得驚奇。全村的人也贊成她辭

退。

「下車罷！」她們說，「現在你結了婚，再不能做個獨立的人了。你的主人要吃的，那你如何還能治理本村？」但是她不管人家說，自己還拿定主意，一方面保守她的地位，一方面還保守她的丈夫。

還有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 非奧多夏。歐細普夫那，許夏爾路發 (Feodosia Osspovna Shupurova)。我在報紙上見過她的相片至少有十數次，有一次我和她在莫斯科的一次農工婦女部的常會會場中交談。她常穿那件簡單的農人穿的外衣，頭上還戴白頭巾，這些是她不因名聲遠播而有稍易的。她年達五旬了，並且是從西北利亞的阿爾泰省 (Altai Gubernia) 來的。我請她將她的生活講給我聽聽，她說並沒有多少可說的。

「我是一個窮農的女兒。我父親早就去逝，留下一個大家庭。我十四歲的一年，母親送我到一個修道院去做事。那些神聖的人們讓我赤腳，差不多完全裸露去牧牛羊。我受不了，所以逃跑出來，後來又被僱用於其他的農人們。等我十七歲，母親就把我嫁給一個年約四十

的老農夫。他喝醉了酒，就像個瘋狗那般的難看，把我的靈魂幾乎打出來。我要離開他，但是母親說是罪孽。

到了一九一七——我們的村莊的政權，改換了多次。一九一九年柯爾加克 (Kolchak's 俄皇的一支軍隊) 來到。我把我們布爾塞維克的農夫們隱藏起來，可是僧士們看見了。所以兵士來找我，打我。自從那個時候我就不信教。我起始為農民工作。人家先是舉我做鎮 (V-olost) 會議的代表，我嚇壞了，整晚的哭啊！我想他們要把我送到那裏去呢？但是我到了那裏，和事物接洽，才眼光放大了些。他們又選我到縣 (Ooyezd) 會議，從那裏才選到省會議！這是我離家第一次的遊歷。我回家之後，乃從事讀書，每晚學兩三個字母。最後我又被委派到莫斯科的蘇維埃議會。農婦們說，「她是個婦女，跟我們一樣，可是她却能在莫斯科的中央執委會 (註五) (Vt-sik) 工作！現在我有學問了——我不再像從前的失明——我要為我們的農婦們竭力地工作祇要我還有一點的力量去工作。」

「對於你們的工作男子所持的態度如何？」我問她。

「好的，我告訴你！他們漸漸要恭敬我們的權勢，因為在蘇維埃裏，有時婦女比男子作得好——她們懂得如何的經濟。起先男子好似雄鷄般的對我們呼啼。女人懂甚麼，他們說——你們知道的只限於鑊與壺！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

「你們的重大問題是甚麼呢？」

「呀——我們也有許多問題啊——譬如學校就是一件事——可是我們的預算還不夠。我們仍有許多流氓和偷馬的賊——我們的法庭不夠嚴厲。還有一件事——我們的農婦們應當在分娩時享受四個月的假期和婦工們一樣。但是她們第二天就到田裏去。我們的農夫們看理畜牲比他們的妻子小心。」

不是只限在蘇維埃農婦的活動才能表示出來。許多在村的互助委會裏活動，給與貧窮的農民，寡婦等相當的扶助。有五十萬以上的農婦是消費合作社的社員。十八萬是一些手藝（Kustarny）合作社的社員，還有許多人入農業合作社。她們和這些組織中的男子人數比較，則還是太少，因為男子代表一家的的風俗仍然存

在。有幾個農婦却作了推事。我們有一天在路上遇見一位。這是因為她坐的巡行路線(Circuit)的那輛一九〇一年秋天作成的福特汽車恰巧壞了。她告訴我，為預備做推事她在羅斯托甫念了一年畢業的短期科，當時有九十九個男人，十六個婦女。要入這一科祇需有高小的教育資格，但是還要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政義須有貫徹的明瞭。祇有四個婦女能以卒業。她說：考試側重運用常識的能力比較書本的學問還要緊得多。

在村裏她審的訴件多是關於離婚後的妻子生活費的。

「要做個法官，」她告訴我，「真不是容易的事體。你須將情節的各方小心的衡度，並在蘇維埃的法律你不能照判例辦就是了的。每件訴訟要按各該特別環境判斷——去尋覓真理的所在，不是常常很簡單的——有時你的良心與事實證明的完全不同。自然，社會的公益總是先當注意的一個條件。」

她又講她自己信仰以道感人比壓制方法好。常常遇到一個妻子訴告她的丈夫，他必是粗暴地追捉她，來

勢雖然兇兇，但是與他理論了之後，他們倆就能講和或使他允諾一個有理的處置，連訴件也不用傳到法院去就解決了。

關於俄國婦女的新身分，切不要忘記鄉村的改革來得比城市慢得多的事實，並且大多數的農婦的生活仍然是受這場革命的改變，很少很少。但是對於「興發這般愚鈍的可能」發生懷疑的諸君，請他們聽聽最近的李息斯特拉塔，愛克先亞，卡刺西發 (Lysistrata Aksi-nya Karaseva) 的故事，這是在布賴安斯克省 (Briank Guberiua) 的維爾特耶夫卡 (Vertyevka) 村報告來的。

起先是愛克先亞參與會務，又漸與聞維爾特耶夫卡村的政事，她的家裏的人都氣極了，尤其是她丈夫西緬 (Simeon)。他總是忍耐着，直等到她也演說了，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他氣起來喝醉酒大打她一頓，訓她以後不准干預男子的事務。她哭了一會兒，擦乾眼淚，就跑到農工婦女部來。半小時之久全村的婦女齊集於學堂裏。她們開會了。

天漸漸黑。太陽下了山。男子可還在外工作。小孩



子哭啼了。牛還沒哺乳。豬豕等着晚飯餓得直叫。甚麼不幸的事臨到？農婦們去那裏了？鄰居互相紛紛出來詢問。「你的到那裏了？」——「不見了」——「你的呢？」——「失跡了」——「許是有人把她們全偷去了！」「奇怪——我在太陽底下活了四十年，向來沒見過這樣的事。」

天完全黑了。最末他們找到她們全在學校的校舍裏呢！他們像失火似地撞入學校，西緬也在內。他們包圍了全校。他們的喧嘩之聲可怕得很。他們要請求了，害怕了。

婦女全寂寞無聲。

後來愛克先亞站出來，手裏拿着一張紙，對男人們說：呼喊不能讓她們去那裏——他們要靜聽紙上所寫的才行。大家靜默了，愛克先亞開始的念：

「與維爾特耶夫卡全村已婚的男性公民，自維爾特耶夫卡全村已婚的女性公民。哀的美頓書。因為我們已婚的婦女——維爾特耶夫卡村的公民——生活在極困難之情形的底下，我們丈夫鞭打我們，從他們嘴裏聽不見好話，牛馬待遇我們，所以我們現在至於不能再有更

大的耐性去忍受這種的大凌辱，不得已出於寫這封哀的美頓書。我們贊許在家中工作，做我們丈夫的助手，但是我們反過來的要求：我們不用完全服從我們丈夫的意志，他們的手不能太自由，並呼我們「老醜」，「母狗」，「污女」和許多不能列舉的污名。現在我們告訴他們——我們必不離散，不回到我們丈夫那裏，除非他們全在這張紙上簽名完畢。」

有幾個男人笑了，但是婦女們還是照樣地莊嚴寂寞。男子明白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了。他們開始呪詛她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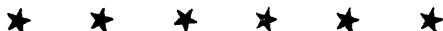
愛克先亞請這些男子們行為遵軌些，並又重覆一句，說在合同未簽字以前，婦女們是不會離開校舍的。

男子們站着不動，用很難聽的字眼起誓，又呼喚夠了，然後才如綿羊似的，一個跟一個，他們走到愛克先亞面前，手抖抖地簽了字。不識字的簽個十字架。

當會散了，到半夜的時間，西緬偷着回家，鼻下喃喃的作聲：

「每天都有點新鮮事。到那裏都見有些事新奇，不

同的。但是不打妻子叫我如何能活……？」



[註一]

按 Alimenta 一字原書著者釋爲：離了婚的父親按法對於他的妻或兒女的生活供給所負的相當部份。其實，這個字有時專指離婚妻的生活費或是撫養費，有時是指給與這妻子和她的兒女的生活費，有時也可以指給與離婚後兒女的撫育費。這個字的意思很廣，在第六章所稱的那種「妻子生活費」也是這個字。

[註二]

農工婦女部是屬於共產黨治下的，牠的工作很廣很多，幾乎所有關於婦女的事項牠都去干涉，尤其注意鄉村婦女的啓發工作上。牠在各地都有分部。牠的功績也很可嘉，本書後面對於牠有很多的敘述，所以，在這裏不必多介紹了。

[註三]

每「維爾賽特」是大約等於一哩的三分之二。

[註四]

按「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大聯合」(U. S. S. R.)是由(一)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二)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三)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四)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五)忒科曼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與(六)阿茲格柏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諸共和國聯合而成。此處所稱R. S. F. S. R.就是這第一個共和國。牠的簡稱應是蘇俄，以與蘇聯區別；但是我們常常見別人把牠們亂用，致使讀者不知究竟。爲易於區別起見，本書均照原來的區別翻譯。

[註五]

Vtsik 一字就是 All Russia Central committee 四字的縮寫。

## 第四章

# 婦女參與公共生活

當布爾塞維克們初得勢的時候，單區別婦女的工作是認為不必的事。憲法擔保給與婦女完全的平等，無產階級的獨裁政府強行牠，普及教育使婦女能夠使用牠，但是這些世紀傳下來的堅持力太大，婦女夠領袖資格的又實在太少。整個地說，婦女在政治方面，還不能算活動，雖然因革命的騷動和罷工而偶爾產生幾個顯着的奮鬥者，可是階級覺悟一層仍是有限，並且婦女大

部分仍是與新政府隔離。大體說，農婦們是反革命的，至於在婦工方面，雖能得到較多的贊助，但她們對於實行創作，則又多是太缺乏訓練和太落伍。普通宣傳的方法與教育，都不能興起她們。因此，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勒開的第一次婦女勞働會議便特別地決定組織特別委員會去經理：教導婦女利用她們的權利的事務。後來這種方法覺得不足以達到目的，所以在一九一九年，這共產黨的「農工婦女部」，俄稱「哲那第」的，雖曾經一般人的排擊——他們以這種組織祇偏重婦女一方為主要的理由——但畢終成立了。這樣，婦女的運動立時增加。千樣的意外事，油然而生，臨時的「紅看護」也到前線去，許多婦女任軍事上的職務，掘戰壕，安鋼絲網，或在戰地實施政治的和教育的工作。在紅軍隊死傷的婦女約近二千之衆，有二十八個婦女竟獲得「紅旗獎」荒年的時候，農工婦女部又為救濟的工作急忙。在革命以後，並沒見奇著的婦女的增多，許多人覺得奇怪了。縱使我們祇有一個女委員科倫泰（Kollontay），——後來做世界第一個女外交大使的——但在民衆之間，可

還有大幫大批的婦女行着勇敢的事蹟呢！自一九一九年組織農工婦女部以來，婦女入共產黨的人數已由六，四九九增至一四〇，〇〇〇，婦女今日為全黨人數之百分之一三·一，從前只佔百分之七·八。其中過半數的女黨員是勞働婦女。增多共產黨的黨員並不是農工婦女部唯一的職責。她們的使命，牠們的工作，却是關重教育的——教婦女如何行使她們的權利，增進她們對於政治的明瞭，並預備她們使能參加於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大事業。完成這個目的的根本方法是「婦女代表團」的組織。每十個工人中選出一個，每百個管家婦和農婦中選出一個。每年選一次，並且參預選舉的人數要讓她們越多越妙。這些當選的婦女在一位訓練過的黨員領導之下，受得她們政府的構造與政府的問題，婦女的權利與地位，以及教育，合作，生活情形等問題的課程。每月集兩次會。勞工婦女的綱領集中於工業和工會的問題，農婦的則集中於農業的和鄉村的問題。

每一班的代表又分為若干組，為的是：便於對於某特別問題詳細的研究，各組人員對於地方蘇維埃，合作

社或工會組織就是練習員的 (Praktikant) 關係。這些組織的領袖是受了上級的訓令務使這許多婦女漸而和各個組織完全熟識的，並須分配她們一些實習的工作。一九二六年的秋季，全國舉出五十萬代表，百分之六十四是農人，百分之二十是工人，其餘的是主婦，公事房的職工，與私人僱用的僕役。每年一班新的代表選舉出來，那末，「卒業生」變做教員，同時又在她們練習的組織裏就一個特定的職務。代表們有定期的開會，報告一切於「各選舉會」。農工婦女部又實行「平民的工作」，由集會，商議，與會談，她們設法喚醒那些不是代表的農婦和婦工們的興趣。

每年農工婦女部的領袖們從俄國的各部來到莫斯科開會議。阿提歐琴那 (Artiokina)，——從前是一個織工，是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裏的幾個女委員之一，是農工婦女部的主席，上年十一月我赴的那次會議也是她主席的——智慧地穩重地主持會務。她又得到喀利金那 (Kaligina)，——一個深思遠慮的農婦——的有力的扶助。在那赴會的一百五十人左右之中，大多



數都是在三十歲以上，多數自革命前就有黨的「背景」，雖然也有一般農婦與婦工是一九一七以後才開始活動的。大體說，她們是穿戴得很簡單的，甚至於穿着很貧寒的衣服。但是她們都像非常的能幹，她們的會議正是遵循很有秩序與鄭重其事的方法。其中有幾個貌似專門的政治學家，但是大部分的婦女還是帶着「母氣」。除了一個剛來莫斯科的比較羞怯的農婦以外，她們全是極好的演說家。照我所覺，她們的演說含有較少的廢話，比起我赴的其他的會，那裏男子多是談天似的演說，要好得多。

直跟着這次會議，就是共產黨第十五次的年會，他們的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使黨的政策實行到婦女當中。今日共產黨的根本工作是「工業化」與「一國的單獨建設社會主義」。他們用「工業化」三字的意思是指復元的時期已然過去，重新建設的時期開始了。工業與農業已經復元到戰前的狀態，在舊機器與舊方法之限度內不能再增多出產了。他們現在不是要注重消費的物品，乃是須將全神置之於生產器具的製造；陳舊的，耗費的

方法須給新機器與工藝讓地盤。不要以為農業是在工業化的綱領之外。農人們不祇要為日增月累的工人們預備更多的食料，與他們從城裏得來的製造品相抵，不祇要供給更大的剩餘去做俄國現今還不能自己製造的機器的購買經費，他們還必須為工廠準備更多的原料。所以，這樣農人們也需要新方法和新機器——農業本身先須工業化。

中心於「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是一班共產黨黨員信仰真的社會主義能在一國得到，不管世界其餘的國家有了任何的革命運動的學說獲了勝利的結果。那就是說，在擴張國家的工業之上，更加要小心關乎集合組織的開始。也就是說，減低製造品的價格，並嚴厲地強行「經濟制度」。他們知道這些事情都非完全地並智慧地與婦女合作不能成就。黨議會通過有力的議決案，懲責那堅持對婦女用固執守舊的態度的人們，並堅決用加倍的力量去增進婦女的活動。

這次年會的主旨乃是集中在使工作更形有生機與更實在。多數的婦女也這樣地承認：現勢是趨於關乎論

理方面的問題太甚了。比方罷，人家描寫會情：說演說的人把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a)的合作運動述其梗概，而對於街頭的合作社反而隻字不提。所以本年的綱領務使科中的各門課目都是關於地方的實際問題的。

「我們現在沒有功夫盡講烏托邦了！」(註一)一個代表對我說，「我們根據所得的材料盡全力去做。我們還沒教平民們怎樣洗臉漱口刷牙呢——祇要我們完成這一點，就是大勝利了！」

於這滿着談諧的間斷的與智慧的提議的會議的澎湃之中，我們可聽得委拉，亞歷塞耶發 (Vera Alexeyeva)的沈重聲音。她是伊凡諾夫，佛茨尼仙斯克 (Ivanovo Voznesensk)農工婦女部的主席。當我跑向前去問她在她的縣內的織工的情形怎樣，她提議讓我出來在外面單獨的與她交談。

數星期後下着微雨的一天，我坐着馬車經過大織業的中心，臨到窄小的部分——她家的所在。我的馬車到時，委拉已在門口衣妝完整的出來迎接我，她於是就帶我進一間小室，那間小室擺了她的床和一張棹

子，若再加上她就更覺得擠了。一盞燈還微弱的燃着，燈光照映在棹上的一本展開的法文文法上。

「這是我唯一的讀書時間，」她解釋着，「去年在這裏有一個由法國派來的委員呢！我現在念法文好同一位同志通信，因為她將法國的婦工狀況寫信告訴我！」

她的母親，老邁而強健的似一棵老松樹，一陣間已把早飯預備好，於是委拉的孩子帶睡的走過來用飯——一共三個，最長的似是較她母親細小而美麗的一版刊本，她們母女的相像可想而知，最近她由在烏克蘭 (Ukraine) 的教員訓練科回來，她現在第一個職業是在一個工廠的白晝育嬰房服務。

這位老母責罵式的轉向我說：

「今天委拉亞歷塞耶發本打算上醫院去開割的。幾個禮拜前她就要去啦，一會兒這件事，等會兒那件事，老耽擱着。」

委拉快插嘴：「這兒，這兒，母親，」她安慰着說，「這位朋友在這裏祇停留這一天。明天我就可以去的。」

早飯後我們立刻動身。這是在俄國，要在他處委

拉的那種奇怪的樣子必早被人所注視和嬉笑了。她頭上頂着一頂男孩用的粗便帽，搖動得比小孩子戴着還厲害，一件不好描寫的並滿鋪灰塵的黑外衣穿得歪歪扭扭，而且她的胸膛是突起，她的短裙露出六吋的白長襪在粗重的黑鞋之上，她的鞋外又穿上男人的套鞋，在我們跋涉於黏的爛泥之中的時候，那對鞋加倍的大了。

委拉事情太忙不能把自己的歷史說多少給我聽，但是我已經曉得一點。她在十歲就到烏克蘭的一間香煙製造工廠作工，工資每月才七盧布。她會加入許多次的罷工，入獄的次數也多得不能記憶。她先是一個社會革命黨的黨員，後來又加入布爾塞維克於十一月的革命。她曾被遣到前綫給兵士們做宣傳的工作，而且在內爭時她親身參與。當「佩盧刺的匪徒」(註二) (Petlura's bandits) 在烏克蘭掠劫妄為的時候，她又曾任隊裏的三個軍官之一——其餘兩位是男子——日夜在征擊反徒之中的有好多個星期。她真是勇敢！

「到了和平，他們都請求我去作婦女工作。大家都笑了。他們從不以爲我是一個農婦。我起初自己也不常

想到這件事——我習慣於四處奔跑像個男人一樣，並且穿着男裝。那時我還瘦，常被人錯認為男子。但我須服從黨的訓練——後來他們查出我對於那種工作還不算不合適呢！」

我問她自從她參與婦女工作之後，婦女的態度有甚麼大改變。

「分別可大了！」她回答着。「我還記得我召集的第一次婦女會，我怎樣去請婦女們出來討論我們所有的切身問題。一個跟着一個站起來數說自己的困難。每個人都要將她在革命與飢荒時期所受的痛苦敘述一遍。她怎樣才能得衣食，怎樣才得到工作，爲甚麼這許多惡運都臨到她的身上。現在她們討論着我們的問題了——怎樣去組織白晝育嬰房撫養我們的小孩子——怎樣去增進我們的環境。這是一個大進步，婦女能在思想動作兩方得着全體的觀念了。自然不是完全這樣。仍有千百的婦女還是像從前的生活……。」

我們來到一間大故宮，那在從前要有一個男人，一個妻子和十五個僕役的，現在這大理石的廳內是本省

所有的共產黨的組織的所在。委拉，亞歷塞耶發便離開我，到農工婦女部的總部和她的助理講幾句話。她說就要去工會的執委會裏報告事情，並不久即能回來。這位助理前沒多時候還在比姆(Bim)——本地最大的織造工廠——做工的，她告訴我：說本縣的一二六，〇〇〇織工中，三分之二是婦女，其中二六，〇〇〇又是農婦，這般農婦的加入工廠還是這兩年間起始的第一次呢！

「你可以自己幻想，要使這些婦女對於社會的與政治的問題感覺得有趣，是多麼難的事，或是在讀書方面，教她們認字書寫怎樣的費力。她們多是每早由她們的鄉村出遊，自五至十「維爾賽特」(見第三章第三十四頁)之遠——晚間才回來。你可以看見她們在早晨在路上向四方的奔走，好似黑蛇一般，我們還怎能希望她們去赴會！我知道這是爲甚麼——我有三年也這樣做過的。」

不顧這些難處，上年一年之中，農工婦女部用各種方法和力量已能幫助這類婦女中的三萬人，而且其中有八千以上的婦女是代表。在全省內，牠組織好五十個

幼稚園。婦女求學於政治學會的，以千百計。有三千婦女是在關乎家務或與她們有直接關係的其他問題的團體裏做會員。她又說：大多數的活動，是兩年前委拉來了這裏之後才組織的。從那個時候以後，婦女被選至蘇維埃的人數由百分之十九增至二三，婦女在合作社作股東的人數又由四八，〇〇〇增至七〇，〇〇〇，在共產黨的人數又從百分之十八增至二三。四。

差不多過了兩個鐘頭委拉，亞歷塞耶發才回來，爲的男同志的頑固，不自覺地搖起頭來。

「在省的工會執委會裏只有兩婦女，」她解釋着「所以早已經決定在新委會的候補名單上要加上兩個婦女。但是到最後，有幾個男子又反對了。他們說甚麼我們還須多做些教育事業，婦女才夠得上担任這樣重大的職務。我指出這一點，就是：一個人的一年的實地經驗比他五年的求學，所得教育的功效來得還大，所以，假若男子不給她們機會去多任些職務婦女就永不會得到相當的教育。他們後來贊成了，所以現在我們有四個婦女的名字在候補名單上。她們這幾位的當選是毫無



疑義的了。」

我略參觀了比姆工廠之後，就到合作社的膳堂來小食。在這裏我看見委拉，亞歷塞耶發的女兒在一間可愛的白晝育嬰房工作。我們和一個曾派到莫斯科練習代理的婦工一起去看工人的俱樂部。在路上委拉指示「音樂技藝傳習所」給我看，在那裏儘是工會派來的一些較有天資的工人。我又請問她農工婦女部與工會的文化工作有甚麼樣的關係。

「那是，」她回答說，「近幾年來的一個清楚的披露。起先所有工廠裏關乎婦女的工作都負在對農工婦女部負責的一個女組織人的兩肩上。結果，常常發見工廠的委會對於婦女事務，不從事創始的工作，並在他們的節目上，他們反對加入一些對於婦女有特別關係的題目。當婦女去赴會，她們總常遇到這種的言語：「好罷，看婦女們有甚麼可說的！」這樣一來弄得婦女不敢發言，組織特別的婦女會變成需要的事了。雖然對於提起婦女的興趣一方面確能獲得相當的效果，但是這就不免漸而發生一種「我們」與「他們」的態度，所以我們決定

改變方法了。最近的一次織工會會議投票通過把婦女工作的責任轉過來完全放在工廠委會的身上，並命令各工會將和婦女有特別關係的問題劃入他們的普通目錄中。這一舉竟得到很有力的效果，並且工會自此以後，對於牽入婦女使參與他們的工作，也分外的勇躍。現在仍有農工婦女部的組織人在各工廠中，但是她們祇集中於代表團和黨的工作，而各工會則料理所有的普通的與文化的工作；所以，歸終還是農工婦女部給工會闢出一塊田地來的。」

在這大俱樂部的所在，第一班來的工人是由工廠的，這一班就把所有的房屋塞滿了。一羣的少婦和處女學習剪裁和縫紉，同時在她們之前還有演講，題目是關於婦女參與將要來到的蘇維埃選舉的重要。

「如果用這個方法不能使她們明白，我們又試用別的方法，」委拉，亞歷塞耶發這樣說，「還有許多婦女要使她們去赴會簡直是辦不到——但是當我們講些實在的事情——你猜她們怎樣？在她們縫紉之時，我們能給她們演講關於政治，合作，衛生等等的題目——我們

普通總由看護小孩子講起。她們不知不覺地就感得有味了。我們的宗旨是要使她們真實的想參與——不是把問題硬塞在她們的面前，讓她們做被動的事。」

這裏有另外一間房子是專為性的衛生，有表和圖指明交媾病症的影響，警戒早的和雜亂的性的關係，和用酒精的危險。工廠的醫生正在給一羣的婦女講演衛生學。健身房充滿了女人。在大堂，男工和婦工正在排演一出戲。

委拉，亞歷塞耶發不祇是所有這些工作中婦女部分的後面的指導力量。她還要為促進各村莊的婦女們的情形而費斷心思，常常她遣出許多組織人去看看各樣的工作是否確經實行於農婦之中。她又要計劃開闢夏日遊戲場，聚會，到各處親自監督。她的晚間和白晝是一樣地滿着事務，甚麼組織班組與教授班課，主席會議，和預備報告。她誠是一個力的發電機。她是俄國千百婦女中的一個，是那般人中的一個：她們不等任何覆沒的，忽然的鼓勵或禍患指示她們的道路的，祇顧在她們的職務上，一天天不斷地把世紀傳下來所建立圍繞

她們女性的「無知」與「偏見」的厚牆，一片片地斫下來。

雖然農工婦女部的主要工作是關於工業的工人與農人，但是牠並不一點忽略公事房的職員，家庭的主婦，或私人僱用的僕役。她們扶助這般婦女的方法是由工會，代表團，或合作社。私人僱用的僕役普通是無知的農家女孩子，新從鄉村出來，對於蘇維埃的法律一點兒也不懂。可是不久她們由農工婦女部聽得她們的工會的存在了。又能洞悉工會為保護她們的權利，把工作時間改到每日八小時，一星期有一天休息日，還有特別的假日，假期和社會保險就和其他工業的工人一樣。家中的主婦們要離工廠的俱樂部不遠的，讓她們也加入工廠的文化的許多運動，那些住在「工人村」(Pos-iocok) 或公共住所的，就按居住地點的方便，給她們組織特別的代表團體。

農工婦女部又利用合作社去實施婦女特別的工作。合作社常自動地籌備款項組織白晝育嬰房，有些又辦一種特別的「母嬰室」專供嬰兒用品。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消費合作社的女社員已達一，五五八，六九〇

人之多。婦女當中的生產合作社的運動也正在開辦，在許多的村莊裏，寡婦與孤身的婦女們業已組織一種「協作社」(註三)(Artel)，專為牛油與乾酪的出產或加上一些手藝的工業的製造。

三月八日的「國際婦女日」是全年的綱領中的焦點。在這一天，各種特別集會和會議普遍全俄。這是開辦新的白晝育嬰房和「詢問處」，(註四)新的膳堂和洗衣房與升進婦女們到較高地位的特別的機會。婦女的報紙出版特號，全俄所有的報紙在這一天一律專載婦女運動的新聞與文件。她們早先就有了預備，婦女們在這一天全休息半日去赴會。所有的戲院子因她們開會要借用，所以在這天晚上也一律停演了。

農工婦女部的總部出版四種的月刊。遍全蘇維埃大聯合，大約有十五種婦女報的流行是夠得上三三七，四〇〇定戶的。這數目並不是代表閱者的人數，因為定者常為團體，俱樂部，圖書館，村間閱書室等等。這些報章是用最淺易的文字寫的，並且喻解的地方非常的多。當某工廠的稽察宣佈：說有許多的婦工定閱時裝雜誌，

農工婦女部即刻添上時裝的篇幅和模樣的刊印，自此以後牠們的銷路格外的推廣了。她們又想一個特別的方法去增添這些報章的女勞動通訊員(Ralkor)與女鄉村通訊員(Selkor)——就是從工廠與村莊的婦女做通訊員的——常期的投稿者也上數百。而且也有人鼓勵婦女去做定期刊物的通訊員，所以在全俄的二四〇,〇〇〇個農工通訊員中,三〇,〇〇〇是婦女。這的確是一個要緊的機關。因為由此人們可以表示他們對於普通政策或工廠經理的或鄉村官吏的管理等事的不滿，按這樣辦，她們常常能夠改良或採取某種的方策，因為這種信息雖是不能全登，却是很受重視的。在那般天才較高的勞動婦女通訊員之中，她們已組成——在莫斯科和別處——一種團體稱做「無產階級女作者學會」的。她們每星期由工廠出來集會一次，對於彼此的文章互評一下。

農工婦女部的工作滿佈全蘇聯的每一條小巷每一個街角。若想了解這句話的意思須一觀地圖。散播在大俄，白俄，烏克蘭(Ukraine)，外高加索(Transcauca-

sia),中亞細亞與遠東地方的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以上的非俄種,全是屬於百餘的不同的人種的。到了泰米爾蘭(Timerlane)的與別的入了土的英豪的墳墓,那些莊嚴的白塔,杏仁樹,甘美的果子與其華麗的顏色的所在,婦女生活仍是醜陋不堪。在這些邊界的人們還生活於人都不信的原始狀況之下。他們的主業是一種粗愚的農務,種棉,牧畜牲等,在城鎮地方則有點手藝工作和交易。在中亞細亞,人口的百分之十是俄人,餘下的,大部分是回教徒。蘇維埃政府業已獲得完全的政治權,雖然,而回教法(Shariat)的規律對於社會習慣方面仍佔得更大的地位。男子們可以娶四個妻子,把她們一身囚禁在屋內的院子當奴僕看待,設若丈夫卒亡,這寡婦或寡婦們就連着遺產一齊歸屬他(死者)的最親的親屬。「買妻」(Kalym)的風俗仍在實行,一個妻子的價值是由二十頭羊到六十頭駱駝,各鎮縣不同的。因為一頭駱駝要值約一百盧布,所以貧窮的忒科曼人(Turcomen)們很可憐地哀訴,說他們連一個妻子也得不到,而富者却一個人常佔有兩三個。誘拐女子是女

子的父母溫和承許的，只要有很高的價錢在後面塞住他們的嘴。父親或丈夫使用婦女去作家中與田裏的勞動工作，慘酷至極。如果她須出外，一定要緊緊地遮面，平常他們準是不准她去市場地方購買她自己要用的食品和衣服的。在這部分人之中，實在婦女比男子多任生產的工作，因為他們自己幾乎完全專業於交易的事情了。

想要反抗的婦女都殘忍的受刑。在阿茲柏奇斯丹 (Uzbekistan) 有個婦人因為想除去面罩動怒了她的丈夫，致被鎖了五年。回教的教法准許一個為人丈夫的「削奪他妻子的自由，並在警告以後得科之以輕的身體上的刑罰。」回教法又判定以十二歲為結婚年齡之標準，但是結婚又常舉行於及笄的初次象徵，衛生景况簡直不能言喻，各種的病症都無不流行。

這些婦女自己是這樣的沒學問與不開化，所以她們完全沒有機會去明瞭蘇維埃已經把所有的野蠻的習慣風俗廢除，並把婦女的身分完全改變的事實。在一九二四年全忒科曼尼斯丹 (Turkmenistan) 祇有二十五個



識字的婦女，在阿茲柏格 (Uzbek) 人之中在城市大地才祇有百分之五。五是識字的，在村莊地方則為萬分之一。在一九二三年以前，在這些上述國家的婦女的地位一向就沒有甚麼改變。處處我們都看見入了黨的黨員常會給他家裏的婦女自由，但在本地的黨員則多分還是墨守故習。直至一九二三那年之後才有農工婦女部來為牠們工作，到現在婦女的宣傳達至各方，祇要是可能的時候，本地的婦女就派到俄國去練習，預備以後回來給本地的同胞工作。否則俄國婦女替她們工作。在這些縣邑工作的影響我們可由下面的事實看出來，就是俄國的女組織人與本地的婦女都幾次被暴怒的父親與丈夫謀殺。在東方工作的整個方略還須合乎本地的情形。要行使她們的選舉權，婦女們常常須帶好面罩坐在另一間房內，由門口或窗口干與會務。有些地方婦女的會更要完全隔離。但是本年婦女出來選舉的以千萬數，遍全東有一七，〇〇〇以上的婦女被選至蘇維埃，並且現在這些國家，婦女也有在最高政治團體任務的。三月八日全中亞細亞都是民衆大會和婦女會議。

許多乘駱駝而來，有些騎馬從中國的疆邊四百或五百「維爾賽特」之外到此。在那一天，已經有六千婦女把面罩揭開了。從那天到一九二七，六月一日又有八七，〇〇〇〇阿茲柏奇斯丹婦女不帶面罩了。

使東方的婦女與男子互助地同度文明的生活，恐時尤過早，現時的工作祇限於婦女的俱樂部的組織。着手方法是教導她們一些關於清潔生活的淺近法子，例如使用肥皂，許多人還不懂的，還有母親和嬰兒的保養方法。在塔士壘(Tashkent)與巴庫(Baku)農工婦女部組織了一些模範俱樂部，每俱樂部約有二千人。每個有配藥房，詢問處，白晝育嬰房，產科等門課程各一，又有許多課程關於認字與書寫，初步的政治，打字，工廠以及戲劇的，音樂的和美術的各種班課。散蔓在小的鎮市和鄉村地方，也有小俱樂部，女客寓，和「紅角」(見第二章)等等，——在這些「紅角」地方同樣的工作在進行，——並以地方情形所許所能辦的為準。

游牧人之中，又有所謂「赤營」的實現，牠們勾結婦女去赴會，漸漸地發達更多的有組織的活動。這一般人

裏面有七〇,〇〇〇個婦女代表是經常的赴會和上課,千百的婦女又能從函件,電影與普通會而得連絡。在東方人們中,有一八,〇七五個女共產黨黨員,佔全數的百分之十八,但是就中又祇有百分之二十是本地婦女。

農工婦女部幫助婦女要求特別的學校,因為革命後本地所立的新學堂祇限於男兒。在有一五,〇〇〇以上的婦女正從事認字書寫,大約千餘的婦女入了在塔士墾的高等學校,同時在這些地方又開辦了一些為訓練本地的女醫生與女教員的課程——從前所沒有見過的。到處都有農工婦女部設立的經濟與法律扶助部分,在那裏多少的婦女才第一次了解她們不是一定要屈服於丈夫腳下的原理。白晝育嬰房和幼稚園也開辦了,還特有為母親和嬰兒的特別機關。合作運動大家也漸而懂得了,牠們的着手方法是開些特別的婦女店,在這裏婦女畢生第一次地得到機會自己去買東西。

全東最大的需求是學校。祇有從教育一途她們才能得到真的解放。同時有兩大力量正在解放她們:蘇維埃政府給與這般人的經濟發達的新機會,促增婦女在

家外工作的新需求；並且有農工婦女部的工作為她們作一更廣的活動的準備。

於婦女入共產黨的百分數目還是很少而且沒有幾個在黨內佔着重要地位之際，共產黨青年團 (Comsomol) 組織內的女子——就是在共產黨的預備學校的女子——佔全組織的人數的五分之一，少年先鋒團 (Young Pioneers) 內——兒童的共產黨組織——則有一半是女子。有一回在莫斯科的共產黨青年團的一位年輕的秘書，很驚異的看着我，當我問他「女子部」怎樣。他告訴我現在已經沒有特備一部的需要，因為所有的工作都是關乎兩性的。他又解釋說：農工婦女部在這一代還是不可少，因為婦女從前得教育的機會比男子的少得多。但是現在的教育機會已是平等，在未來的一代，再不需特別的婦女工作了。在共產黨青年團組織裏，別處也同樣，並沒有幾個婦女佔得高的地位，雖然服職於地方單位的還很不少。一些女子們告訴我，起先男子們反對牠們的工作並且想法子把持全組織的權柄，但是現在已大見起色，女子們也能表白她們所能做的。我了問

一個在該團的，誠懇的女子她們對於這個組織的興趣是甚麼。

「要在某種的工作上得到技能！」她毫不尤疑的回答，「結婚的問題對於我們完全沒有趣味，不像我聽美國女子那樣。我們的興趣在糾合真實的同志——那些也是有技能的勞工——和這般人一起，我們可以建築生命在一永久的基礎之上。我們在家庭要得甚麼？……說我們要安樂，我們要文化的利益——我們有公共的廚房以及等等，所以我們不必為那些小事情煩惱了……」

共產黨青年團內的女子就像農工婦女部內的婦女一樣的能幹。無論在何處——在工會，大學校，村莊——人家常希望她們的，並且她們實在是，年輕人中的領袖。她們在各處的人數雖不相等，但她們工作的成績都對於她們的組織或社會得有相當的價值。莫斯科的共產黨青年團組織業已成就，可嘉的工作滿佈全省。他們組織成了六百個「農業的學會」在鄉村地方，成年人與少年人均能參與。第一年他們一起在晚上讀書，第

二年就實地去作些工作。雖然在這些團體的七千人中祇有八三九爲婦女，但這已是大進步了。有十二個學會的會長是婦女，在這些學會裏很多設有家政學的特別課目。這共產黨青年團正在設計增高鄉村的農業之水平準並集中於使農家棄掉「三條地段制」，代以輪流收穫的「輪迴制」，改用選擇過的種子，改良養畜的方法。他們已能使在莫斯科省的十七個鄉村循用「輪迴制」，有些地方已實行聯合的看牧牲口，這是首次指明這些農家：改良的牲口的飼養與看守方法所得的結果，比較用以從前的方法所收的效果分別的甚差。就是這些小「先鋒們」也常成就影響村莊的生活的事業，他們把在學校裏得來的農業改良新法教給家裏的人，組織模範區，並派出委員們去任監察衛生的事宜；這樣，清潔的宣傳也能散至各方。

★ ★ ★ ★ ★ ★

[註一]

這是摩爾公(Sir Thomas More)幻想所描摹的畫

善盡美的一個海島，是以人稱理想的事情，理想的國家，以及理想派的人們，全以「烏托邦」一詞代表。

[註二]

按在俄國凡是反共產黨的全稱「匪徒」，所以這「佩盧刺的匪徒」就是指——這個在佩氏領治之下的反共產黨的他種黨羽。

[註三]

這就是合作社的一種簡單形式。

[註四]

參閱第十章母親和嬰孩。

## 第五章

# 婦女和教育

不惟舊俄的教育機會給與男子較婦女爲多些；弄成婦女不識字的數目三倍於男子，而且這舊制的笨滯對於婦女有特別惡劣的影響，因爲她們的生活本不需甚麼反抗。男子們因環境的關係，縱然不能完全以所學應所用，也至少要依他們學習過的一能一技去尋位置的，因此這個老法子的呆板的影響也多少因男子須出外謀生而能享有與婦女不同的地位。至於那寥寥無幾



的一般受過教育的婦女，可就沒有甚麼事情鼓勵她們去深求了，因為她們必遲早要轉到那無終的和反覆的家務瑣細的職務常規上。教育並不貢獻甚麼給婦女使她們做更好的管家婦和更好的母親，或引她們進入更廣的社會的福利。

俄國的新學校已經廢除舊方法的大部分。教育的問題在本叢書內另有一本專冊討論，但因唯由教育婦女解放的計劃始能致效，所以無論甚麼關於婦女的新身分考查而不涉及那對於婦女有特別重大關係的教育的狀態的，是怎樣也不能認為完備的了。蘇維埃政府是正從事於重建她的整個的學校教育制度，按着那在美國已經單獨實驗過的新方法而建設。新教育的最大的貢獻讓來代的男女平均的分配。牠賜與兩性新期望。牠會使人的頭腦變成一個有力的工具，可以用來建築一個新的世界，並給每人不祇對人生的了解與敬重，而且還有智慧地參與這種進程的預備。在今日的俄國，對於教育的功用，大家都這樣想：不再祇是輸灌一些未消化的事實到兒童的腦筋裡，而是供給兒童一些刺激讓

他們由創造的經驗自己去求得學識——啓發他們的好奇心與駭異心，這兩種心理是偶會有龐大的力量去消滅障礙的，但是很多的教育却爲之阻塞，並且常因愚鈍的與誤謬的方法自己的本源也被杜絕。牠提議預備男女兒童對於他們的才能能夠最理智的和完全的運用，並重鑄他們的環境使更近人們的需要。

這切身的環境和牠的生活與勞動方法係兒童課程表中的第一項。再往下，漸而擴大界限，兒童就來研究鄉村或城市，區域，國家，最後，國際的問題與關係。課目全是集中於這兩篇中心的文章——自然與人們，勞動與社會——的週圍。這種有關係的題目的結合叫做一個「混合」(Complex) 教員和學生一起選出某個特別的假設，或團體的作爲。比方，他們採取窩瓦 (Volga) 河當作假設，然後研究這塊區域的歷史，地理和經濟情形。他們的研究要包括特別的考察工作，用算學去計算面積，出產和人口的問題；用文字專作各組所選作的特別方面的報告書。模型與繪圖用得很多，還有圖表和圖解。我還看過這種非常細緻的工作的展覽呢！

在程度較低的當中，書是很少用的。因為頭幾年兒童的工作是隨着一個教員教導之下，過後這個「混合」方法才拿實驗方法代替。在這個地方，兒童在實驗裏把問題的種種狀態求出，這個時候就改為在好幾個教員之下了。在鄉下的學校裏這個方法時常辦不到，因為常常在一班裏只有一個教員，而且他要擔任教頭七年的樣子。演講和考試的老制度已經完全不見，教員變做班裏面的一位人員罷了！學生自治會發達得很廣，牠本身也是一極重要的教育原質。大體雖然男孩們比女孩們活動，他們佔着較高的地位，可是現在也有許多女子在學生執行委員會和各特別委會裏了！

新教育的一種狀態，對於婦女有特別重大關係的，是自侍的專重。不論男兒或女子，都是一樣。因為在將來例如鋪床，補襪，拭掃等事全變做每一個人自己所應當做的一部分工作，就像沐浴和穿衣對於自己的關係一樣的；除非這類的事能夠讓公共的組織料理得更加便當了，這些事還是應當歸給各個個人。牠把這些事情劃在兒童訓練之內，實在是學校分去家庭功用的一部分了。

設若新的教育的計劃大綱能夠十足地實行到全俄的各方，到處也確有經過好訓練而有智謀的教員把牠實施出去，那就不用再費事去爲將來的婦女設法如何去運用她們的權利了。在這些新學校還在試驗期內，牠仍是摸索着沒有成熟，和在尋求資料。一切教員全要重訓練過，一切不適現況的方法全要廢去。舊的教員已在重受教育，新的訓練出來，但是他們多分是對於這新教育大綱沒有了解，就有，也不過是極少的一點一知半解而已。實用這種新方法的面積，在各處不同。你可以看見，在莫斯科和別的大樞紐地方，這新方法實行得極廣，而且雖然得到不等程度的成績，但是總是有有趣的結果。我也看見過牠行使於鄉村，並且得到很好的成績的。可是有些村莊，比方馬斯羅甫庫特罷，就連一點影也望不見。小孩子們合聲誦讀，並拖長地念着，跟從前一點兒也不差。但是在鄉村常有遊歷的事，出來看看機器房的工作，監查牛奶室的清潔，觀察田裏用的機器，爲是要調查美國人的生活到底怎樣。處處都見著他們懇切的小眼，他們問個沒完，也寫許多筆記。「你們美國

甚麼時候就要有革命了?」[人家說瑪利壁克福註一)死了,真的嗎?][怎樣你們的雀麥長得這般的高,高過農夫的頭了?][你們怎麼把豬養在這樣乾淨的地方?],[美國農夫的田地裏也安置電燈嗎?]

自由的普及教育是蘇維埃共和國最初所懷幾個好夢當中的一個夢。華麗的貼物和字圖廣括地散播到那些新鄉村和城鎮裏,激起人們對於本國文字的醒悟。宣傳用的火車穿行全國做散布文學的事業。在索洛欽斯科耶(Sorochinskoye),荒年時牠是美國圭克兒教(Quakers)的總部所在,這裏革命前祇有五間學校,但經了這第一次的變亂後,這裏又加了十七間新的了。他們又支配學校的用具,請了一些學問家來做教員。大學專門都因學生超過能容的兩三倍而反致大患。一件災難跟着一件使政府轉重視線到別的事情上。到了一九二一年學校的經費又由中央政府移到本地的預算上。這飢荒又阻止迅速的進展。在那倒運的年間,好多地方的學校都完全關閉了。學校的用具也都被「吃光」,因為在那種情形之下,狂妄的人們所有的東西,全拿去易食。校

舍的門廊和樑柱救了許多將死的人們呀！

在恢復的實力是很宏大。饑荒的次年，我就出遊於四、五百哩之外去觀察變後的狀況。處處我總看見農人們開會討論些重開和重築學校的計劃。那個時候，教員的酬報是極微，差不多只夠延命就是了。這還是農人們自己籌出的，他們讓兒童在每個月初帶幾袋米麥去酬勞他們兒童的老師；多少就要看家裏的供給多少爲定。在這舊教育方法的缺乏組織與學校的設備的可悲的浪費之外，牠還萬幸中得到正面的影響，可喜的影響。有許多農人告訴我，他們的父母怎樣的打他們逼迫他們去上學，那些僧老又怎樣地勸他們不要入普通的學校，說牠們是反基督的工作的，祇有教會學堂才可以入。現在這般的老者却這樣地說：「我們是無知和暗昧的人——我們是傻子——但是我們不情願讓我們的兒童也成傻子！」激起了這樣大的教育渴望實在不是一件小可的成功罷！

就是用具的貧乏與缺少也有牠的正面。在這些新教育原理的回響還未達到那遠隔的俄村的教員之前，

他們被環境逼得無法也只好實用近代方法的最先進的了。因為在他們的學校裏，沒有一件用具，祇剩得一班生命圍繞着校舍。他們親眼觀察與繪畫這些家畜，鳥兒和花草，研究學問不用書。他們把學校改變成一個小博物館，種植他們的花園和荒場使學校看着頂有生氣的。有時教員從一個火爐講起——在一間茅屋裏。兒童儘管用一根炭在舊的木板上繪寫。用的紙是政府的登記薄的空白餘牋。鉛筆要<sup>到</sup>這個程度等牠不過是一根小棍夾着一點小鉛頭了。這些「植物」也用到能用的頂端，兒童們有時要輪流着來，一天分三次。

等到中央政府又有力量來關心教育了，牠却又好像很冷淡的作。現在的問題是：非要等到能夠得着一筆基本經費，不能進行的，而且那筆經費須能保險夠充分的教育與充分的進展的，方為合格。他們又感覺得減少高等教育的學生的人數為必需的事，因為這個樣子可以好好地教導這般留下的少數，並且由此便能側重於初等的教育。所以，這樣他們便酌定將優先權給與工人，農人以及他們的小孩子——從前永沒有入過高等

教育的門徑的階級。選擇留下受高等教育的學生的辦法是考試他們，並且對於有資產階級背景的尤其的嚴厲，所以在這一班人裏祇有很有才能的方能被取。

他們對於教育制度的態度忽然有了一種重要的改變，對於這種的態度，有兩件事實是負責的：（一）是一個共產社會的真確的實現被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的壓制的影響而致延期；（二）是那些資本主義的列強用封鎖和干涉的手段，使俄國不能完全集中於她的建設綱領上。蘇維埃政府業已一致地需求和平發展的機會，並且牠深信現時的進化是和平的一個恐嚇，以後總有一天全世界的資本主義要發生衝突。所以教育的問題不限於教導兒童在一個共產社會中如何的生活，而且問題在，要怎樣才得到一個共產社會。這就要從他們仇敵的書裏取下篇幅由嬰兒時代就教小孩子們以規條與口號當做他們的福音。「教育，」盧那卡斯奇（Lunacharsky）說，「是保護內部策略的盾牌，由那些策略共產主義可以成熟。」但是現在他們把牠用作更戰鬥式的工具了。



與其說俄國今日的新教育是自由教育，不如明明白白她說牠是共產主義的教育。這並不是說他們已經廢棄了他們的本來的意思的任何之一點。祇是因爲他們覺得一天他們還是被仇敵的世界圍繞着，他們的根本着眼就一天不能放在發達個人上，他們但以發展更堅固的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爲中心。若是遇到智慧的教員，這兩件事都可以並顧。但若須棄其一，就棄前者。對於這種制度不滿的人們請他們記住這個制度還附帶着一種創始的智慧之發達的更大的機會給與人們——比在這世界的任何地方給與若般多的兒童的這種機會都是更大更多。我們不管他們施用的方法是怎樣的一種狹窄的政治形式，但他們對於兒童的新規定是簡直不啻重築社會了。當蘇維埃國家需要人民盡忠盡誠的時候，牠並不求人民對過去的事跡盡忠盡誠，而是對在牠後面立着未死的思想。兒童們本來對於牠有極大的興趣，因爲他們自己也幫着建設牠，他們親眼看着牠一點一點的長大。由婦女一方觀察，這件事也是非常重要，因爲人家盼望她們能負與男子同多的責任，而且現

勢是去個人家庭的單位越來越遠，並且我們可以假設所有的婦女在家務之外，還有規定的社會的功用。這是供給男女同等的教育機會的政策。

俄國的教育竟擴張到頭幾個月的嬰兒們，現在在嬰兒的設立裏，那般職員要有師範的與醫藥的兩種知識了。關於這一層，他們要費特別的心力去介紹至多的色彩，至繁的種類和活動到兒童的環境上，爲的是抵銷那在無論任何設立都不可避免的常規的生活所生的反面的效果。有些無知的和固執的人爲兒童應當和玩具隔離，說這是「中產階級主義的遺物」，但這不是普通公認的計策罷？玩具對於兒童的發展是認爲不可或少的，就同空氣和光線對於他一樣。但是人家舉薦無論給較大的兒童，就是給很小的兒童，那些玩具也以最本原的形式比製好的玩具爲宜。這是因爲要刺激他的創作能力，所以最合宜的玩具是「那些可以用來做別的玩物的東西」。教員最好少干預兒童自己的活動俾使他可以儘量地發洩他的天才。社會的義務在最早的遊戲形式當中就指點與他，常常兒童會輪到「在職」的時候——幫

着舖棹子，遞送碟子和拭洗。他們的小圍裙做得很方便，他們可以自己帶上，小房子做的很低，讓他們扒得上去，手巾和牙刷都有特別的記號，讓他們可以辨明自己的，洗臉盆也放得剛好讓他們拿得到。醫學專家們正從事一種所謂兒童「心理生理學」的特別研究，決定由幼時訓練的最好的方法，把身體的康健與教育的工作合成一個統一的綱領，預備作兒童將來的訓練標準，並且尋出工作和遊戲的法則使不過勞兒童的心力。學校的教員們也當幫助兒童的母親，設法使他們家庭的環境達於衛生的境域。按着母嬰部的俾邦諾發 (Bibanova)的見解，這些對於小兒童的教導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鼓勵兒童的活動；發揚集合主義；指示他們世界的真面目；建設健全的衛生的與工作的習慣；並訓練他們使能自助。」他們也有很大的重點放在發展「對於生活的樂觀態度」上，和真愛惜並了解兒童的人們去為兒童工作的需要。

在白晝育嬰房之後的一步是幼稚園，遊戲場，或「預備入學的教育」，這一級包含三歲至八歲的兒童

們。革命後，幼稚園似香菌的崛起，有一個時候一共有八千，包括三十萬的兒童，但是不久差不多消滅到一個不剩。近幾年來牠們又復活了，雖然牠們的經費是地方供給，可是現在莫斯科已有一百零九間幼稚園，包括一萬兒童之多，其餘的中心大地也有相當的數目。事實上所有的工廠都附設幼稚園為那般出了白晝育嬰房的兒童們了。在沒有有組織的幼稚園的地方，時常有有訓練的工人辦理所謂「兒童室」的，牠們是和俱樂部連接，所以他們的母親可以把兒童暫留在那裏。

近幾年來，對於為在鄉村裏年越三歲的兒童設立夏日遊戲場的事加了特殊的注目，因為當母親在田裏工作的時候，這些可以分去她的勞，並且可以當作由白晝育嬰房至學校中間的一條連接的鏈子，這樣到將來兒童對於學校的規則更能容洽些。一九二五年教育部派出二百個練習員到各鄉村組織夏日遊戲場。除掉薪金以外他們甚麼都沒有，所以他們要為用具和飯食籌出款項，還須得地方人民——平常很仇視他們的人們——的擁護。後來果然每個學生——就是練習員——

得到地方各組織和農夫中的較有智識的的扶助了，於是籌得一筆經費能敷在最需要的幾個月開辦牠們的用度。政府原來投資的五一，〇〇〇盧布款項，後來更增至五十萬以上。每個暑天都增派學生出去。因為學生在一些地方的工作，和在別處的地方教員，醫生與農工婦女部組織人們的自動工作而得的結果，共計起來普遍蘇聯共有三千個夏日遊戲場（Ploshadkas），足以供應十五萬農家兒童的遊戲。現已計算出，在幼稚園與在初等小學的人數比例率是一和五十之比。現時的預計是想在一九三〇年把比例率降低至一和二十之比。

在「預備入學的機關」裏的訓練也包括在普通的學校的課程綱要的全部原素。第一件必需的事係兒童的生活須與環境密切地連屬。在建築他們自己的團體生活要他們切身參加，並在他們力量所及的限度內，分擔集團裏的工作，又把這些工作改變為遊戲的形式，所以個個兒童都樂於作牠。「在將實現的社會裡一個成人在常規的情況之下，他的勞動應當快樂和自由，」綱領裏這樣寫着，「並且兒童的勞動也是應該快樂和自由

的。]現在在幼稚園裏已開始組織自治會。小孩子們也開會，討論問題，議決案件。自然這般小孩子不能像在學校的孩童那樣的能夠自治和學生自己持權管理學生，但是使負物件有序和執行某種的淺易的事體的責任業已得到頗大的功效。在所有的訓練兒童方法中都側重自然的研究，「開導他們的觀察力與刺激他們的調查思想。」在圖畫，模倣和別的遊戲方面都給他們機會和鼓勵使表白他們自己的真相。音樂也是很重，因為可以「為兒童對於環境創作一種音節。」歌詠班和唱歌遊戲，在兒童的組織裏也漸發達。花園子設在各個適宜的地方，並用家畜去看守。新鮮空氣與運動差不多成為神聖之物。教員們受了訓令要把兒童的生活處於社會中的活動部分，那就是讓他們去參與普通假日，帶他們參加觀察工廠與社會各組織的旅行，並使他們與其他的兒童接洽。在公共的假日兒童們給演說，背誦，演戲等等的遊藝，他們簡直是自然得望形了。

舉薦給兒童的文學是屬於一種嚴厲的寫實派的性質，甯教授他們一片麻田怎樣變為衣裳的秘密，不說

什麼公主變天鵝的神話了。「我們文學的內容」訓令裏有這一段的話，「必須根據和兒童相近而且他們能領悟的真的生活事實。牠必須滿着鼓勵與感動的意思……這自然的世界與人們的創作替代神怪的故事——那些故事祇啓發兒童的懦怯的懼怕和病態的幻想。」有些俄國最高級的畫家正從事圖解兒童的書籍。雖然有些不算成功，但是我所見過的大都是充滿了美，談諧和真的教訓。和在白晝育嬰房一樣，這些遊戲場也成訓練父母的教育中心，一方面是由兒童帶回來的習慣（有一個農婦訴告她的小孩子回家後，做出擦每個人的鼻子的討厭事），另一方是讓父母們輪流幫助兒童工作上的進行。

假若我們不忘了平常一個六歲的農家孩童就成了一個娘姨，擦地板，洗碟子，剝番薯，學紡織，擔水到田裏，甚至分擔田裏的工作，那末，這「預備入學」的工作對於下一代的體智上的影響，尤其是關於女子方面，一定不會預料過度的。

「社會教育」是爲八歲以上的兒童施用的普通初

步訓練所稱的名字，現正在「勞動聯合學校」實行。一九一八年的十月間，當關於學校的第一道命令頒布的時候，政府按照蘇維埃憲法宣布強迫的普及教育。第一個委會組織了「去調查介紹普及教育至全俄的情形」。牠實在對於即刻的創辦給了不少的有價值的計劃。一九二三年政府又另委任了一個新委會，牠對於八歲至十一歲的兒童預計在一九三三年施行的強迫的普及教育更有較確實的籌劃，並定每年增多學校，增加教員和學生的數目。這一條在一九二五年有命令批准了，但是還有一條附帶條件就是：設若任何市縣在期前已夠程度，牠們得在規定期前間宣布強迫教育。在雅盧斯拉甫斯基和別的一兩省地方，那裏的經濟復元比在俄國全部快得多的，牠們已經完成這個工作了。烏克蘭(Ukraine) 於一九二六年也通過強迫教育的法律。但是在其餘的地方，則大都受時尙未及之評，因為現在那些地方不能供給所有屆入學年齡的兒童的需要，雖然在這裏兒童入學的百分數比在蘇俄的要大得多了。其實教育部一向所計劃的，現在已能超過了，但是盧那卡斯



奇和別的教育領袖們還猶疑不敢斷定能否於一九三三年就能完成強迫的教育。在一九二六年的蘇維埃議會 盧那卡斯奇把阻碍教育部的困難列舉了一番。他們所說的障礙就是：缺乏經費，校舍與器具的不足，和薪金過低的教員。薄微的酬報結果使教員的數目因而稀少，因為那般年輕的人自然而然地去就那些酬報較大的專業。雖然說教員的薪金在一九二二年比戰前增了百分之二四，到一九二七竟增了戰前的百分之四十七，可是現在牠仍在平均工人所得的工資之下。在那些較不發達的鎮市地方，更有很多事件阻礙兒童的入學。這兒發生交通的問題，兒童們居住的地方離得太遠的，又常沒有相宜的靴鞋與衣服，讓他們怎樣在風雨之中，破爛的道路上跋涉！還有這些事體，就是許多兒童在家裏飲食不足，致成疾病，讓他們怎樣跟上班課！尤其倒霉的是女孩子，為家務羈身更不用提了。教員們也是工作過度。他們的班也太大了（每天常有幾班人的替換），並且所有的教員在規定工作之外，更須服務社會的工作，晚上教些成人班課，和參加村委會等，教員們——其中多是女

的——對於鄉村的貢獻和扶助，實不能計。一學期中，兒童上學的時候很有限，因為當秋天有了收割的工作，父母們要他們去幫忙，等到春天一到，又把他們叫到田裏去。

一九二七年在蘇俄的蘇維埃議會，盧那卡斯奇述說革命前祇有全及入學年齡的百分之五一是真在入學，而今日的比較是百分之六一。在學校的兒童總數之中，百分之三五.六為女子，這些兒童又成百分之四八在城市，三三.六在鄉村的比例。在鄉村地方男兒在學校的年限比女子為長些，但在城市就是女子的較長了。其實現在女子在學校的比較革命前的時候的比例，增加並沒多少，那個時候已經是全數的百分之三十了。比較最進步得快的教育，要算在那些共和國家，從前他們的人種連一點文字也沒有的。男孩們有時入本地的教會學校，但是女孩子上學是未曾聽見過。過去的壓迫使得現在很難勸說那般父母們允許他們的女兒上學讀書，並且那些共和國家是在全俄唯一的地方不行男女合校制的，那裏祇準分立的女學校。

教育部的原意是不要在這頭九年內有甚麼有定的「職業的偏重」，而是企求普通的教育到了極發達的程度，因為高等的教育是差不多完全專門的。但是既然技巧的工人十分缺乏，這那耳科普洛斯——就是教育部 (Narkompros)——後來也准許在第七年後就施行工藝的訓練。在一九二三年創出一種「技藝傳習所」(technicum) 打算收七年讀畢的學生，並訓練他們使合於工業比較技巧的職業；專業方面則使合較低技藝的地位。在這類學校的婦女數目年年增多，現在技藝傳習所的全數的百分之四四·八是婦女了。在醫藥技藝傳習所裏，大都訓練看護和產婆的，有女學員最多——百分之九三·六；其次就是師範，有百分之六四·五是婦女；美術技藝傳習所有百分之五七·七，商業技藝傳習所（訓司帳者等）有百分之四四·六，農業的有百分之十九，並工業的有百分之八·七。

鄉村發生一種與工廠學校相當的組織的需要，為應付這個需要產生了「少農學校」的組織。牠是專收十四，五歲鄉村男女的少年，在這裏還繼續教以普通教

育，並教授他們最新近的農業的科學方法。牠的目的是使這些學校變為農業模範的中心，希望至終得以影響到那些接近的農夫。在三年前，當初組成的時候，祇有百分之十四的學生是女子。現在一共有六萬學生，其中有一六，〇〇〇或百分之二六是女子。課程內還有家政學，縫紉，撫育嬰兒與性的衛生等等的特別科目。但是女子們並不被這種工作所束，有許多的女學生正準備着做完全成功的「熟練的農業顧問」(Agronomes)，並將新方法傳布於農民家中。女子入各種農業學校的數目，逐漸增多是毫無疑義的。在農業的試驗場做科學考察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婦女呢！

在現況之下，還不能設立自由的(免費的)教育為初級學校的各個個人，所以為暫時的計劃起見，在城市裏收費是准許的。但是仍有限制。所收的款項限於工會工人所得的工資的百分之五，而且對於失業者的兒童是不准收費的。在鄉下，對於較富裕的兒童也有小款的收納。在那些沒有充足地位給所有及入學年齡的兒童上學的區域，工人的兒童總是得在城裏求學的優先權，那

般最窮的農兒祇得在鄉村了。有時「富農」們和新經濟政策實行後的新興資本家組織一種私辦的學校專為他們自己的兒童，這是因為在普通學校沒有空的位置了。

工人職員會，(Rabfacs)的組織乃是一種臨時的計劃，是給那般在較高的機關裏而未曾受過初步訓練的人們再得基本學問的補習機會的，婦女佔的百分數是由百分之十四增至十七，按確數說是三二，八一六人。他們希望在一九二七—二八，這個數目能達到百分之二十。在大學專門和高等工藝學校，現已有百分之三一為婦女，同時，在醫科和師範的專門大學，她們還是大多數呢！在第七年之後，差不多事實上可以沒有所謂「普通教育」的這一種東西。女子們要想繼學的，可以或是入高等的技藝學校學習醫藥，教書，社會科學，工業或美術的一支派，或是入一間大學，進「職員會」專修某特別部分。高等學校的專科，當牠們須從速實行使出來以應「熟練的人的急需」的時候，也是決定婦女運動的範圍和其效率的最關重要的一個原素。牠（專門）救了大班的婦女免於「所學非所用」之譏，不使

再踏美國少年女子的覆轍——就是教育使她們明瞭她們是生存在一個充滿着昂大的事業的世界中，在這世界的大事她們也很想參加，但是教育並沒有訓練她們使她們在任何特別的界域能得相當的成功啊！牠又賜給衆工人與農人第一個機會去向自己的興趣線上發展，不用準得去接收那種他們一生下時來所得的生活了。

這同樣的新教育方法在高等教育和初級學校都是一樣的循用，個個課室都是實驗室，處處都有把學理與事實聯結的力量，並且學生常在夏日作練習生的工作，去就一件他們正學着的工業的或專學的職業。發給畢業證書並非基本於割開的與乾了的考試，乃是基本於在他們讀完一科之後，把他們所學的，實地能用來研究出一些有定的實際問題的成績做依歸。

就算要得個現教育制的最潦草的見解，設若不提提「育兒院」——牠們在蘇俄包容二十五萬的兒童，百分之九五又是孤兒的，那還不能說是個完全的潦草見解。這許多育兒院乃是居於教育部指揮之下。我們要知道，給外界這個印像：說蘇維埃政府正努力於將兒童由

他們的父母取去的，沒有別的，就是這些育兒院的組織所賜。按事實上說，有些組成的原旨是為國家在將來要如何訓練兒童，先作個模樣。在那倒運的辰光，許多父母沒有永久居處的。自然歡喜得到一個安穩的地方撫養他們的兒女。大體看去，育兒院是為孤兒們預備的，並且牠們又多是饑荒的結果。那個時候，許多父母離棄了他們的兒童並懷着慎重的態度，因為他們深知兒童在育兒院裏可以得着生存更好的機會。其他又有許多因飢荒逃難致與家庭分散的。後來那大般自稱為「全孤」的兒童，並且描述他們父母死時的可慘的詳情的，未料到那些所稱為已死的父母，居然又回來請求發還他們的兒童；解決的政策是把非孤的兒童一體送出院外，所以在近幾年育兒院的數目已減至不及從前的一半了。實行這個政策不是因為有什麼對於育兒院的本身有反對的地方，祇因為一方面牠們是太費款項，他方是缺少方法，以致兒童非常寂寞；更學不到一點東西。我見過的那些育兒院的情況比起人們對於一個普通孤兒院所有的印像或幻想，都較好些。那些運氣好的得到天資頗高

的教員的教導，真是極愉快。比方，莫斯科外邊的普式金音樂技藝學校，那裏的兒童是賦有音樂或別的天才的，才由其他的育兒院送來。這間學校是由濟賓(Tsibin)和他的夫人一手經理。濟賓曾作過好幾本戲曲，並在布爾沙戲院(Bolshoy)的大樂隊作第一奏笛子。他的夫人，一個快樂的婦人，是位歌者又是教員，他將全副精神都放在這間學校裡了。我真沒有到過一個比這裏更快活的地方啊！爲那大般的孤兒襁褓地遊蕩於俄國的各方的，教育部希望能在三年內解消這個問題，並爲之，業已議出一個綱領。這大隊的無家之兒(Bezprizorniss)差不多滿是在荒年的時候已經年力較大能由乞食，偷竊和來往各處藏在火車底下而得到人家賜與相當量數的「踢」而賴以苟存的兒童們。那種生活是不合常規的，但人家把他們引到一個育兒院裏面，他們總想法子逃跑，爲的在院外可以想甚麼就要甚麼。女的很少逃跑。有一個方法處理這些少者就是組織「勞動集合」，牠可以供給兒童食住和工作。當他們親手幫助組織集合，由他們自己的勞工去購買用具，那樣，他們自然而然



地會發生興趣並且這樣就可以漸漸地組織班課教授他們一種工藝。此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把他們送交農夫或工匠們，由政府酬報他們一些特利，但是他們便有教給兒童耕種或一種工藝的責任。這第二個方法初次的試驗是失敗的，因為農夫們祇管把兒童使用為利己的事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兒童在冬天還好好在逗遛，但一到春天就全溜到滿街去。現在呢，至少在大中心區域已經建立一種法則，就是在事先把託交的家庭謹慎地調查然後復加以選擇，同時還常注意着兒童。有許多兒童到十六歲由育兒院解散出來，找不到甚麼地方容身。這個問題的補救方法是得工會的贊同讓每間工廠與企業所保留給學徒的地位分出確定之一部分給這些育兒院支配。雖然當這般童子心意放肆的辰光，他們很容易做出犯罪的行為，但祇要一進了中常的環境——這個環境要足以刺激兒童使其一心全被這個新環境所吸引——那末他們就能轉為中常的兒童，例外要有也必甚少的。所應用的方法，不是把他們當作犯人看待，而是給他們常規生活的機會絲毫不管他們的履歷怎樣。為那般

真是殘廢(不全)或對於社會有危險的兒童更特別設立機關。這一類的兒童已是逐漸減少了。

成人的教育是集中於教育部的政治教育總處 (即俄稱葛拉弗波利特普盧斯維特 Glavpolit Prosvet), 牠的領袖是列寧 (Lenin) 的夫人那沙利亞克盧普斯卡亞氏, (Nathalia Kwpskaya) 她是一個老小的婦人穿着黑暗的衣裳, 你看這樣最不露的人, 她倒是全俄最昭著出羣的婦人呢! 她爲散揚教育的事業不斷地工作, 並當列寧去逝的時候, 大家都討論着紀念物, 她却儼然地請求把費用在石像與紀念碑上的錢移去整頓教育, 和救濟全俄的孤兒們。

按克盧普斯卡亞氏講, 政治教育總處的最大的任務是將革命的意義與目的告知工人和農人們, 而這件事的成就又以使他們識字爲前提。

一九一九年的十二月, 一位大教授名葛子 (Gudze) 的坐在莫斯科地方的一間冰冷的房裏, 穿着大毛衣和厚靴, 修成一條法令: 規定蘇維埃共和國所有從八歲至五十歲的人都有受教育的義務。這條法令又附帶

着一條條件——無論那個識字的人都可以註冊做教員的條件。工人在每禮拜規定的日子，散工比尋常早兩小時讓他們去讀書，工資是一點不扣的。有人以為在兩年左右可以使個個人都識字了。六百萬本初學書籍印行了，十五萬的臨時教員受業短期的訓練。在這兩年之間差不多有五百萬成人教得能認字書寫了。但是等到這工作的供給不由政府預算擔任了，進行上不然而然地較前為慢；但是還沒有取消或停辦，不過歸其他機關管理就是了。說到這些替代機關，最先總要讓給工會和軍隊。因為牠們是最容易進去，而且每個年輕工人或農家入了紅軍冀得訓練的，都是得了學問滿載而歸。常常這種紅軍裏的農人最是努力；他們回到鄉村教導別的農民。幾年前我看見一個退伍的農人在那得兒金卡(Na-dirginka)小村教着一班婦女。他自己組織這一班，並且在他自己的小茅屋上課。他的最熱心的學生是他的夫人。我曾問她，她學了識字之後要做甚麼。

「那末，我就可以像男子一樣的在委會裏做點事業，佔個位置啦！你看看我的丈夫，他不見比我強。他比

我運氣好他能有入軍的機會。他雖然傷了一隻腿，他還可以帶教育回來。所以人家把他舉作村委會的委員，現在呢，他作了蘇維埃的秘書了。怎麼我不要也作個委員呢？」

雖然不識字的女人比男的多，可是很少見班裏多是婦女的，並且在百萬上下的正在求學的成人當中，婦女的數目祇約佔全數的三分之一或多一點。在完全不識字的班級之外，千千萬萬的農人與工人進一種稱爲「半識字」(Malo-grammothe)的班級，使這般人再深造一點，或免得他們再變回不識字階級的人們。起先，成人入學的年齡定爲五十之內，但是後來查覺在三十五歲以上的成人已經再難讀書了，所以把年齡限制減低到三十五歲。

政治教育總處有一種重要的工作是賴「閱書小舍」(isbatchetalia)的，這種小舍在全俄共有二萬六千所。這種「閱書小舍」有時，是在「人民俱樂部」(註二)之內，後者是爲舉行會議與賽會的；有時，牠是獨立的一所茅廬，從一間至四間小舍組成不等；餘外是

圖書室，閱書室與遊藝室。尋常一個「義斯別且克」(isbacheck) 是一個薪付不足並屬黨的工作者，他除了料理這種閱書室之外，還有別的工作的；真是靠他們，完全靠他們的力量與這些工作才能有這種成績。在過去的蘇維埃議會，他們通過將這般工作者們與教員立在同等的地位亦按期支薪。由他們的自動，各種學會成立了不少。各處準有一個「戲劇的」與一個「農事的」學會，普通有的又有「政治學」(註三)(Polit-grammotne)，「合作社」，「村通訊員」(selkor)，「音樂的」，「母嬰的」等學會，並且裁縫學會有時不祇女人加入，也有男子入的。有些地方，他們開辦特別的學會給婦女，在那些學會中教她們如何把家裏整理乾淨和講求衛生，同時教以飼養小雞，牛豬的更好的方法——這些事在俄國鄉下完全是婦女的事務。這般工作者們爲的要組織這種學會，於是請來村中的顧問，醫生，教員並在任的地方推事——實在是，利用在村裏每一個「專家」所能貢獻的學問爲這般較不開通的人們工作。

在城裏邊，成人教育的工作大部是由俱樂部的工

作施辦，這些俱樂部是由工會組織並撥給經費的，還有政治教育總處管理牠們所施的教育內容。在實際上，所有的工會和工廠都備有夜班以及在少年工人學校之外的成人工人學校，並且年幾較長的工人常被工會選去工人職員會（Rabfacks）預備入高等的工藝學校再加深造。戲院，電影，博物館，歷史故宮與紀念碑，又公園與美麗的或有歷史價值的地方——這些全在教育部管理之下，牠不祇負正式教育的責任，並飼養那般有「文化饑」的工農，男女都是一樣，因為在過去的世代，這一方面的生活是一直對他們這般窮人關閉的。



[註一]

瑪利璧克福原名 Mary Pickford，她是現代影界數一數二的明星；某年在美國被選為電影皇后，頗賦盛名，所以稍為注意電影的人沒有不知道她的大名的。

[註二]

按人民俱樂部是譯自 Narodny Dom，直譯應是「人民的房」，但是意思不能由直譯表出，故採意譯。

[註三]

按 Polit-grammotne 名詞是由 Political 與 Science 二字合成，因直譯為「政治學」。聞在此課程中，其焦點係專重於共產黨宣傳之工作云。

## 第六章

### 新舊家庭的過渡

在所有遷易婦女的地位的改革之中，其掃除舊習最淨與最遠達的要推結婚與離婚的法律，由這些法律家庭才第一次定成新革命的生活方式，並且在舊法中所缺少的母兒的保障，在新法裏也已俱備了。

在「十月革命」的兩年之後所舉行的婦工會議裏面，列寧說了下列的一番話：

「工人的政府在牠成立的起始，就把影響婦女的立



法整個地提出來革命了。蘇維埃政府對於將婦女置於全完被壓迫地位的法律磚石，不留着一塊不動。我說的是特別關於利用婦女的懦弱地位的法律，置她於一個不平等並常常甚至於卑下的地位——那就是，離婚和因婚所生的兒童的法律，並婦女有為養育兒女上告她丈夫的權利……現在我們可以驕傲地而且不是過實地說，除了蘇俄以外，在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國家給與婦女完全平等的權利，她們仍是處在一個卑賤的地位，尤其是在日常家庭生活之中的更是不堪。這就是我們首先的與最重大的事務中的一件……」

「自然單獨靠法律是不夠的，而且我們也絕不滿意這些命令告示就以爲足了。但是法律方面，我們實在已經將一切能讓婦女和男子立在平等的基本上所需的各事，都設法實行了。在現今的先進國家的觀點，却以爲蘇俄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祇算得是理想。但是我們已明明地告訴我們自己這不過是我們工作的起始啊！…」

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關於結婚與離婚所發的命令在一九一四年的七月間已然是正式地制成法律了。這

本古典的著者們却沒有預兆以後的改變，所以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初一又有一部基本這過去九年中生活與風俗的發達的修正法典出世了。因為結婚法律與人民的生活每天都有極密切的關係，並能產生真是可怕的改變，並且內中又有些已證明不能實行的現在輪流着全修改了。我想最好是先將原來的婚姻法典的主要條件的大意略述一下，然後再討論牠的修正案如何。

就在這起首，或者應當特別提明一句，就是蘇維埃政府，不管各個個人對於將來的男女關係的形式的意見是怎樣的分歧，仍是照舊地主張保守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為根本的社會單位，並且牠以為除非是有特別的緣故，否則，適用母親的撫育還是比國家的撫育為好。

人民司法委會 (Narkomyust) 之中的一位白蘭登柏爾斯奇 (Brandenburgski) 將現勢陳述如下：「家庭從前給夫妻，親子(父母與兒女)定的一些互相的權利義務自然不久就要完全不見，拿國家組織的社會教育與社會福利去代替牠們。但是現時這些新制度既然還未曾實現，蘇維埃國家就為暫時起見，限家中的各人對

於彼此都有一種互相的義務。」

那位盧那卡斯奇——人民教育委員——對於這個題目發表過許多文字和言語，他這樣說：

「我們仇恨中產階級的家庭，但是不能祇由這個就結論：人們在革命運動漩渦內的不應該有家庭，或是婦女不應該負撫育兒童之責。……社會的核仁，並且應是我們共同注意的中點的沒有別的，就是家庭。……不論牠是個自由的家庭，內中沒有一個頭腦，或家庭將要完全瓦解，這些事我們全不去預先決斷。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頭，各個人的分別是不會消滅的，我們也不為這件事爭鬪，大概以後要有各色各樣的家庭。」

蘇俄的第一次結婚法祇承認公認的婚姻。但他並沒去廢除宗教的儀式，因為後者已完全失去法律的重要。按事實而言，大多數的農家和許多市民仍是在教堂裏結婚。不過僧士們要沒有余葛斯(Zags)的證書（因為人家常以登記處熟稱牠的簽名者余葛斯），他們就拒絕舉行婚禮的。

在俄國結婚或離婚都用不着破費多少金錢，祇要

有幾個戈比交登記費就足了。在城裏頭的登記員的辦事棹前面老是有一長條似辮的奇形隊伍——許多許多的對偶——等候着，婚禮是非常的簡單，先查驗他們的證書，問新郎新婦是否自願的結成夫婦，然後再簽名在「結婚登記簿」上，一共不用二十分鐘，就能完畢了。有一位俄國朋友告訴我說，當她在列寧格勒(Leningrad)結婚的時候，看見這位登記員對着他面前的婦人表示十二分的不贊成，因為她已經來此第七次了。他和她辯論了一番，氣得他的夾鼻的眼鏡直要掉下來，後來他把牠用條線乾脆擱在頭上了。但是至終，她得勝了，又獲得第七個丈夫。

有人感覺得：假若婚姻不是件偶爾的事，那末，我們採用那耐煩的與繁華的教堂婚式，必定可以使登記的行爲更有意義，更有效力。有些地方，是比較鄭重其事了，一間特別的房子單預備爲這個用處，登記處的主任親自執行職務，不像別處派一個職員代理。「紅色的婚禮」替代舊的禮儀可算得應付需要更滿意些。在許多工廠裏，他們已發明了一種新的常規禮儀，新郎新婦在

一個披紅的台上，有工會的同伴們與婦女組織的代表們參與其盛。工廠委會的主席就是司儀人。這一對新人自己立誓以後力謀互助的工作以增加工廠的出產，又有很好的演說，再後就是宴客或是茶點。歷相當的時間，直跟着這婚禮就是「孩提受洗禮」(Octobsina)，這是代替從前的小兒洗禮，——把一個可憐的嬰兒往冰冷的水裏浸三次，於是這施洗的僧士揮弄十字架，等一會說吐點惡鬼出來。現在的工廠委會又守這「孩提受洗禮」，這小兒是奉獻與蘇維埃國家，又不像從前所用古聖之名，現在要洗名「列杜洛晉那」(Leutrozina)，為紀念列寧，(Lenin) 杜洛茨基 (Trotsky) 和 晉挪維埃甫 (Zinoviev)，或取名「厄刺」(Era)，如果小兒是個女的；「梭姆」(Rem) 為紀念「革命」(Revolution)，「電氣化」(Electrification) 和「莫斯科」(Moscow)，「十月二十五」(October Twenty Fifth) 和別的相似的名字，如果小兒是個男的。

俄國人儀式最繁。在最簡單的會裡，要除主席書記之外，另有一個正式選舉的幹部。(註一) 演說，問題與討

論都須遵守嚴厲的規則，並須達到一個決議，還要記錄的留存。無論甚麼法律行為都要依照那些精緻的條例並須引用條文。這般蘇維埃領袖們雖然在他們自己的骨髓裏也含有這種的原質，他們却很快地洞悉這些禮儀對於幫助新社會的形式種根在人民的身上有莫大的利益，所以他們很鼓勵向革命禮儀走去的趨勢。

現在我們再回來討論結婚的法典罷！起初牠是這樣的規定：結婚的，要取個夫婦同用的姓，或是從新郎的姓或是新婦的姓或是配合而成的都可以，祇要他們兩性都能贊同就沒有問題了。後來有一道命令說他們倘若不是共同選擇同用的姓，就得用自己婚前的原姓。

假若查出已婚的婦人是在結婚年限所規定的十六歲之下，或男的在十八歲之下，或一造的同意是強迫的，或一造在結婚時是在「無責任」的情形之下，這種的婚姻全須撤銷。(註二)一夫多妻制是禁止的；要是隱藏一個婚姻，再去重婚的，國家認為犯人。(註三)結婚祇禁止那些神經極衰，或是智力方面不足的，和親與子，

兄弟與姊妹間的互婚。(註四)

離婚是十分自由的。如果夫妻雙方同意離婚，祇要到登記處一動筆就成了，但祇有一方願離時，就須由審判廳判決，因為兒童的撫養問題也常包括在內。但是無論在何時何況是用不着證明那一方「不是」的，也不問離婚的解釋和理由。

因為大般的人民都不懂得這些法律，尤在農家為更甚，於是普遍全國立了一種供給詢問與法律的指導事宜的組織，並且人民司法委會也命其村支部對於農婦的興趣與關係她們利益的事情特別的留意，因為在鄉村的情況，多是不保護婦女的。關於訴訟撫養問題免除納費，並排在審判程序的第一件；就算判決還沒裁定，法院也有命令暫先交出一筆撫養費的權利。

還有負面的幾條，本來在一個革命的婚姻法典上是可認為重復多餘的規定，但是牠們的用處是單單為表示和舊法典的相反而已，所以這裏特別提明丈夫遷居，妻子不一定要跟他去。男女的自己的公民資格不因結婚而稍改。在原典也會規定財產不因結婚而共產，關

於財產夫妻所立的合同，祇要是這贊同并不侵佔任何一方的權利，法律就承認牠。夫妻的任一方都有對於他方扶養的責任；祇要一方是需要扶養，而他方又恰在能扶養他人的地位之下，就有這種義務。這一條還實行到離婚之後，直等到有了「環境的改變」，換言之，就是等到又有新婚或新舊職業了為止。

「私生」的恥辱已經取消了，未婚的父母生養的兒童與因婚而生的兒童得的是同樣的權利，這未婚的母親得在生產的三月以前將父親的名字與住址報告奈葛斯（參看本章第四頁）。設若後者——父親——在兩個星期以內並不表示反對，或證其不是，法律認其已承認為父，並須負撫養此兒童的責任。這一條也行使於那已婚的婦人，假若她所生的兒童不是因她自己的丈夫而生的。法典又規定以下的程序給那些男子否認親職的可以循用：

「設若審判廳查得兒童之母指明這男子的關係到了這個程度，就是按自然的事理，他應是兒之父時，法律就明白地推定其有父之職權，同時決定他對於她的懷



孕與分娩所費用的分擔，並以後對於這兒童的撫養。」

在這種情形下，那婦人所得的生活費就是叫做「妻子生活費」。對於那男子要付這份費的，人家總引用這句老話：「誰歡喜近海的，要帶雪車上山了。」審判廳的判例是抽取男人的薪水的三分之一。母親的地位是常要考慮的，男人實在能付的數目也是重要的一條，自然也留一部分最少的生存費給他自己。如果這男子另有一個家，他們的需要也須計算在內。

在城市，審判廳所審的訴訟案件大半是關乎妻子生活費的，這種的訟件在村鄉也約佔訟件的三分之一的樣子。在城市，受牠影響的人數全數要比在鄉村的多了許多，因為農家女子們比較害羞，所以不怎敢要求妻子生活費的。

法律對於未婚母的普通態度完全改變了。舊日一個年輕的女子在婚前失了童身的，就一輩子完了。有時她祇好自殺，省得等待着結果來到，有時則把嬰兒殺死。如果發覺出來，她就要被逐出去；除非合時的結婚，她的名譽是不能挽救的了。無論如何，這些事滿是那苛刻家

庭所製成的。現在啊，她自己滿不在乎地跑到審判廳請求妻子生活費。審判廳問她一些密切的問題，她也老實的回答；案件一切的進行也都印在報紙上，全世界都看見的。報紙不把這些事刊作情感的背約或爽約的故事類，因為俄國報紙不當牠是新聞的；而是把訴訟裏最要的事實刊登在報紙後面的一節標做「審判廳」的地方。這未婚的母親不再是一可恥的被逐者，乃是一個自重的人，握有要求那父親對於分擔兒童的撫養的權利。

法律准許兒童到了十四歲，自己採取姓名，公民身分和宗教。在他未滿十四歲以前，父母替他決定，設若父母意見不能相合，就請審判廳去決定。設若父母對於宗教的採取，意見不能相合，那末，這兒童就算沒有宗教，等到他大些自己去選擇一教好了。

父母是必須供養他們的兒童的，而且須留意他們智體兩方的相當發育，準備他們將來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業。俄國以外的人們總有這樣的觀念：就是以為俄國是主張國家撫養兒童的；但是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誤，牠的法律，規定父母須自己撫養兒童。父母得命兒童離

家出外受訓練，或是教書，但是未得他們自己的同意，不能將他們僱用於人。假若父母是無助的或得不着政府的給養以致貧窮的，兒女也有侍養的義務。立嗣已是禁止了。

俄國習慣上的遺囑也已經給一合法的遺產法令讓出地位，那就是：妻子和其他倚靠死者的供給的人，都均得遺產的相等部分。設若這遺產的數目不足供給所有應有合法請求權的親屬，那末，最貧窮者得有優先權。當均分遺產是顯然的不公道時，遺囑才是有效；但是那也祇許優待合法的嗣子們。法律起先規定遺產的限制是不准給妻子超過一萬盧布，有餘的充為國有。一九二六年的二月，奇怪得很遺產法令定為無限制的了，但是牠抽遺產稅的法則是採取上升的標準，所以數目超過五十萬盧布的，要抽牠百分之九十的稅率了。

這就是在革命的頭九年期間內，家庭發達所根據的法律基礎。審判廳是一向不被判例拘束的；牠們又感覺得判決須根據環境，因為有些訟件在法律並沒有明文的规定。這個實行了幾年之後，人衆都承認這種法律

太不合時了，於是好些法學家就出來草製新的法律。這草案在一九二五年的秋季出世了。這些新法規受了一般人的排擊，後來他們把牠送到各處任人討論。

當俄人們一談起天，他們就會不斷地說，並且對於這個問題可以說是談至無遺了。但是我們須知除了這些公共的友誼的家庭洗衣房之外，我們還是不能將俄國今日的家庭生活，畫出一張清楚的寫真。要是由那些討論留意地選出一些事實來，便很可以證明以下的事，就是：共產黨人介紹一夫多妻與一妻多夫制，她們殺死生產的嬰兒；不道德的事盛行得非常的厲害，在全世界也沒有一個地方曾經這樣的混亂；家庭制廢除了；一個完全制慾主義的政策開始了；共產黨婦人又拒絕生育了；婦人又被強迫生育許多的嬰兒；或是隨便甚麼東西你想證明的，都可以證明。

在杜洛茨基氏所作的小冊名「人生的問題」(Problems of Life)的裏面，他給家庭現況的真像要算是我所能得到的最確實的一個真像了：

「家庭的關係，」他這樣寫，「那般無產階級也包括

在內，是都分裂了。……誰都知道現在正有一種大的計劃在進行着，但是非常的混亂。所以牠是交替地形成病態的或革命的，可笑的或可慘的形式，但是那些形式却還未能佈露牠們開創一個更高尙的新家庭生活的一些可能性呢！……

〔這丈夫因出師不能不離開他的慣例的環境，在前綫上變成一個革命的公民了。真是一個重大的改變。他的眼光放大了，他的精神上的渴望也增高並且比從前複雜。他另是一個人了。他又回到家來看見樣樣事都實際沒有一點改變。舊日他和有家屬關係的人們的和諧與互相的瞭解一併消滅。在他們之中，也沒有新了解發現。互相感覺得他方的奇怪的改變漸成爲彼此的不滿意，然後又變成怨恨。家庭就這樣地破裂。〕

〔這丈夫是個共產黨黨員。他的生活是活動的，他從事在社會的工作，他的腦子長增着，他把他自己的全生都放在工作上。但他的妻子也是個共產黨黨員。她願意同他一起從事社會的工作，赴公共的集會，工作在蘇維埃或大聯合。家庭的生活事實上在他們都不知道牠

是仍存在或是不存在了。這種家庭空氣的喪失，結果發生繼續的衝突。丈夫與妻子不能容洽。家庭就這樣地破裂。

這丈夫是個共產黨黨員。這妻子不屬甚麼黨。丈夫完全被他的工作吸收住，妻子則和從前一樣的管家。他們倆的關係是「和平的」站立着，但事實上，等於常慣的隔離。丈夫所屬的委會——就是共產黨的「小組」——命他須把他家裏挂的偶像取下來。他覺得沒有甚麼，很願意服從。對於他的妻可是一件大災禍。就這小小的一件事體足成揭發分開丈夫和妻子兩人的頭腦的一條鴻溝。關係破壞了。家庭就這樣地破裂。

「一個老家庭。過了十年至十五年的平穩生活了。這丈夫是個好工人，也親愛他的家；這妻子為她的家庭生活，也把所有的力量放下去。但是偶然她和一個共產黨的婦女組織相觸，在她的眼前一個新的世界開放着。她的力量尋得一個新的更寬大的目標。家庭放棄了，丈夫也激怒了。這妻子受了這新醒覺的公民的自覺了，家庭就這樣地破裂。」

誰在革命後到過俄國的，一定親眼看見這些情形的無窮的變幻。我也親眼見過一件。一個在田莊供職的共產黨黨員有一個妻子。她雖並不懂甚麼政治，但她是很聰明而且曾看過好多關於婦女解放的共產黨宣傳品。她覺着整天在家裏坐着多麼沒味，就想找個事作。她丈夫對她說他要一個家，不是一間公寓。

許多的家庭因為物質的情形都碰了焦石。一對十分快活的鴛鴦無限期的分離了。丈夫到別的城裏找事，妻子還留在原處做她原有的工作。因生活覺得乾燥而寂寞，一方或兩方都尋覓別的伴侶了。有時一個丈夫得到一個重要的職務在政府的「托辣斯」(Trust)裏，與新經濟政策實行後的新興資本家們交遊，漸漸地趨於高貴的生活，常常地開宴會，所以也希望他的工人式的妻子去招待賓客們。有時一個農夫升到城裏的一個好差事，他二十年的老妻沒有地方處置了。

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種的家庭，丈夫和妻子因為雙方對於革命和重建他們的國家都有同樣莫大的興趣而共同生活的。我知道一些這類的家庭，並且按普通計

算，牠們與我所認識的那些沒會對這革命的分裂的影響和離婚的自由表白反應的家庭比較起來，要算前者給與我們更好的家庭幸福的印像。

斯密多微克 (Smi Dovich) 同志就是一個好的比方。她是一位堅誠的老布爾塞維克，從前是農工婦女部的領袖，現在是黨的「監察委員會」(Control Commission) 中的三位女委員之一。有一天她帶我到在克勒模林堡(Kremlin)的她的住宅去玩。她的樣子好像是人家的祖母被棄在遊廊邊似的，很溫和的看着小孩子們玩弄她眼鏡的框子。她的灰白頭髮從額前梳到後面結成一個整潔的髻兒，她那戴着銀邊眼鏡的閃爍的眼睛滿含着明白和智慧，她的憔悴的兩頰還健壯地發出紅色，差不多像她的年幾沒有幾個能夠這樣。她的丈夫坐在「星期日」的早餐棹前好像個溫和的老家長。他們有三個孩子，一個是十四歲臉甚光鮮的女兒，兩個較害羞的小哥哥，還有兩個堂兄弟。他們的女兒住在這一所屋子——從前大彼得常在操閱衛隊的——裏的一間大的但是天花板很低的房子裏。他們都愛他們的父母，老



是纏繞着在他們父母的身邊——「媽媽!媽媽!」女兒不斷地喊叫,「你甚麼時候可以離開你的無味的工作,和我到外面走走玩玩啊?」

好像我們用不着問斯密多微克同志對於將來的家庭作怎樣的想像。

「自然,」她告我,「我們這般老年的共產黨員以為最好是愛中一個人而且集中於他。比起別的人來,我們較不慣於改來改去,因為我們所成的結合是比別人的堅固。……要分裂一個基着一輩子共同向一個目標奮鬥前進的結合,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們最為前提的是一個同志——他的思想與感覺,我們全能分享的。如果這互愛的感情失去,婚姻的關係自然也須立刻停止。但是說到將來呢,那就是等新的經濟制度創立些新的人們關係的形式了。有些我們能自覺的製造——別的可要等人生去證明確是最合用的才能成就。自然我們再也不用那以經濟壓制婦女的中產階級的家庭的舊形式了」。

我問她對於公共組織的撫育兒童有甚麼意見。

「我們還是太貧窮,不能供給兒童所應得的社會的

訓練，」她這樣回答，「所以至少目下家庭應保存為訓練兒童的中心。如果我們有完備的，治理得法的設施給兒童，這自然是沒問題地兒童在這些設施裏面受訓練比在多半的家庭裏好。我是愛我的孩兒的，但是，到底我一星期能見他們幾次？我白天整日工作，常常晚上也不閒着。恐怕祇有星期日是唯一的休息日。我想如果他們是在育兒院，他們可以在我閒暇的時候來看我，同時他們在那裏又可以得到更好的訓練，更細心的撫育，並且他們能生活在一更受鼓勵的環境中，比起在家，真是不能同日而語了。」

和這些家庭並行的，仍有舊日遺傳下來的老家庭，所有的舊風俗仍是絲毫未減——婦女們不祇是奴隸，而且是她們自己情願做的，她們仍以為丈夫要是不打她們，她們是不受愛了。

那些改革動搖了鎮市很算得厲害，但對於鄉村浸透得還是很慢，所以人們常常在村間找到這種的古老家庭。鄉村裏的大家庭比城市裏的家庭堅固得多。那舊的經濟制度好像「水門汀」原質的在黏住鄉村，自然

比城市更甚；因為重新組織農人的家庭不是件很簡單的事體，而且土地的重新分配和財產的剖分問題使這些家庭聯結不散。但是在鄉村的改革總算不小了。先是戰爭，革命，與饑荒把他們由故轍搖了出來，然後跟着是婦女的覺悟的始點，就是：婦女不用再屈服於她的可恨的丈夫的暴虐之下。越來越見農婦到法庭訴告她們丈夫的增加，農夫也不敢再把妻子打成一塊軟肉一般了，因為農工婦女部派代表到各村教導農婦怎樣去得賠償費或離婚。



[註一]

按此字原文是Presidium，直譯應為「主席團」三字，但在俄國，牠的任務並非重於「主席」，今日多有譯為「幹部」的，這兩字比較恰當，因採納牠。

[註二]

關於及婚年齡一節，我國民法新舊草案裏所規定的均與蘇俄所定的不約而同；讀者諸君可參閱舊

草案第一千三百三十二條，在新草案是第一千一百零四條。至於強行婚，我國的民法當中也有規定，諸君可參閱舊草案第一千三百四十五條，或新草案第一千一百十七條。還有一層應當注意的，按俄國的法律，假若結婚的兩造或一造未及法定的婚姻年齡而已生過子女或妻子已在懷孕中的，那就不能撤銷他們的婚姻了。

### [註三]

我國的法律也是採取一夫一妻主義，重婚是歸在絕對的撤銷原因之內（參閱民律修正案第一千三百三十五條）；但是諸君須注意這一層，就是在我國妾的制度還沒有廢除，所以娶妾還是可以的。重婚的限制要算蘇俄更嚴了。

### [註四]

按我國的法律，精神病祇作為離婚之原因而不禁止此種人的婚姻，這還是最新草案的規定，若按現行律婚姻門出妻條的「七出」則更不能同日而語。

關於親屬的互婚，在我國的民草也予以禁止，但

---

是牠的限制範圍比較蘇俄規定的爲廣。參閱民律  
修正案第一千三百三十三條。

## 第七章

# 婚姻法的制定

蘇維埃政府的建立者們大都接受常人所知道的：

結婚在將來要和國家一起消滅的學說；他們也贊同了至少在這過渡時代應當保留這種登記婚姻的形式。但是差不多有二十萬的少年男女已決定不要經過登記的結婚手續了。在這般匹偶之中，有許多還守得一個尊嚴的登記結婚所有的表識和結果。若在這種的情形之下發生了死亡或離異的案件到法院的時候，我們可以用

常識去斷定，就是：同樣的合法的利益給與關係的當事人，就和登了記的婚姻一樣辦；雖然在婚姻法典裏沒有這項的規定。

在其他的幾方面，法律還是不足敷用。因為新法律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毀盡舊制的遺跡，所以說財產是沒有多大重要的宣傳滿佈着的時候，我們自然可以推想法律應是這樣的規定：婚姻並不產生夫妻之間的**共產**。等到在新經濟政策下的工業復興，和貨幣的重新流用，我們常常看見婦女在家裏的工作，對於她丈夫有不可或諱的影響，更明白一點說，她就是使她丈夫能夠在外工作的一個極大的內務助手，而在離婚的時候，她的工作却完全撇開一邊完全沒有酬報，因為實際上丈夫可以獨得所有由於他們倆合作所得的金錢與財產。法律禁止立嗣的那一部分也不能實行見效，祇是因為國家沒有這樣大筆款項去維持那好幾十萬放蕩在四方的孤兒們的生活，所以有許多就被農家或其他的人們收留去作個幫手，在事實上就成他們的嗣子了。有些錯誤的規定則被法院的判例所更正，有些則由特別的命

令廢除。這樣的方法，既是呆笨而且雜亂，所以人民司法委員會的委員草就一部新法典，並在一九二五的十月提到中央執委的屆會備審。

所建議的改革中最為重要的是法准「事實的」(De-facto)結婚，還有：在結婚期內所獲得的財產按法應是夫妻共有的規定；當那家裏的農夫自己沒有錢去付離婚的妻子應得的生活費時，不管他們是登過記沒有，全家都須負責付她這一筆錢的。

這些代表預先並沒充分地為這樣淺白的一件真實的認識作過準備。他們說：這法律是承認最偶合的關係！有學識的老布爾塞維克們與那般不識字的老農們，和唱反對這「准許多夫多妻制和淫亂」的論調。普通的農家們聽見這個消息則又尤其地驚們，他們想：把家中一個人的罪過負在全家人的身上，未免欠妥，所以他們宣佈說：這種法律要毀滅許多農民的家庭。有一位農民代表說：「如果有兄弟三人，一個因妻子的生活費被訴，那末，難道我們要把牛撕碎嗎？」辰辰刻刻這種議論紛紛，反對者們請求決議延至下年，同時人民司法委員庫



爾斯奇(Kurski)和他的助者克賴楞科(Krylenko)與白蘭登柏爾斯奇又聲請這十萬的婦女不能沒有保護，堅持即刻議決實行。後來全共和國的農民的領袖喀利寧(Kalinin)很能感動人地提議，說每一種法律都應當順從民衆的意見，尤其像有這樣大影響於人民生活的問題，更不宜忽略。現在農家的態度還沒給與充分的考慮，而且又缺少由婦女的組織發表的正確意見——或者他們還是過急一點。末後這新草案的「原理」是通過接收了，但是還保留最後的通過在下一屆會期。

這些提出的法律傳及四方。報章雜誌登滿了牠們。普遍全俄在各書舖的玻璃窗內都展覽着數百種的刊冊，這些刊冊又將這新草案全份的登上，並載有兩方的辯詞，理由。想維持這法律的人們，為準備末次的戰鬪勝利，到處去證明不登記婚姻的可敬。政府印刷所(Gosizdat)印了一本小冊，這本小冊是最淺白的文字述說這新婚姻法令的內容，專為普通民衆的諒解的，所以，價錢非常便宜，每冊祇售八戈比。這本小冊的冊面是一張圖畫，畫着喜氣滿面的一對農家夫婦和三個兒童，他

們都穿得很華麗地在跳躍，很快樂地負着這幾個字「你自己要有一個家——由克勒模林堡三十五分鐘。」

「今日的婚姻是簡單而且容易，」這小冊這樣載着，「用不着教堂的權威，也不要他們的禮儀和祝福。在這些絕自由的婚姻上有贊同和互助的印章。愛情，合作，愛子女——這些是今日蘇俄把男女綑在一起的要素。設若沒有愛情或是不願意住在一起，婚姻的解除就像結合時一樣容易簡單。不過最要緊的是子女要有法子處置，這也是蘇維埃法律所注意的地方。」

「無論這一對男女的結婚有沒有在甚麼地方登記，或是祇同意居住在一起，沒有得一個僧士或官員的允許，這都沒有分別。最要緊的是所關的兩方以為他們的結合是婚姻而不是姦淫，就足了。如果一個男子天地良心地當某婦人是他的妻，並以妻道待她，那就很夠假設他們已為婚姻了的。等到他們住在一起，立起家庭，那就更顯明他們是夫妻的關係。他們用不着證明甚麼。全都十分的清楚。」

「但是想把婚姻的事實讓大家知道却也不全是容

易。有時沒有機會給他們建立一個家庭，住在一處，因而這一對暫時不能不分開。比方罷，一個在紅軍裏當兵的少年想人家知道他所愛的女子是他的妻子，那末，頂好他去登記，免得以後還須解釋。這張證書可以證明一切。這也是讓爲妻的和她的嬰兒以後好辦。法律上他們得着保護。這是保留登記的原因。」

在這驚人的大批印刷品之外，單照政府機關所公報的記錄在鄉村已有六千種集會，並無數的講演，辯論，和討論的舉行。在全世界的歷史裏也尋不出多少像這樣廣寬她被人民討論過的法律——那些受法所制的人民自己去討論牠。克賴楞科於一月十三日在農工婦女部前辯護這草案，他說：

「我們先真沒想到會有這麼許多的爭端。原本的法律最主要的目的是抵抗教堂的婚禮。當那法律草就的時候，祇有一般極少數的人反對登記。……無論怎樣，在經濟平等的情形之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裏，我們敢斷定登記是不必需的。我們現在還保存他，不是爲的牠的本身，乃是用牠作達到目的的工具。有人說現在還不

是共產主義的社會並且照我們的計劃，我們全要走入五里雲中——說在現況下的我們的這一塊邪惡的地上，這草案的果實就是多妻多夫制和淫亂，至終必定毀滅了婚姻和家庭的根原等等。我們試真確地清楚地把這個問題攤開來看看。現在一個男子可以有一個家，兩個家，或三個家——但是他只須付那結婚登記的費用！第二個和第三個妻子甚麼也得不着。……從我們的問題着眼，從我們的普通政策着眼，為一個堅固的家庭爭鬪，為一個永久的與美滿的婚姻的關係爭鬪，與由保護蘇聯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弱者着眼，這新法律實在比原本的貢獻得更多。」

雖然議論對於這新的計劃表示很大的不滿，但關於更改的需要是異口同聲地有力地贊成。不滿意這新草案的程度由那些最固執的農人與共產黨員：他們想不祇要使登記為姻婚必要的行為而且想限制離婚的自由，到那最激烈的科倫泰 (Kollontay)：她主張完全廢除登記和物質上擔負的責任。她提議結婚可以照定契約的方式，而規定這未來伴侶二人相互間經濟的條件

以及他們彼此的義務和對於兒童的責任。爲消滅合法的與不合法的婚姻的區別，我們不要婚姻的登記，但兒童的登記是不必取消的。……她計算了在俄國每年所生的五百萬不幸的嬰兒當中，大概一百萬是無依無靠的。她又這樣地辯護，說今日除了新經濟政策實行後的新興資本家之外，差不多沒有多少人付得起充足的妻子生活費，所以凡是成年的人應當每年納二盧布的稅，這一筆經費抽出來足夠所需的白晝育嬰房和「產婦院」所費用的。有好些科倫泰的從者更進一步，主張所有需要供養的兒童可由他們的父母那裏取過來送到育兒院裏面，並對於未婚的和無子女的人們身上加以一種特別的稅則。但是多數加入辯論的都否認她的提議，以爲此與「烏托邦」的方策一樣，不能實行，因爲這些農人永不能爲城市的兒童納一種特定的稅。那末，無論怎樣，這一筆款是怎樣也不夠撫育這般嬰兒一年以上的時間的了。

這草案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提到中央執委的屆會去，牠和上年的簡直是沒有多大分別，但因知道的人更

多的緣故，牠倒有了很大的堅實的支撐了。牠是這樣起首：「制定姻婚登記的目的就是使保護妻子的與兒童的本身的和財產的權利以及他們的利益容易實行。……登記是證明姻婚的存在的不可爭論的鐵證。」同時這種的保護也推及於未登記的結合，因此未經登記的婚姻結合的存在也是重婚的障礙。這人民委員會理事會 (Sovnarkom)——所有的法律都經他們審查的——在裏面堅持地加了一條就是：若法院要證明一登記的結合為真確的結婚，牠須採用下列的證據：(一)同居的事實；(二)一個共同的家務的實現；(三)對第三者聲明過，不論是由私人的函件或其他的文件，要在能證明婚姻的存在即足了；和(四)看環境，互相供養，與訓練兒童，等等。那一條載述在結婚期內所獲得的財產認為夫妻共有的法律，又被他們加上限制。這限制就是融合農人的反對的，限制是這樣：設若一件訴訟是告一個農人家庭中的一個人，那婦人所能請求的生活費祇能在這被告在家裏所有之部份的範圍以內請求，並且只付現錢或出產物，不准強迫瓜分田地，牛羊，或用具之類。離

婚後，一方沒有職業的時候，他方對於這一方的供養的義務也限至離婚後的六個月，假若這一方是沒有能力自養時，他方應供養至一年之久。他們又使離婚更進一步的簡單，就是所有的離婚案都准在登記處辦理，就算有一方不答應，也不去理他或她；用着法院的時候，是當雙方不能和諧解決的財產瓜分和兒童供養問題的發生。一個不願自承為父的否認親權的期限已由兩個星期展長到一年。這新法律草案又規定：當幾個人來承認父權的時候，法院應判決一個。因為一個滑稽家把父親稱做「股份公司」，那末變做一個小孩子可以有一個「股分公司」了。當他的同伴對他呼喊：「伊凡諾夫股分公司的兒子在那兒呢！」他一定是太難為情了！草案保留結婚年齡在十六與十八，但是牠取消那原來的法律准許在特別情形的得減六個月的一段。那命令每一對新夫婦須先交上一張雙方簽了字的文件——裏面承認各方對他方都已詳述自己的身體狀況，特別關於楊梅的，智力的或癱核的病症，關於先前所結過的婚姻的大略（登記或未曾登記的），和已有兒女的數目——的告示也已

歸在這法律裏面。親屬的責任也被這草案規劃得寬些，牠規定當需要和可能的時候，兄弟姊妹間和祖父母與孫子孫女間都有互助的責任。立嗣准許了。

當中央執委會在這克勒模林堡裏頭的那四圍全是石青色的大柱，似水晶的燃着臘燭，並各處飾金的俄皇宮殿中的大廳裏聚着會，預備最後的採納而在討論這法律的時候，我也到會參觀了。坐在那以深紅布鋪蓋着的大公事桌旁的代表們，內中還有不少婦女呢！一個結實的農婦，寬大和氣的臉，頭上裹着一塊明亮的肩巾，穿着氈鞋，莊嚴地，不自覺地走到她的幹部席上來。

代表們大多是俄種，但在他們之中，也有組成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一些自主的界域與共和國派來的代表——韃靼族人 (Tartars)，巴士克人 (Bashkirs)，基爾幾人 (Khirghese)，和許多不勝枚舉的曠野地域的半游牧部落——有些代表多夫或多妻制和奴隸婦女的事實仍然存在的地方。根據一九一八年原來的法典，差不多在那個時候所稱爲蘇俄的之內，婚姻法事實上還算一致，祇除掉那些回教仍在盛行的地



方，須要特別的規定。但是在蘇維埃大聯合成立以後，各部便得到更多的自治，後來大聯合的幾部分也採用牠們自己的法典了。所以在白俄祇有登記的婚姻是認為合法的，同時在烏克蘭則又不祇一方得在當事人的他方不在的時候離婚，而且一方更能在他方不在時登記結婚，不過後者有一個月的功夫去否認這個婚姻的。他或她可以循用那俄國的老話：「他們婚我時不用我；我那時在塔上呢！」（註一）

有幾位代表怨告，說我們到烏克蘭旅行一趟，簡直不能不經過被人所婚而回來自己還不知道的險事，這真是可恥。大家的同意是：如果必須讓步，那末，還是將蘇俄的法律的根本條件實行到整個的蘇維埃大聯合。

在提出這新婚姻法修正草案的時候，庫爾斯奇解說：登記仍保留為較好的婚姻形式，因為牠對於審判程序上給了一個不可爭論的證據。「但是我也極信，」他宣佈說，「那時期必要臨到當我們在各方面都把「事實的」的結婚與登記的結婚看成一樣，或竟完全取消後者。既

是我們永遠要有記錄，這登記也不過用作事實的統計的記錄罷了。同時，登記又有一個很大的利益，就是可以證明由婚姻產生所有的權利的資格，在現在的計劃裏面，則所能保護未登記的，不過是限於財產關係與供養的兩個問題罷了。」

於是庫爾斯奇把各處送來對於這法律的討論的報告書統統摘要地說說。他拿阿堪遮斯啓省 (Archangelski) 代表較比落後的部分，他說在這一省的每一村都慮過這個問題。百分之四十的村完全贊成這新法，有百分之六十的村反對牠的某部，但是城市的人民則非常的歡迎牠。農家不滿意牠的地方多是因為承認事實的結婚就要增加不道德的事，並且就要打破（經濟方面講）過多的農家田莊。有些農人提議離婚須具有有定的理由，並且離婚的次數須有限制，頂多不得過三次或四次以至七次，又有別的主張在兩年或三年內，不准再婚。在有些農人的會裏，他們竟簽字承認這樣的事：假若妻子沒有財產權，不登記的婚姻也一體承認。從城市提出的反對理由另是一種性質。有些持着優生的理

由，堅持事實的結婚的承認一定會減少登記的婚姻的數目，那末，國家對於那些關乎年齡和強健的法律干涉權，自然地減弱。有些人深恐這會使教堂的婚姻恢復，因為人們在教堂結婚可以得到法院所需要的證據，並得法律的保護。我們看見城市的與鄉村的意見的隔絕在老和少之間也可以見出。在那些農民會裏反對這草案的記錄中，常附帶着的有少年人贊助牠——草案——的一些議決案呢！

庫爾斯奇回復這些反對的理由，他說：要是我們怕不登記的婚姻容易發生不道德的事體，那末，我們儘不必取消牠，因為這也並不拘束那般不願意多此一舉的，但是按照事實看去不登記的婚姻，又何嘗有危險？不信我們看看莫斯科法院所調查的三百件由於未登記的婚姻所生的請求生活費訟訴案便明白了，就中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六是由於久居的結合，祇有百分之四是由於偶合或暫時發生關係的。他說這新法律別說勉勵多夫多妻制，實在是貢獻了建立穩固的一夫一妻制的唯一工具，就是使他們要互負物質上的責任的一個好方法。

講到離婚的數目，他以為一點也不驚奇，因為現在每年在一萬人口當中平均只有十一件離婚事，比起離婚不自由的國家數目還要少些。他又說這並沒有恢復教堂婚姻的危險，因為在一九一三年在一萬人口之中佔八十一件教堂的結婚，等到一九二五，在一萬人口當中已佔一百件登記的結婚。可見得這後者的婚姻形式已在人民生活中逐漸成為穩定的制度了。

接着的辯論還和去年一樣的熱鬧。克賴楞科站起來主張把人民委員會理事會加入為勉勵鞏固彼此關係的「婚姻的證據」取消，理由是：制定草案的起草委員們曾經用了一年的功夫去給「婚姻」二字下個定義，但是到底不能得到結論，所以他們才決定把這件事交給法院斷定的。也有些代表與他贊同，但是多數的意見是以為在這法律裏應當有相當的實條規定，就是非有相當的堅固程度的婚姻不能請求法律的保護。於是這一條定義還站住了。

一位共產黨黨員利阿贊諾甫(Riazanov)駁斥事實的婚姻的法准。「他們告訴我們，」他說，「這草案是向我

們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走近了一步，在那個社會裏，婚姻的關係是完全不受任何強行的法規的壓迫的。……我敢這樣大膽地說一句，就是在所有共產黨的宣示中，連一點共產主義的痕跡也沒有。當我們得到共產主義的社會，並且整個的國家和壓制都消滅了，同志們！我們試問問自己：婚姻莫非是兩個二足獸為他們自己利益的私合關係嗎？是不是在這個社會裏面，已經脫去各種力量的器具，就沒有人可以干涉嗎？我們有全權來責問，為什麼在這無產階級的獨裁時代的第十年，他們竟能用人民委員會理事會的名義把這樣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的草案歸給我們？……我們要教導我們的那般在共產黨青年團的少年們婚姻不是個人的事體，乃是一件有很重大的社會的重要的行爲，因而也需要社會的干涉和規定。他們須知這是社會裁准的一種形式。……這種法律沒有別的，就是產生「卡沙」（Kasha 即亂合之意）！」

這一段話說之後，接着一陣的掌聲，但是後面的幾篇演說又滿不留情地給他的話大開其玩笑。有一位農

婦真刻薄，說對於利阿贊諾甫同志的主見不能太認真地去攷究，因為他的「歌兒」已經唱完了，他自己又不需任何登記的或事實的婚姻。

一個由達格斯敦 (Dagkestan) 來的黑色代表名薩穆爾斯奇 (Samurski) 的，腰間還帶着一把短刀站了起來，說如果這法律能在俄國其餘的地方實行，但在達格斯敦可要謹慎地考慮過才行，因為在去年有十個女子想不得父兄的允許而結婚的，已經被刺了。

「不登記的婚姻是淫亂的一種形式。我們應當明明白白地說：祇有登記的婚姻才是婚姻——別的全是罪惡，所以應當懲罰。你說你反對多夫多妻制，我看你想間接地介紹牠。……至少回教法是正直的……」（「羞恥！」克賴楞科在這時候插嘴說出這兩個字。）「我是黑人。所以很難顯着臉紅的。」由達格斯敦來的那位代表接着說下去。「要使家庭生活穩固，妻子必須改用丈夫的姓氏才成。……並且我對於妻子不必跟隨她丈夫的一條，也極反對。假定說丈夫接着一個命令或委任狀，要出外一年，那怎麼樣？如果她不肯跟他出去，她跟他

離婚好啦!」

「要假若妻子接着一個命令要出外一年?」另一個代表不顧情面地插問。

梅洛發 (Moirova)——一個女代表——發言：

「同志們我是個很爽直的人。當我第一次看這草案的時候，我對於這一條實在不滿意，我覺得奇怪，怎麼在革命後的第十年，當男女兩性平等的原理早已建立成功，還要加製這一條多餘的規定在這草案裏面。我們用得提牠嗎?我想，爲什麼咱們說油是頂油膩的?…但是好像我錯了。好像在我們當中，現在還有人主張妻子須跟着丈夫，無論她丈夫去那裏呢!同志們，這是太難了!」

在這討論之中，大都舉述男人的不是：離棄他的妻子；逃避付生活費溜到別處去；一個男子和一個婦人結婚爲的是在夏天好多個帮手收成，到秋天再把她離了——總而言之，所有討論新法的辯論，全是爲保護這一方可憐無助的弱性。

最後，托發利士，摩提士 (Tovarish Motish) ——

一位多毛的大塊頭農人——再不能忍着不出聲了：

「總歸是男人該罵！」他氣的爆發出來，「但是不知家庭破裂，常是因女人方面的錯處呢！……她瞧着她的丈夫有點老意。又恰巧有個年輕的男子來了，帶着情歌和小琴。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三個或四個小孩子交給她丈夫，跟那少年溜了。大統說，現在婦女做的壞事很多。她們總是跑到農婦女部誹謗她們的丈夫。一會兒全體的婦女委員聚合起來，這個丈夫一點也不知道——他至終被凌辱了。」

這一席話給了幾個代表莫大的勇氣，出來怨訴這法律太偏向婦女一方了。他們說這實在是不公道：——實在，他們聲稱有些要求生活費的女人，是專門設法引誘高薪的工人，爲的是好以後請求生活費。

就是那般堅持男子是主犯的婦女也承認婦女的行爲有時不當的。有一位農婦代表主張約束婦女使不就這種輕浮的事，方法是凡由於未登記的婚姻的，就是兒女也得不着父親的撫養。另一位婦人頂火駁道——「那就是讓農人和婦工們去做這可悲的一件殘忍事了！」



我們井池之中都要滿着無辜的嬰兒屍體。」

婦女們大都贊成保護未登記的婚姻，並且全國婦女組織送到的議決案也都是贊同。

人民外交委員貝羅波洛杜甫氏(Bieloborodov) 提出下述的事實來解明反對的主因，就是：許多反對現行的法律和這新草案的怨告，全是根據於戰爭與革命產生的兩性人數的不成比例，因而產生的許多不常的狀態。他說一九二〇年人口統計告訴我們，俄國那個時候女人比男人多四百萬。按照一九二〇年的人口統計計算，在一九二七年由二十七歲至三十六歲的男女人口比較，就要百分之三十三為男人，百分之六十七為女人；由三十七歲至四十六歲的比較，百分之四十三為男人，百分之五十七為女人。這再加上人口趨集城市中心和社會的程度的改變，於是乎發生許多的狀態，但是這些狀態等到下一代就要完全地被淘汰的；在這下一代裏，不會有這種不成比例的存在和生長了。

對於允許女子到十六歲可以結婚的一條，也有一場辯論。反對的理由是：(一)早婚是兩性受教育的一大

障礙物；(二)對於農婦尤其不堪，因為那末她們十七歲就要做母親，同時在夏天仍要繼續田裏的工作，到冬天的幾個月又要紡織，所以她們沒有等到她們的身體完全地發育已經是老嫗了。對於這一層反對，至終，女子結婚年齡也和男子的一樣增至十八歲。

這討論連着整晚地開下去，第二天又接着討論。後來整個的草案實行最後的表決，以百分之七十五的代表可決通過了。他們又組織一個根據討論去行末次校改的委員會，一共三十四個委員，婦女佔十一個。這草案的最後的形式，沒有多少的改變值得注意。牠的重點仍在登記的影響社會的與婦女兒童的利益，和那指導法院決定一對未經登記結婚的夫婦夠不夠堅固的程度，賜與合法的承認的幾條「婚姻的證據」也仍保存。

於是這法律制成了。我給這麼許多地方來描寫這法律制成的經過的理由是要表白：這全國的一件奇怪的現象和牠的被選的立法者們用這樣完全的真實與誠心，來觀測事物的真像，為的解決這一個婚姻問題。最可慶幸地，是：他們對於他們所創設的風俗和慣例都不

加以敬重與墨守，他們對於他們的決定都不承認爲永久的，並且等到情形一改變，他們還要一次又一次地改變這法典呢！

要想調和老的與少的，城市的巧詐的工人的與那曖昧的農家的顯然分歧的主見，實在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鄉下好像沒有受這最近通過的法律多大的影響。在由莫斯科的議會回到馬斯羅甫。庫特村的火車上，我看見有幾個老農想着這些新的「狗的婚禮」直搖頭，不贊成啊！在一個角處，又有一個年輕的女郎在悲哀的飲泣。她的這一段故事是由嗚咽中流露出來的。她的父親是個窮的農人。有一個富裕的老「富農」送給她父親十桶酒做娶她的代價。她父親就拿了三桶酒去給伊凡(Ivan)——她的情人——請他離開她。伊凡到底不肯受，但是她父親說無論如何她是要嫁給這個「富農」的了，三兩個較年輕的農人圍着她——即刻開起談判了。

「你真是個傻子，你不知道法律嗎？」——「你沒有登記的證文，僧士不肯給你結婚的，你要不想結婚，他

們也必不替你登記的」——把事情試告訴他們，看怎麼樣」——嘿！你還沒到年幾——他們總不能給你結婚的。……」

「我父親可要打我呢！」

「那也不要緊，請求把你父親捉去看守住好了！去告訴農工婦女部，她們會指示你怎樣辦的。你要是想和你的伊凡結婚，也沒有人能阻止你的。」

在「四旬齋」(註二)(Lent)前的這兩個結婚的月裏，在馬斯羅甫。庫特有三十五對年輕的伉儷先到蘇維埃登記，再跑到那邊的教堂去加聖冕，誦聖詩，行那神聖的婚禮。有五對登了記，但沒經教堂的禮儀。還有兩對也沒去教堂也沒登記就成起家來了。這裏還有一件離婚案。一個少女被她的父親賣配給一個人；議決身價七盧布，那天訂婚還大喝其家製酒。這個少女並不歡喜他父親給定的未婚夫，但是她的未婚夫說如果她能還他七盧布就肯和她解除婚約。她也沒法子可以取得七盧布，而且她父親又壓制她要她服從命令。過了幾天她也聽見這新法律了，她跋涉在泥壤之中終於到了在

鄰村的縣總部。她得着離婚了。



[註一]

按烏克蘭婚姻法規第一百三十三條，約如以下：

「男女處在和諧的關係之下而還沒有登記的，得二人連名請求將他們的關係登記成爲婚姻，這種的登記程序均依照本法規的前列條文中的各條件辦理。假若這請求是起於當事人的一方時，而這一方將他方的姓名舉明，當時又不能得到他方的允諾，那末，余葛斯（見第六章第八十六頁）的本地機關應在三日以內將通知書送與聲稱爲丈夫或妻子的那個人，囑咐後者在由通知宣告日計算起的一月內，務須將他或她是否承認這個請求的意見通知登記處。」

[註二]

按「四旬齋」是「復活節」前四十天的齋食期。

## 第八章

# 革命的道德

所有上面說過的，全是些關係成文法和外表的形式。我們已經看過在那些戰爭與饑荒的凶年所釀成的變亂，革命所告示的改革，環境所模成的新形式。可是男女生活的關係，新的輿論，少年人的態度又怎麼樣？現在發達一種什麼樣的倫理新法？共產黨的人們又實行一種什麼樣的道德？

開端共產黨就假定世界上沒有永久的道德真理，

牠以爲每一種的社會定立他們自己的行爲準則。這就是他們的與別人的道德的大區別了，因爲你若查驗他們根據的行爲的準則，就可以找着他們引用的「應」(Shalt)和「毋」(Shalt-not)是和那許多年代治理人性的原理有奇異的同點的。他們怎樣循用這些行爲準則又另是個問題。他們不猶豫地對於別的人，就是他們自己以外的人的態度，採取一種不同的標準。他們不這樣說：「尊敬你的父親和母親，」同時又在他們日常生活裏天天犯這一條勸戒。他們這樣說：「假若你的父母是良善的革命者，你當尊敬他們——他們要不是，你當教導他們。」

規定個人生活的準則是以社會爲主眼。共產主義的哲學對於個人的行爲沒有甚麼多大的注意。牠是以社會——整個的社會——爲着眼點，不是今日存在的社會，乃是那在建設中的社會。無論什麼與此相背的，就是不對的事。列寧給共產主義的道德會下過定義，就是：「凡使結合工人們反抗各種的剝削並使人類的社會升到更高的水平線上的一切事物。」

這是常人都知道的，什麼對於個人有害的必不會無害於全體，因為牠雖侵害一個個人的功用，但是那個個人是與社會有密切關係的。到底以後他們的經驗會不會把他們繞回來，還側重於個人身上，還是要等將來方能解決的問題。但是現在多少他們業已承認：非要有更發達得完全的個人的助力，新社會是不能建設成功的。

在革命的期中，革命本身也已經創制許多行為的法律。那個時候太匆忙了，那裏有功夫去討論這個或那個行為是對於將來的社會更有益些，更合適些。每件事都需要迅速的決斷與積極的動作。當時那般較嚴厲的年轻的共產黨黨員們對於一切關係性和愛的事莫不保持一種節制的態度。不過，無論怎樣，那個辰光他們也實在無暇顧及愛情的一些更良美的形式的問題。個人的日需頂快的幹了，在一處暫時的點心櫃台上，拿一杯咖啡茶就當一餐呀！

現在可臨到穩固的時期了。他們得開始決定行為的標準在那些為立刻的革命的便利根據之外，另求他



種的根基。雖然原理全是一樣，但是這原理不能專應乎一天或一小時內所發生的事務，我們要牠能包括這社會的動的進化。那末，我們就要制定一個有定的典籍，關於行爲有特定的規條。那根據理智的和真實的基礎，而且並沒有屏棄將來的革命理想，要把這些法則定成的全圖，已經遭遇了好些打擊。第一，前面所說的那種不愼的態度的堅持 第二，饑餓，疾病，過度的工作，和年輕人在成年期所經的許多強烈的改革，造成了各種的異象和過度，同時也產生物質的與心理的失常，這些失常的事影響了許多的少年們。第三，某種理想學說在這裏的花朵開得極其燦爛，牠的地位增高了。最末，一部分是因爲由上款生出來的反應，這一種絕對的制慾主義所表示的奇異的計劃真不在那主張極端放肆的以下。牠的主要條件是：取消人生所有的快樂事件，包括交際和歌舞，並緊持那一點所准的僅存的消遣也要形成政治的模樣。

設若有些年事較長的人們因經長時間的被那祕密的工作和預備的小戰所煨煉與調和，致在革命後的改

革上，不免於過度，我們對於這些年輕的人的失常也更不應該覺得奇異。因為內爭爆發正當他們在學堂裏回書的時候。那十字軍的革命與內爭相重的日子現在要讓與在軍政的共產主義時期內的公共犧牲的日子了，然而這時候，那僅存的物質的福利還是均分與他們。他們在那些日子可以受得的生活，他們以後再也享不着這樣激刺的了。他們的日子都為開的會與政治的和社會的運動所佔滿。關於政治的書籍也灌入這般疲乏的青年的腦袋裏去了。四圍他們都被新的和各種的意見轟擊。於是新經濟政策臨到，牠又帶着新的擾亂的引誘來。我們可以不用覺得奇怪，這些少年人準要被牠們擾亂了，而那些老些的又被弄不清的種種形式所擾。

布哈林(Boukharin) 在共產黨青年團的第五次議會裏所給的演說詳述了一些因這些擾亂而生的效果。他說最不幸的這裏有這樣一般的人：他們對於那些在革命前或在革命爆發時用來破壞的事物，認為必需還死板板地敬崇，不肯放棄。有些事物在革命前是認為有革命意味的，這般人竟當做習慣的保留在他們行為

的法則裏。比方說，吸煙有幾個地方從前是禁止的，有些年輕的人以爲每一個階級自覺的工人與共產黨青年團的團員在赴會的時候，必須嘴邊挂著四支香烟，才足以表示對於禁烟禁酒的宣傳的藐蔑。設若資產階級們是有良美的禮節的話，他們便說，那末無產階級應當比平常格外地粗魯，別忘記在屋裏面還戴着帽子並且往地上死勁多吐痰。所以一個真革命者必須使他穿的襯衣襖檻不堪，外面的衣服也要污穢的，因為潔淨是資產階級的習慣，他越能把樣樣事都反乎資產階級的習慣做得厲害十全，他的革命精神也越算大了。這還不祇限於關於行爲的事情，更包括愛情的事呢！在熱烈的奮鬥之中，這兒那裏有功夫去談戀愛，所以一個真革命的情人以後不能再爲這求愛的至微之事所擾，要想怎樣，可以立刻幹去，並且那些拒絕粗鄙的言語和「撫摩」的女子要被人控告，說她還沒除掉資產階級的偏見呢！

科倫泰的辯護這個態度——祇是沒有牠本來的那樣極端的形式——已在她的短篇小說「三代的愛」表示出來。第一篇便是瑪琍，斯德判娜夫拿的愛情趣史，

這個婦人不顧輿論的誹謗而離棄她的丈夫——在俄皇軍隊裏做大佐的——去和她的愛人，處在一起，目的是要脫離幻象的纏繞，並將餘生傾注於：到各省組織「遊行圖書館」的工作上。她有女兒，名叫奧加。有一次奧加帶着一個悽慘的愛情故事來請教科倫泰的忠告。先是她自己和一個革命同志結婚，後來因從徒流（被逐出境）回來隱藏在彼得堡（Petersburg）某工程師M的家裏充治家婦。她和她的丈夫的中間，除了政見的不同，雖則她還愛她的丈夫，但是已經變成一種悽慘的感情接合。照她母親的例子便是離去她的丈夫去找自己的情人，但是奧加經比較這兩條道路之後，還是回到她的丈夫那裏。那時她雖在撫養着工程師的女兒，她的丈夫仍是歡喜她回來。過了幾年，革命之後，她和她的女兒詹尼亞與一個比她年輕的同志安琪魯同在莫斯科住在一間房裏。她和這個安同志已是跌入情網了。後來因為她的工作太忙，常不能回去，她於是鼓勵她的女兒和這位安同志交好。但是有一天晚上她回來却捉到他們倆的懷抱。她很失意地來見科倫泰就是為這件事情。

並不是他們的懷抱使她不樂或怨恨，却是因為他們一點也沒有告訴她，他們沒有想起她對他們的感情——就是他們倆之間恐怕沒有真愛呢！詹尼亞有孕了，但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安琪魯還是別的一個同志應當負責。你猜詹尼亞說甚麼？應科倫泰之召，詹尼亞——身材高大，文雅爽直，漆黑的眼睛，她已經是個「負責的黨的工人」——來答覆前者所問的。

「你覺着我不等到和男子們發生戀愛便與他們同住很驚奇嗎？……我看過好多的小說，從那裏我才知道要戀愛須費多少的時光和力氣。……但是在這過去的幾年裏，我們那裏有閒暇的時候？老是忙，忙——老有別的事情塞滿我們的腦海。設若你被某人所吸引，而他又被派到前綫，或往別的一個城去——或是你自己忙得忘記了——何妨不利用這幾分鐘的時間作懷抱的玩意，使你們倆都能得到一點愉快呢？

「為甚麼我不告訴母親麼？我不願意傷她的心。設若我們已是相愛，那自然不同。我沒奪她甚麼呀！我真不懂為甚麼她不怕：他和我在年幾上與興趣上都較接

近，他甚麼東西都和我同享——怎麼他和我接吻，她就受不了……當她自己還沒有功夫和他接觸呢？母親以這是出軌的，不道德的，並以為到這個年幾還不懂愛情為最痛心的事。但是我以為照我的方法更好更簡單——省去嫉妒，省去痛苦。我實在不想像她那樣的愛法。要是那樣，我甚麼時候有功夫工作？」

當她出來的時候，一面走着自己問着自己：「到底誰是誰非——這新的一班人，充滿新的感覺，新的見解，新的眼界？」這聲音傳遞到圍廊的時候，有幾句回響：「同志們，快呀——我們要誤了開會時間了——那兒還有許多工作要作呢，那麼許多」——我們知道科倫泰已經和詹尼亞贊同了。

但是所有的少年人全不是詹尼亞呀！所以這點哲理不能免地要被一般人所抄襲和扭屈，拿來做墮落的門面。科倫泰自己也沒有把這個辦法當做永久不更的決斷。她祇指明當「那時是這樣的情形，我們認為不應因依照這人靈的經驗而把集團鬥奮的道德力量空費，並且牠對於革命並不能有直接影響」的極擾亂時期，這

種態度才是必需。等到這個時期過去，那可是「求愛於那帶着翅膀的愛神」的時候了，去經驗愛的快樂與痛苦，並鼓勵各種的情感——至少那些有社會價值的。

斯味爾得勒夫大學 (Sverdlov University) 的撒爾克安德教授 (Zalkind) 和科倫泰 正相反立，他把時間多份用在破壞牠的教訓上。蘇聯裏工業化的現行政策並不是側重在直接消費的物品的製造，却是集中於機器的製造。撒教授也要工業化這「性」。他相信性慾對於無產階級的關係，換言之，便是所以提起他們的興趣的，只是因為牠是一個健全的強壯的階級的生產的媒介，使這一階級能夠進行他們將來的奮鬥。按撒教授的意見是：「以性吸引如階級敵人這樣可惡的和卑陋的東西，簡直就好像說一個人對於一條鱷魚或其他怪物所發的性的吸引樣的失當。」他雖承認性是某種快樂的原由，但他覺得這勞動階級須「根據牠的同伙們所有的快樂的普通的總計而作研究，然後決定有用的與有害的關係程度，並從革命的最便利幾方面上設想，把牠的利益定為準則。」他的十二條誠命有如下列：

(一)毋使在無產階級中發現早的性生活的發達。

(二)婚前要完全節慾，並結婚須在十足地社會的和心理的雙方成熟情形之下，始能舉行。

(三)婚姻祇能成立於謀合一個長久的共同生活的一男一女之間同時，在各方面，雙方都要有共同創作的努力。

(四)性的交合祇能是因深切的完全的同情與愛的對象的接合而生的結果。

(五)性的交合不可過常。

(六)愛情須是單純的，我們所貴的是專一，不是遷移。詹尼亞的哲理是病態的，不是一個階級的意思。

(七)在每次的性交務須記住有生育的可能。生育節制和墮胎是有害的。

(八)在戀愛關係上不應有輕浮，求愛，蠱惑以及其他特為性爭的方法。

(九)性的選擇應以革命的利益為前提。身體的吸引完全是野蠻人的遺物；階級的價值，和那滌洗後世的



人類的革命共產主義的優生問題應是選擇情人最重要的兩個條件。

(十)毋嫉妒……假若你被一個沒有你能幹的人排擠，那就更可以證明你的優越，假若是被比你能幹的人所排擠，你當放棄。

(十一)毋有性道德的墮落。

(十二)性的問題應該純粹視為階級問題的輔助問題——前者的解決應以後者的利益為依歸；而不應阻礙後者的發展。

撒教授雖也承認，要是想一起強行這個完全的「性的常規化」，許會產出許多悲哀的結果來；但是他仍以爲他的辦法却是個折衷辦法——根據現況的實在的可能。總之，我們可以不用疑惑，這個獨斷的哲理也像科倫泰的主張的同樣的過度和扭曲，並帶着同多的幻象的表示。

我們拿個比方來說說罷：在拍爾姆(Perm)地方，共產黨青年團的委會裏的幾位年輕的，熱心的，清淨教徒決議一項議案，就是：晚上派偵探出去捉拿那些在河

畔「交頸」的團員們，方法是把袋子套在他們的頭上讓他們跑不掉，然後把他們帶到本會辦公處酌給他們社會的責罰和同志的忠告。關於這個辦法有件很有趣的事。委會的文書，從前曾不遺餘力地提倡這種的裁制，所以大半還是因為他的力氣才能實行這捉拿的方法的，現在可奇怪，一天晚上他竟被人入在袋裏。捉他的人們發覺是他，都情願把他放走，但是他極正經地堅持不能因他的公職的地位與以特別的待遇。他也照樣地在衆人面前承認自己的過錯。並宣稱這是他年幾輕所致，請求大家的寬恕；以從他尤加倍努力捉拿別人呢！

這一類的作爲遭人的酷刻的嘲笑就如反端的過度的受人責罵一樣。共產黨青年團的真理報 (Comsomol-ski Prada) 的記者庫斯米恩 (Kusmin) 紀載這個問題的這一部分的討論用的地方很多。在一篇題稱少年與老年的裏頭，他宣稱接到一封標題「生活的新方法」的信，裏面這位無名的作者宣告，說這日行的握手禮應當即刻廢除，因為這是資產階級所創，專用來散布病症於那些被壓迫的工人和農人之中的。結戴領帶在那般工

人階級的領袖中也認為最卑陋的一種鑽營主義，共產黨青年團的人們是不准的。漂亮的衣冠是中產階級的私見，應當改除牠，女子們也要穿皮製的短衣和靴子。戀愛須脫離所有情感的關係，並承認牠祇是——肉體的結合。那些在該團的團員不願意聽教的，並在聽完一個無味的報告之後就要作嘯聲的，他們不如去與門塞維克（Mensheviks）們連合，或是與社會革命黨攜手。無論那個要學小資產階級放蕩的跳舞的習慣，就要被該團當做野草般的除去資格。

庫斯米恩知道這一封信是很明白的，用不着給讀者們多少解釋，他便把這原信印在他負責的那行新聞欄裏，後尾加上一段短而譏諷的小評。不久有一件事真把他嚇壞了，他接到一封信告訴他在十月革命工廠裏有一位同志被推薦給關於「生活的新方法」的一個報告，這個同志於是細細把上述的信研究一下，加上自己的發揮，就去貢獻這報告了。有幾個同志不贊成這篇「論文」，可是這位演說的像頂能隨機應變地送他們一人一份共產黨青年團真理報表明他有中央委會的背景。

他們却寂寞了「這個。」庫斯米恩同志說，「看起來像一件奇事，但這倒是一片真的人生事蹟。當我接着那些贊助那封原信的著者的意見的時候：我的頭髮都要堅起來了。這些信裏的一位寫信者說：戀愛和共產主義沒有關係——我恐怕那我的這位年輕的朋友由門口推出去的人生還要從窗戶飛回進來呢！

「共產黨青年團的同志們是忍苦沒處說，」庫氏在結束着。「許多權勢都挂着他們的招牌。他們正想着法子躲避相背的勢力。新需求，思想，和願望已誕生出來。舊的制度已是破壞了，新的可還沒有創造成。……那些年輕的團員，沒有功夫去做放縱的事情的也喝起酒來了。假若一個女子不准人家的帶泥的鞋擦髒她的床褥，或是晚間換一件寬點的衣裳，他們又稱她有小資產階級的氣味。……但是那怕甚麼，假若我們這些在青年團裏的同志努力的工作去，自己能獨立，也穿得乾乾淨淨，竟能穿得多麼好看就怎樣穿，就說罷，戴上領結，只要他們自己樂意——不要做太多的例外的的工作，把這種工作均分給全機關的人員——如果這些村莊的年輕

人在公餘之暇，跳跳舞，和弄弄小風琴，又有什麼不好？」

在這老的和少的兩代裏面較比折衷的領袖們對於上面所說過的兩種極端派，深加以攷慮。我曾與談於那些老的共產黨員，他們多年的在秘密工作的服務，經歷革命與內爭，現在黨中佔着要職的；我也曾和那些在工廠中的年輕的人談話，還有和那些在大學堂裏和在普通學校的，偶然在火車上遇見的，在會場的以及等等地方遇見的青年人接談，由這裏我洞悉他們都以一種驚人的，直爽的態度去討論他們生活的事實，努力——拼命的努力——去尋找解決之方。所有他們的短處都毫不掛忌地宣示於大眾；多少的文章和書籍也寫了出來。這個問題越變得緊要了，後來——大概是一年前的光景——共產黨監察委員會把這黨的倫理一問題提到執行常會去。那般新入黨的人，他們的舊寶已然破碎，但是也不能重新的恢復，他們對於日常事務的行動實在要找一種引導的東西。所以這監察委員會覺着公布一些有定的「訓導大綱」的時候到了，並預備創出關於倫理

的新輿論。

自此以後，黨中的一些領袖才致力於制定某種行為的規則引導一般的青年人。共產黨青年團和黨的新聞紙和雜誌在每一期都用好些篇幅專為「道德」與「標特」(Buit)兩問題的討論和論著的文字。後面這個字，按字義講是「存在」的意思，但是這個字普通的用意是「某一種階級的社會在某一個時代所有的物質的與文化的景況的總數」或更簡單地說，就是：「生活的方法」。我們聽見過有許多青年寫信請問於老年人的忠告，並且這些老年人很乾脆地像一般普通老者一樣地回覆他們。近來，共產黨青年團印刷所已彙集這些文字編成一部總算完全的階級世界(Comsomolspi Buit)。這本書的內容還值得注意，因為除去幾篇之外，在俄國還是第一次出版這種的書籍呢！

一九二〇年在列甯與克拉刺西德奇恩(Clara Zetkin)的那次謁見，他們談話裏的一段是現在大家以為正道的共產主義對於性道德的觀念的最當的表示。列甯一開首就表示對於這件事的詫異，他說當第一次的

無產階級正和全世界反革命者奮鬥得熱烈的時代，婦女勞動的評論界竟把性和姻婚的問題討論開了。他暗誚一般青年人對於這性問題的「新式的」態度：

「青年們對於性生活的問題的已改的態度自然是根據「原理」和「學說」的。有許多人管他們這種的態度叫做「革命的」和「共產主義的」。他們倒也很真心地相信了。但是這並不影響我這個老頭兒。雖然我比誰都不憂悶和絕慾，但青年人的這些所謂「新的性生活」的，常常老的也在內——時常好像是完全資產階級化，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娼妓所一種變態罷了。這些和我們共產黨所領略的自由戀愛完全沒有關係。你一定很熟識這個出名的學說，就是：在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裏，性慾衝動的滿足與愛情的需求要同喝一杯清水一樣的簡單和無關緊要。真是地，我們的青年同胞癡狂在這一個學說上面了。這也是許多年輕的男女的惡運，那些信仰這學說的徒弟們堅持這是馬克斯主義呢！……

「自然渴是要解去的。但是有這樣的一個常人，在常況之下，會伏睡在大街上喝那些泥水嗎？或是還喝那

十幾個人已經喝乾的空杯嗎？這個比方還不恰當；我們注重的應是牠的社會關係。喝水不過是一件個人的事情罷了。但當兩個人發生戀愛以後，從中又生產一個第三者——一條新生命。社會的福利由此發生，對於團體的職分是要注意的。

「我不願一刻講這種制慾主義的道經。共產主義提倡並給與那從愛的生活的成就而得的人生的快樂與勇氣。在現今常見的那些性生活的過度，按我的意見，是不會得到人生的快樂和勇氣的，祇反而減少牠們。在革命的時期而有這種事的發生真糟，真糟。

「年輕的人需要遊戲，泗泳，旅行，各種的體育訓練，種種的智力之興趣事——讀書，調查，科學考查——一個健全的身體做成一個健全的腦筋，我們不需甚麼僧士，不需頓，朱安（註一）（Dn Juans），也不需德國的純重物質的人做我們快樂的媒介。

「你總知道我們的那位年輕的同志罷。……他是個很好的，天才很高的青年。我恐怕除了這一點他一無可取了。他由這件戀愛史跳到那個。那不是為政治的奮鬥



或是革命呀！……革命要人能集中於一，全體和個人的力量放在一起往前努力。無產階級是一個正在進步的階級。他不要「酒醉」來消滅或鼓起他的勇氣，或是以性慾的恣縱或是以酒精……他需要清靜。

「但是請恕我，克拉刺。我越說越離題了。你怎也不提醒我？這是我的恐怖逼我說出來的。我們的下一代深深騷擾我——使我不能安甯。牠們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資產階級社會的惡現象又開始的在這革命的世界裏發現——好似一種莠草的活根的蔓延——那末，不如快快想法子去抵禦牠們罷！」

着接的幾篇是布哈林，盧那卡爾斯奇，雅盧斯拉夫斯奇和約二十個別的名人對於列甯的這種情感的反應，並發揚行爲的準則更特定些。他們說那些行爲的準則是建築新社會的人們所必需的，就如傢伙和木匠的關係一樣。重點決定是在清淨主義一方面。他們全連合起來在反對酒慾，煙慾和性的放任的事情上。他們堅持着討論這個問題的原因是純粹由社會的影響上着眼，並不是給這些青年人講道。他們老實地承認這班老

者對於現狀是差不多應受罵的，因為他們負教導之責。他們也漸趨於明白這個，就是：這一老的世代僅有政治就足夠活的了，因為這般老者在他們的時候還有別的事情，但在這一世代的人們還需一些別的東西來滋潤他們的生活。

從頭到尾都側重在過渡時代的家庭的重要，他們比之將來社會的「細胞」，和在國家還沒有設備完畢以應訓練兒童一切之需以前，父母有訓育兒童的必需。此外，還有幾位主張優生學的厚理的。

「我們的青年同胞切不可忘記一件事，」科勒索夫 (Nikolay Kolzov) 教授這樣地寫，「他們中之最優秀的份子不祇要盡他們的力量和能力在組織新文化一事上，而且還要把他們所有的能力傳給下一代的人們，不要把這件人類繼存一事倚靠那般無用的人——他們像野雀的活着，把他們的不慎和力量的缺少盡遺傳給他們的子孫。所有的健全的強壯的並能幹的青年男女須在他們的身體的成熟時期的一開始，祇要是他們希望下代和這一代同樣的發達和富有天資，切不可忘記他

們是至少生育三個，最好四個國民。每一個要結婚的年輕人在選擇配偶的時候要想及他挑選的人是他自己願同生育和訓養最好的兒童的。所以對於懷有這種態度的人們，這現時關於婚姻的法律，登記，生活費和別的等等的爭論都失去意義了。]這本書末尾的一部分是由各共產黨青年團組織歸納來的議決案和報告書，有些可慘，有些可笑，都是用作生活的新方法所不宜效法的譬喻。

上面把他們自己所說所寫的略述了一番。好像是我儘根據他們自己的觀察赤裸裸地獻給讀者諸君，而自己的意見不會參加多少。這不是無因的。我們敢大膽的斷定：一個外國人對於俄國的文字懂得很有限，同時又和在俄的美國的團體常在一起，他一定不能十分明瞭俄國生活的底細。按我的感想，我的觀察，對於俄國今日的生活寫真，總真是一張較可樂觀的了。就是關於那灰黑的蔭處，我也能運用我的幻想描出牠的經過，我絕對沒有對於他們的努力的鄙吝的，可笑的，和悲慘的幾方面，覺得驚奇過。我所真以為可奇的還是：他們仍

能保守若般多的理智，與他們已經創作的秩序的美滿。那些極端的主張我也不當回事，因為由俄國的歷史我很明白俄國人的特點，那就是在達到一個平點之前他們必先要搖擺得一個很大的弧形為止。

我們要想斷定俄國的現況，還應當記住一件事，那便是：他們對於性問題的態度不免有一種非常的樣子而非盎格羅薩克森的腦袋所能了解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到外旅行，關在火車上的房間裏，同在一間房內睡覺，在河邊或海濱他們和她們都滿不在乎地解脫衣裳赤裸裸地相對。從前的離婚禁令特使他們熟習「特別的婚姻的關係」的意思，並不像西方的那般注意到底是丈夫還是妻子的不忠的事實。俄國今日的淫亂比起別處的確要厲害多少是不好度量的。不過我們可以很顯明地看得出她的淫風是比任何地方都興盛。這種的性交的自由產出許多的妄用，自然是無可或諱的了，但是這種坦白的態度至終歸結的，恐怕還要比我們的假設的正道所能收效的更好過幾倍的兩性中的健全的與常態的關係呢！

前面我已將新道德的兩相抗立的趨勢描寫於讀者諸君之前，因為有時候這一方要用來證明現代俄國道德的墮落，或有時那一方的意見要用來證明他方的死板的墨守。但這兩方全不是真確的。現在還未見任何規模的出現呢！這所謂新的道德典仍是一件動的東西。因為這些規則的嚴厲，就有一般老年人出來主唱，說反乎這規則的也必有相當的代價，這種的唱說也有一般年輕人出來贊助。這裏有一件事最清楚的，便是這大幫的青年不願意接收這個理想家的道德典為最後的形式，和他們的堅強的目標：就是他們要把他們的行為和將來社會的需要相調合——在那個社會裏人們要比起從前任何的時代，得到更美滿更文明的人生。

他們對於自己的過失的承認，自己的庸愚的嘲笑，都已經收得相當的效果。污穢和破爛的讚美大部分已是過時了，現在呢，也有享求快樂的趨勢。我會特別注意那些在共產黨青年團的同志，他們關於自己的外表的裝飾和平常的態度，完全的改變了。關於跳舞與娛樂的禁止的反應，也已開始了。

在工廠，大學校，鄉村和共產黨，青年團的公事房裏都是些活潑的未成年的男女，他們充滿着計劃，熱心和一種在搖動的力量。

「你別以爲，」在莫斯科大學的一位年輕的醫科學生對我說，「祇因爲在一般的青年中這性的問題是個「病態的」問題，而疑心所有的青年人全是這樣。我們當中的大部分還沒有功夫去思想這些無用的事體呢！我們不祇爲將來預備自己，而且我們在讀書的時候，就從事於一些實地的工作。我們也帮着教導那些與大學堂有關係的工人們。我們多數的學生又根據我們學過的東西到工廠去開班。女子們比男子們還要辦得起勁！……男學生和女學生一點兒人爲的區別也沒有，這足可以消滅自覺的一大部。自然我們也願意找個伴侶。有許多已經結婚了，所以我們的宿舍充滿了小孩子呢！」

這位學生把我領到宿舍裏去，我才看見一些小家庭在裏面住着，每一對在一間小房子裏，夫妻都在念着書，嬰兒也同他們住在一間房裏。有時在白晝育嬰房有他們處置嬰兒的地方，但是尋常這做學生的母親須自

己帶她的小孩兒，在白天僱一個婦人幫幫她的忙。這是這些母親自己願意的，因為她們想不如當她們年幾還輕的時候看養小孩子，等到以後她們好把所有的時間盡量放在工作上面去。沒有幾對夫婦有兩個以上的嬰兒的。他們告訴我，現在所以有這麼許多嬰兒在學校裏邊的原故，是因為這一代裏有許多人們沒有機會在普通的年齡完結他們的學校時期，不得已祇好現在來補上了。

好多實際的方法，為的抵抗在青年中的許多不衛生的事情的趨勢的，已經實行了。醫士們和專家常演講早的性交的放任與性的病症的危險的一類題目。全是充足的，老實的演講，沒有絲毫的隱匿。此外，還有電影宣傳這種的教育。他們對於散布充分的性教育到學校的一事上也十分地努力。尤關緊要的，是那「遊戲運動」的近幾年的滿佈全國，真是令人驚奇得很。他們極力地發揚遊戲和體育，但並不是拿牠們當做目的，而是以為達到一個更強健的身體和腦筋的路境，同時又是為那剩餘的力量找條出路罷了！講到娼妓一節，牠的統計非

常之少，我很難引證甚麼確定的數目。不過管保這句話是不錯的，就是：現在的娼妓比舊日少了些。許多調查指示我們，說大學生到妓館的也比從前少得多，這種的現象可以說是完全因為現在自由性交的機會比從前多了。不過娼妓在今日的情形還是使政府不好用急切的法子去禁止牠。他們覺着最有力的拒娼方法還是：(一)實行增高工人經濟程度的普通計劃；與(二)社會主義的宣傳。當這些事都成功見效，他們相信：娼妓一定會消滅。但他們也以爲有即刻計劃實際方法的需要，所以已經組織一個「抵制娼妓中央理事會」，這會是在衛生部之管轄內。

在關於這個問題的政府的宣告和告示裏，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就是：他們所要打倒的，不是娼妓的各個人，而是在打倒這種的制度。法律祇科罰那般壓制婦女以爲己利的人們，不去責罰娼妓的本身。妓女要是散佈性的病症給人家的時候，法律也要出來罰她的。因為這種病症的傳染，不論男女都是認爲有罪。最近，法律又修正了一點，便是：凡傳染他人性的病症的應被



處罰，所以現在許是已有娼妓的強迫查驗和治療了。

地方的巡警已接得命令不准採用壓制的方法反抗娼妓的個人。

「就事實而言，」訓令書上這樣寫着，「婦女去做娼妓事業的，多是因爲這不可忍受的物質上的和生活上的環境所逼得不得已而致，所以巡警的各人在行使職權與這般妓女接洽，務須遵照所有的相當的和禮貌的規則，並不准在任何情形之下，表示粗暴一點的樣子。」

關乎一切因交媾而生的病症，現在普遍俄國都設立施醫館，這是他拒娼的一個特別方法。和她們相連屬的，還有許多公開的講演，電影以及開班討論，不祇爲那些在療治中的人們而且是爲全體民衆的注意。在列甯格勒和莫斯科地方已有許多「勞働協作社」的組成，在這裏那些業已受了醫治的而且不願再營舊業的妓女們，在她們的傳染時期之後，得酌量給與工作，並每月可得定數的工資。在莫斯科，又有這樣的一間裁縫舖，約供容二百二十個婦人，並其中有一百二十個是僱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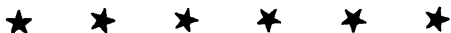
常年的。在這間裁縫舖裏面也有食堂和寢室的設備。她們又有遊藝室，牆報和共產黨青年團的組織。這許多縫紉機全是由衣服托辣斯給預備。這一般的女子都在忙着爲衛生部製圍裙一類的物件。莫斯科還有一種出名的夜宿處叫做「艱民暫留所」(Ermakorka)的，這裏備有各種難民的住處。特別設有婦女部分，真是救了不少婦女險些就去當娼妓了。距莫斯科外的二十里光景，我有一次參觀一處專爲青年的妓女的所謂「小農田殖民地」的。我看她們都貌似強健的，快活的一般普通青年，從前當過娼妓的一點舊痕跡也看不出呢！

在這許多實際的救濟方法之外，還有由衛生部，共產黨，各婦女組織和各工會等處的經常的宣傳，反對娼妓的運動。這與娼妓戰鬥的方法，是同時並進地抵禦「需要」和「供給」兩方，由制定新的衛生準則上着眼，以使青年和工人們能發覺在這無產階級的國家仍有娼妓存在的羞恥的感覺爲目的。那些妓女的羞辱，還沒有那般以妓女爲漁利的和爲玩物的人們可恥。共產黨中央委會業已頒布命令：凡與娼妓有關的黨員一概除名。

這新道德典的制成在受這些不斷的演講和評論或體育運動的提倡的影響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兩條要素。這兩條要素就是解決的要素，那便是：新的需要和人生的福利。恐怕這裏還沒有這樣的一般徒手好閒的青年男女有功夫整天為創造時髦的衣裳和髮裝上着想，使民衆們效法罷！這兒還沒有大多的青年人以逃避機械的生活而專為性慾所吸引，畢生的精神置於增高他們的性慾的滿足，用千種的不自然的方法去謀得，並受各方的好廣告的呼喊而勉勵罷！在俄國的大學校裏，你找不着甚麼叫「普通教育」的（即常識的教育），他們不要每年產生一大幫的「半熟的智識階級」而反增多懶惰的和不知足的隊伍，他們的學校和專門大學都是教些專門的東西，父母按法律講也有對於子女依其所適而為選擇一種職業的義務。

他們的性慾不是一條避免機械生活的出路，也不是本身即是目的。假若人們把上述的任一種見解做為根基，那末，這性生活便要變成更有生機的，也許是更野蠻的了。但他們是設法使牠和他們生活中的別的條件，

成立適合的關係。他們被工作，研求，和建設新的世界的事務纏得他們太緊了，那裏能像那般遊民或是那般人他們的生存的價值沒有別的地方可以使之用途除了把他們原有的力量和渴望全部都放在這個上面呢？但是這裏還有許多許多想不起來的東西使男子祇把婦女當作女性而對於舊的見解還未能破除的。雖然在這老的一代人裏仍留存着舊的腐敗品，但在這一代年少的青年之中，男的孩子和女的孩子已是佔在平等的位置上面。普通對於婦女的能力所取的一種藐視和陵辱的態度祇能在老的世代裏看見，在新的這一代裏是難於尋見的。自然要講到鄉村和小的城鎮，這些話都要減少分量，因為在這種地方不像城市有這麼許多受教育的機會，她們那裏的家庭與舊的觀念還持着較大的權威呢！老實話，在俄國的任何地方已不見兩性中的一些不自然的態度了。在各方面男子與女子都有同樣的機會。每一個女子要自食其力也已是公認了。所以，還是這些經濟的與社會的動力把這新的道德典，男女間新的關係，與將來的家庭給制成的。



[註一]

按頓朱安是一個古傳的神怪角色，他在歐洲——尤其是德奧及西班牙——很是盛行一時，諸君若想知道他的詳情可參閱 *Encyclopedia Britainica*

## 第九章

# 住所的設計

「家庭」這兩個字普通總是包含一個家的住所或某種家務設備的意思，但是在革命後的頭五年，那些無家的家庭流連在各處的，以千萬計。因着侵入的軍隊或饑荒的天災，人口由這一縣逃到他一縣。我們常看見他們住在火車道的兩旁，除了一個水壺之外，家中一無所有。圍繞這個舊東西，全家幾口可以耐性地坐着幾天以至於幾十天，等候一個機會往那已然乘客過滿的火

車擠去。俄人有一種特性，他們無論到甚麼地方都能極敏捷地開始整理家務。我還記得有一次看見一對年輕的夫妻在人多的火車站的月台上鋪開床具——甚麼枕頭啦，被單啦，絨氈啦，真是應有盡有，無所不備的在那裏滿不害羞的懷抱着睡。一個火車站的月台，被一個俄國家眷佔據了，這個月台真是全世界最妙最像家庭的地方呀！他們自己的床鋪在展着，茶壺滿盛着由車站水管放出的熱水，同時我們還可嗅到那熟識的鹹鱈魚和大蒜的氣味。

那些家庭還設法去維持像個家的樣子的，也真是比那些所謂無家的家庭強得有限。他們簡直沒有功夫能顧及家庭的生活呀！他們所最關心的乃是存亡的問題，談不到要上甚麼地方或怎樣去度日的事。大概還是這三兩年來才起始談論這住所設計的問題呢！現在他們關於住所設計的情況一概公開。他們不遮掩自己的錯處和缺短，並能努力的更改。既然今日偌多的惡現象——家庭的破裂，墮胎，娼妓，青年人的墮落，病症和酒慾——都是直接地或間接地歸因於住所設的缺短，那

末，爲決定採取任何解決方法，我們務須仔細考慮到俄國將來的家庭生活的一大問題。

遵循歐洲各國的先例，緊跟着俄國的革命就遭遇這住所的恐慌。其實她的古城和破鎮已有相當的毀壞，很夠資格重築的了。多數的工人住在潮濕的地窖裏，就是現在，也還有些仍祇得住用。所以，在戰前在工業的中心地方已早有一個結實的住所設計的恐慌。戰爭一起，就把要照規劃修理和建築的全給停頓了。革命告終之後，工人們自己去佔據那些大屋宇，旅館和宮府。在那個時候人們都多不懂甚麼是公有財產所應取的態度和保持那些現在已經歸人民所有的物件的需要。所以我敢相信這裏沒有甚麼有意義的毀壞。可也實在不能怪他們，他們從前就沒有住過這樣有熱水管的房子，叫他們怎會愛護牠？管子裂了或是窗戶碎了，他們不去修理牠們。那些打過仗的（在內爭的時候）街道更爲不堪。當我第一次到莫斯科的時候，這種破壞的現象，處處都能看見。大屋宇的牆上儘是些鎗彈鑽傷的小洞，窗戶又是歪歪斜斜，破破爛爛，還有一堆堆的磚瓦在房屋傾倒



的地方。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破壞達到最高之點了。那些曾在那裏過冬的人們常把這可怕的冬天一次次地描寫給我聽。那個時候沒有柴火。屋頂和窗戶都有裂口。差不多我們找不到一間沒有洞的房子。逼得沒法子，他們只好折毀這破房架子拿來當柴火燒，那種景况可想而知。

婦女們在這種極困難的情形之下主持家務，真是不易；要想法子使沒有水，沒有食物，沒有柴火而全家還能得到飽足和溫暖。她們常常要擔着重得要命的柴水上那很長的樓梯或石級——那個時候他們沒有升降機——或是站着等着——幾個鐘頭的等着——那一點戰糧，這又常是些鹹糟魚與一小塊的黑麵包。

到一九二一年的春天，那正是新經濟政策的起點時期，也是饑荒的恢復時期，我們可以查覺在住所設計的情形方面已有相當的進展了。在一九二二年二月我那次經過的莫斯科和我在本年的十一月再到的莫斯科簡直是好像兩處，真是神怪。傷口都治好了，到處都看見新鮮的油漆，水管與窗戶也都修理完全了。

在所有的工業中心，尤其是在莫斯科，這住所情形的改革不久就又停頓下去。國都由列甯格勒改到莫斯科反使後者不能繼續的發展，感到許多的不便。因為工業的復興，從前的那大批的工人因工廠停辦而不得已回到鄉下的，現在又擠到城裏來。父子們許多年沒有見面的，一陣遇見了多麼歡喜，但是他們的白鴿籠一般大的房子却要更多擠入幾個人進去。那般久在田裏，不但沒有牲畜或種子，有時連耕具都缺少的，早已感覺得在鄉下的無味，一旦聽見城市改良之消息，更使他們決意離開鄉下而奔到城市來了。這種的現象仍在繼續着，比方在莫斯科，羅斯托甫，端河流域，和巴庫這些地方，房屋都不能照平常應容的人數居住分配，並且每人平均能佔的地位也越來越小。八九個人擠在一間房子裏一點也不算奇怪。來個客人也要將就些共枕而睡了。

其實可以居住的地方而因毀壞或修理的缺少沒有人用的約有百分之二十。在工人多的居處，他們曾選舉出住所設計委員會去整頓這件事，不過這些委員多分是莫不關心，他們也沒有一個集中的權力，也沒有集中

的計劃。國家自然不能管到建築人民的房屋或給人民修理房屋的瑣事，所以祇得讓工人自己去料理這些整頓的事體。於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九日政府公布一道命令准許人民有自動的組織「居處合作社」的權利。到一九二五年這許多的組織又使集中於一個中央機關，那便是「居處合作社中央協會」(Centrogilsogus)。所有的居處合作社可分為兩種——出租合作社與建築合作社。這第一種是由那般住在國有的房屋的人民所組成。這種合作社常年地把這國有的房屋由政府租來；借債的辦法，房屋的保管，修理，以及擴充的事宜一概由這種合作社擔任。這中央機關也竭力地幫助牠們，一方面替牠們買批售的建築材料與給與牠們技藝上的扶助，他方面替牠們宣傳，並在組織更含着理性的生活事務上助以實際的力量，並鼓勵團體的文化運動。那些已是居住在這裏的人們牠為他們正式組織成為合作社，那些新的團體也組織起來，以備居住別的空房。

我到過許多與工廠或其他的設施連屬的一種公共化的居處，由此我查知牠們的社會的發展並不整齊。那

些在革命一完就改度一種完全共產主義的生活的差不多全結局於失敗一途，因為他們沒有訓練和準備，現在已是轉回頭來實行個人主義的制度了。同時我們又可以見得一種人，他們在慢慢地移動，所採用的新的社會方式也都加過試驗認為滿意的，現在是正根據一個強健的基礎往一種先進的社會組織進展着。

所收集的大房屋之中，有些是好像大學堂的宿舍或旅館的樣式，在那些長的過道是一排排的單房間。常時全家的人擠住在一間這種的單房間裏面。有時這種的大房子只有一間中心的膳堂，或是一間中心的廚房，要食物可以由那裏叫來。最普通的是：在每一層樓有一間中心的廚房或是普通廚房，飯食由婦女們自己預備。有時這間廚房是廣寬而且空氣流通的，裏頭設備許多個爐竈，而且甚麼時候都有開水。但是尋常多是小而擁逼，婦女們擠着搶爐竈用，空氣中滿着煙氣與口角聲。她們有時自己把汽油爐拿到廚房裏去，各人自烹食物。否則她也可以在自己房裏烹煮，在那些住所分開幾所的，大概更是擠得厲害。因為一個家眷居住一所房裏

的一間房子——差不多五六個家庭擠在本來應當一個家庭住的地方——還要分用這一間廚房。說起吃飯的時間，更要使人頭痛。可以說是那個時候在全俄的各城市沒有幾個婦人能獨用一間廚房的火爐的。我們還可以看見，常常廚房也就是臥室。但是，統起來說，在這些慘淡的事實之外，的確工人們大體比從前過得享福了，就算對於婦女們，這些公共的住所也有社會的設施，使她們脫離從前的煩悶的家庭境況。每一處公共的住所備有各種的遊藝會，圖書室，白晝育嬰房，並且由教育與公共言論的媒介，婦女們逐漸地趨向更理性的生活走去。

國家在所有的城市中的財產的價值共合六十萬萬盧布，其中的一半——實際已能包含一切最大的樓房的——都由政府簡接經居處合作社的手租給人民了。在全蘇聯(U.S.S.R.)的二五,七〇〇,〇〇〇城市人口之中，有百分之十五的人民是租住由居處合作社租來的房屋的。統共有三一,五〇〇個獨立的合作社，大多是設在工業的中心地點，例如在莫斯科，列甯格勒，

羅斯托甫，巴庫以及端河流域等等。在這種合作社裏每人分擔的費用是由一個半盧布至二十個盧布。他們最大的困難就是籌備充足的經費為修理與進展的事業。說到社員付租錢恐怕是有其名無其實的，所以有時他們祇好給那般新經濟政策實行後的新興資本家定個特別高的租金硬敲他們的竹槓，才把這個經濟問題解決。當那些公共的和本城的銀行開辦的時候，牠們全都金融緊逼，所以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她們祇能允許短時間的信用，就是由三個至十二個月，而且利息也很高。等到次年中央市及建築銀行成立，再加上政府給的建築信用的特別補助金，情形自然是進步了。此外另有一條來源，那便是政府所告示的「增進生活情形的經費」，無論那種的企業都要提出利潤十分之一充為這種居處公益的費用。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這一筆經費竟達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之多。在那些居處恐慌特別厲害的地方，必須將這種經費的百分之七十五撥用在居所設計上面。

現在讓我們講講建築合作社，最初的 個建築合

作社是在倭羅格達 (Vologda) 產生，牠本是由火車道旁的一些店舖組成，接着又有那般鐵路工人所籌的計劃。到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第一次的居處設計議會在莫斯科舉行了。他們是專為全俄籌劃一個整個的計劃的。在一九二四年建築合作社的組織已有十七處，並且有許多的企業開始扶助那般自動建築居所的工人們。

在一九二四年十月我碰巧路過北高加索地方的省城端河岸上的羅斯托甫 (Rostov-on-the-Don) ——這也是居處恐慌鬧得特別厲害的一個城市，因為在牠所屬的這一縣的經濟方面與政治方面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就順便參觀參觀這些新築的工人住所。傍晚的時候街道都頗形擁逼——由本地的煙葉，織造業和農業器具製造等工廠散工出來的工人們，和政府的被僱者們。這般供職於政府機關的在沒有多少時候以前，也何嘗不是在工人階級之中。礦工的代表團由端河流域來請撥建築居所的款項，弄得暈頭暈腦的農夫們由本縣的各處跑來打聽關於田地，稅率和機器的消息。黑眼珠的哥薩克人與那些從俄國中部來的藍眼珠的斯拉

夫人混雜。這般高加索人種，黑濃的鬍鬚，寬大的衣裳，細着閃耀的鑲銀腰帶，身旁插着手鎗和刺刀，揚揚乎自得地走着。在遊藝的地方則有工人的俱樂部，花園子，運動場，電影院等，但是裏邊全都人滿如蜂窩一般。

之後我走到城邊的地方，只覺得忽然身處一堆新房屋的小叢林裏面，這些新房子的建築程度不等，有的完工了，有的才動工。耳膜祇聽得槌擊和鋸木的雜嘈聲，男子們隨意吟吐的低沉的音調——當地人民的一曲有節韻的古謠——不時地參插在這些聲浪中。我於是過去與幾個正在建築的工人接談。他們告訴我：有一般的工人實在不能住在這樣擁逼的情況之下，他們再忍耐不了，遂即去要求工廠管轄當局設法改良。管轄當局所答覆的是：准許建築材料的信用在若干年以內償還，賒借的數目與償還的期限又以工人的薪金為定，這樣，工人們可以建築自己要用的房子，償還原來的信用好似每月付租一樣。不是人人都能借的，乃是那些比較貧窮的才准許賒借。這些最先期的試驗不像以後的集中於公共的利益所抱的計劃一樣，但是牠們比起從前



工人所住的茅舍，却有如天淵了！

兩年以後我又到羅斯托甫。我想找找這一堆房子在那裏。自從那年以後許多「浦西歐拉克」(Posiolok)——他們管工人的村就叫這個名字——興起來了。現在比從前多得多，但我始終不能把上次所見的房屋找出來。在十二月的一天嚴冷的下午，我任意地挑了一個工人的村，僱了一輛馬車出發了。我們在爛泥之中行了一「維爾賽特」有半(見第三章註三)的路程，經過一個正在建築中的工人的村，牠是許多長排的呆笨的三層樓房所連合而成，極像美國的一些醜陋的郊外。

我所要參觀的那個工人村可沒有這種難看的現象。一共約有七十座矮的白石灰房，前面有一條大路，房子相隔是也有空地，中心隔幾間大的磚房。在那天下午的兩雪霏霏之中，真是沒有甚麼地方可以引人的注目，不過這幾列的細小的樹叢，大有將來無窮希望的含意。

我們敲了幾家的大門，可是連着碰了幾個門釘。後來才有一個小孩子過來告訴我們說人人都到俱樂部去

了，又領我們到那堆紅磚石大樓的最大的一座裏去。這裏頭完全是公共努力的一張刺激的畫兒。有幾個男人正在這大堂的盡端佈置在戲台上的一點將完的工作。其餘的人在製做長凳子。又有一般的婦女坐在地板上縫帳幕，還有一般年輕人在畫風景和着火的景象。一般不倫不類的人在臺上好像是正在排演戲劇；一個人在提詞者的包廂裏（這是在俄國各個舞台的一件最明顯的東西）大聲喊出幾行劇詞使在這些喧嘩之上，讓演員聽得清楚，那些演員也以呼喊回答他。一位黑髮的大力士，頭上戴着一頂大而且毛鬆鬆的羊毛帽子，穿着皮的短衣和長靴，好像在指導建築和戲劇的排演；他看見了我們，便走過來介紹自己是合作社的社長，並很客氣地問我們想要打聽甚麼。我就很乾脆地告訴他我對於這些工人的房子的興趣，他立刻找了個代理，自己同我們出來。他給我們解釋：說他們現正利用星期六的下午和假日來自己做完這間俱樂部，他說這樣可以減少一半的費用。下星期就可以開用了。

我們進了幾座；那些原本的目的是當做兵房駐兵

的改用得總算合適而好看了。每座房屋有六部分或六所，四角的四所是大的，中間的兩所是較小的，這兩所是爲單獨的工人或無子女的夫妻的。每一所房都有自來水和廁所的設置。一間一間分開的浴室在俄國還是稀罕，因爲在俄國人人每星期都要大洗一次澡，而這種鄭重的沐浴全在公共的澡堂舉行。爲貯藏雜物，又備有地窖和耳房。在這些房裏，所佈置的樣子全不一律；有些在房角還擺着偶像，有些懸着列甯和史丹林(Stalin)的肖像。

一會兒我們到了這位社長的房所裏，他又告訴我們他怎樣的籌劃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資金去把這些兵房——還沒完備的兵房——的這些空白不雅的牆壁，飾成適宜的樣式。

「我本來是農業機器工廠的一個高等機器師，並且在工會的工作上也很活動。我在每一次的集會總提出這居所的問題。漸漸地在本工會得到相當的同志，後來在別的工會也有贊成者，我們人數夠了乃從事組織一個合作社。他們大家都要求我把原有的差事辭掉，並推

舉我作這個合作社的社長兼經理。現在啊，比從前要忙得十倍。但是值得的！]

他又說：這個小社會總共住二、六五〇個人，其中的六一〇個是本合作社的股東，股東的數目仍在增加呢！那些工人所在的各個企業，扶助我們六〇〇，〇〇〇盧布，工會也幫我們，蘇維埃給我們一筆長期借債，牠的數目是全數所需的資金（即二百萬盧布）的百分之四十。不過他也承認有不順利的事。這不可樂觀的事，就是：這件事情需要鉅大的費用。連付從前的那些舊兵房和支用這些在新添的樓房的費用，平均每一座房子要三二、〇〇〇盧布，或是每一所房間要五、〇〇〇盧布；比起目下在俄國工人房屋的平均費用，要多一倍。這合作社爲利便工人們，乃把租錢劃照以下的定則：那般工資最高的，就是由八十五盧布至一百盧布的，住用每一正方「阿爾山」(Arshine—「阿爾山」等於二十九英吋)的，須付租金二十戈比；那些工資在七十至八十五盧布之內的，每一正方「阿爾山」須付十六戈比；一直地類推下去，直到那般失業者，住用每一正方「阿爾山」，

才五戈比。煤火，電水祇需數個盧布。每一家每月的總費計由五盧布至二十盧布。有時那些較比大一點的房所，差不多三間房子一間廚房，可以兩家分住，那末，費用更可以省却許多。就雖然這樣，在這裏的工人平均每人所佔的地位，和那些住在城裏的所佔的，比較，也還寬舒一倍。爲他們的方便，電車的路線特加長一哩，他們的車費工廠給支付，所以他們雖然離得遠一點，也無妨的。其實他們倒過來還賺一筆，因爲天氣好的時候，他們不必乘車，把車費留起來，走着去。

這位社長的夫人好像很害羞的一隻老鼠，躲在她丈夫的後面，祇讓他一個人說話。但是我先對她開言了，慢慢才曉得她是一個農工婦女部的工作者，並已把四百個婦女組成若干代表團，有定期地聚集。她的夢想——懇切的盼望——是組織一個公共膳堂，但是可惜大多數的婦女還沒達到想接納她這個意思的程度。不過她們已經有一個婦女委會司理普通的衛生事宜，現在她們正討論開辦一個公共的洗衣房。

你別看這個小社會沒到一年的年紀而瞧不起牠，

他們已有一個消費合作社，一個圖書館，一間白晝育嬰房，一間幼稚園，一間藥房和一間製藥所，餘外還有俱樂部。他們和一個鄰近的建築合作社共同的開辦了一間學校。所有及入學年齡的孩童全都進這個學校，並且有八十五個成人——由二十歲至五十歲——也初學認字書寫。

我在伊凡諾夫，佛茨尼仙斯克所參觀的工人村，更形講究。在這一個地方有許多織工廠的工人住在本處的城裏，還有許多則由城外的各地每天早晨往城裏來。那些住得太遠，不好每天來回走的，却常租用人家的地板做床鋪。從前早就有這個辦法，舊時當房屋最貴而且人多得死的時候，他們還要更換着睡呢！可不是，現在他們也還有這樣的。在伊凡諾夫，佛茨尼仙斯克的工人村的運動非常強烈。一天的黃昏我和委拉，亞歷，耶發驅車同到這個地方參觀。這一個村子真是華麗，比我在別處見過的好個多倍。房屋面積也更大些，是三層樓的，每座有六個至八個的房所，下面全是石磚砌成，上面則塗石灰。房屋築的樣子也互不相同，一間

間都非常雅觀，相隔處也有頂多的地方。真是完全不像那些一排排的死板板的房子。屋裏面也極寬闊，每所都有電燈，新式的爐子和廁所。實際上，每個工人的費用和那在羅斯托甫工人村的一樣，不過所不同的是：牠的開辦的費用比後者的少，所以他們可以早些付完這一筆債。那末，這些工人不久便可少了付債的負擔，除去每月小小地有點公共事業的費，就沒有什麼費用了。織工廠很賣力氣地幫助工人的建築事業。現在，在事實上，工業方面已能獲得戰前的出產的百分之百，所以牠們對於這一層準能給工人相當的幫助。這一個工人村已經起了一個公共洗衣房，而且牠還是第一座樓房起成的呢！現在就要使用了。他們又有一間特立的學校，把這四百學生分成兩大班，時候不一樣，使能替換着用這些講室。還有一間光明的大樓房，預備做白晝育嬰房。工人們全自己已有廚房的，但是也有許多人共同連合組成一個公共的膳堂，關於這件事情他們已有許多的談論和振作。

因為方法與信用的缺少，直等到一九二五年這些

建築合作社才開始承辦大規模的新樓房的建築，並且在本年全俄的新築的房屋之百分之二十五是由合作社經辦的。一九二五年十月的初一日，總計已有一，〇六五個這種的聯合機關，二〇〇，〇〇〇個社員，資本金共四，六〇〇，〇〇〇盧布，此外還有借債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他們約築了三，〇〇〇座房子，包含九，三五〇個房所，居住四〇，〇〇〇人民。在這些社員之中，工業工人約佔百分之七十五。多數的建築合作社產生於工業興盛的地方，與其說是在工廠林立的城市，不如說在大的城市。有一件事實很有趣的，便是：差不多他們全都打算起小座的房子單為一家或幾家人住。他們受政府鼓勵着力謀各種事情的社會化，並且在各方面得到政府的幫助，不過是不用上方的力量壓制他們，一定要怎樣的。剛在去年居處合作社中央協會提起一種專門的教員運動，專釋解組織合作社的方法與牠的形式，並鼓勵各團體竭力地籌劃自己所需的款項。居處合作社中央協會派組織人去鄉下，同時又在莫斯科開一個特別的六月速成班，每一屆的學生——五十個學生



——是由各個合作社派來研究的。課程包括：住所設計問題的講演；住所合作社的法律的與組織的基礎；俄國的經濟地理；對於各地建築的比較，以決定在房屋中的各部的最適宜的材料；鎮的計劃；衛生；花園和青色的草地；水，熱與電的問題；文化的工作與政治經濟。那些學生一起首就須到各處旅行，參觀住所的計劃。每個學生旅行的費用是四百盧布，三百盧布由送他們來的合作社擔負，其餘的一百由居處合作社中央協會擔任。他們還有一個實在的實驗處，那是在莫斯科城外的一個工人村，這裏他們特別地築了四種的房屋，學生們可以去實驗牠們的適宜，由費用，耐久，和暖，衛生和「能住性」等方面着眼。

因居處合作社中央協會的幫助和信用的開得新源，平均每所房的費用業已減至三，〇〇〇盧布。他們還在設法減低費用的數目，因為除了像這很不多得的伊凡諾夫。佛茨尼仙斯克的工業情形可以使工人們經濟方面比較寬鬆些，在別的地方對於那般工資低少的工人們，要支付這一分費用仍屬困難，好像得不到居處

合作社的利益。在普通的情形之下，每月每所房的租金約爲十四盧布，可是對於每月工資六十盧布的人們還是估得太多一點。在莫斯科每個工人居住的房所的價值是由七千盧布至八千盧布，這種房所是三間房子，一個盥洗室和一個廚房，均算起來就是二千盧布一間房子。這個數目就和在美國的這麼一樣的一所房子，也有這樣多的房間（大概房間大一點）——還有一個新式的廚房和完備的浴室的，大概齊，價值相等。

信用的辦法比從前也好得多了。在先前祇能借短時間而且利息很高的，現在他們可以借由二十五年至六十年的長期債，利息低到百分之二或三，款額得在所需的款項的數目的百分九十以上，那末，就是社員只須籌百分之十就夠了。所以，他們可以把租金的交付和清償債務的期間延得很長，使那些工資低的工人也感不到一點痛苦。百分之五十的合作社使用他們自己的社員的勞力去建築，那至少又可以把費用減去百分之十，有些還自造磚瓦呢。那些比尋常工人富足一點的人們，他們有時可以照原來的價值由居處合作社即刻買一所

房子自己用的。

雖然在一方，居處合作社爲住所設計的情形上，佔得頗形重要的地位，但大約工人住所的四分之三還是由其他組織建築的。按照人民勞働委員斯密特 (Schmidt) 所統計的報告：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在蘇聯爲工人住所用的經費爲一二六,八〇〇,〇〇〇盧布；由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是二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並爲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的經費預作爲三四二,五〇〇,〇〇〇盧布。這一筆款打算是這樣籌取：百分之四十五由於中央公共銀行的信用；百分之二十二由政府預算提出；百分之十由「增進生活情形的經費」，並百分之二十三由合作社的經費抽出。雖然經費增多，可是因爲建築材料的價格增得更快，所以現在倒沒有從前那麼多的人得着住所了，並且在一九二五年建築運動所定的每人應有一一。四正方「阿爾山」地位的，也不得不稍把標準降低，大概非等到一九三一年不能真正地平均分配給每人一個滿意的地位。在一九二三年在蘇聯的所有的工業大城當中，住所地位缺少是四,七〇

○,○,○,○ 正方「阿爾山」,按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計算,這數目爲六,六○,○,○,○ 正方「阿爾山」,因爲從那年之後增多了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口,而住所的地位祇增了百分之六啊!

關於住所的問題,我特別注意在合作社一方的工作上,因爲牠們對於社會組織的問題有特別的重勢。對於那般與工廠完全無關或別的企業無關的婦女,這些居處合作社又擔任教導婦女的職務。他們特設一文化部委任一位婦女做部長。這位部長便是奧斯特洛夫斯卡雅(Ostrovskaya)同志,她是一個革命家曾經多年的徒流和祕密的工作的。她完全努力於計劃一些住所的樣子和內部,要這些住所能把婦女的家政的辛苦減至最低度的爲最適宜。她告訴我,他們都贊成那種爲幾家人住的簡單房子,最要緊每家有自己的廚房,因爲這是多數婦女認爲不可缺的東西——但是這些廚房要起得這樣:等以後公共的膳堂組成了,這廚房可以改作別用的。她又告訴我:現在也還有一般同志堅持實行更公共化的生活形式,但是較明白的人們以爲這是要一步

一步前進的，他們應當保留一部分的地位和自由給個人的所嗜發展。

「而且我們也不願意我們的工人住所像你們貴國的樣子，房子全是千篇一律地像豌豆在殼裏——或是說像監牢獄——你們動一動機關，突然由牆中出來一架床，等一等再動一動，廚房整個的在你面前。我們歡喜你們的便當和你們的儉省人力的方法——但是我們要在我們的住處得到相當的快樂和美感，不祇是機器式的，不顧別的——我們想建設真的「花園城市呀」！

奧氏也極關心於佈置房屋的內部。居處合作社中央協會派了一位專員調查英國的，德國的和奧國的工人住所的情形，他帶了許多許多俄國從來沒見過的簡單安逸的設置的相片回來。他們勸那些家具製造工廠加入製造工人家中最適宜的與最美術的陳設的大比賽，至終在去年夏天展覽了。此外，又有許多文章描寫一些熟識的省力而衛生的方法，例如汽爐，洗碟器，以及各種的新式用具——全是些普通的東西，但是俄國的主婦所未會聽過的，和一些較繁雜的計策，只有紐約

城的房所住者懂得的。奧同志又覺得工人的鄙吝的無味，這些新搬到新屋子的工人還捨不得把一些舊東西丟掉——甚麼的粗毛絨的睡榻和滿了祖傳的蟲子的笨重的衣服。她常常宣傳簡單佈置的好處，而且她也得到些效果。

這些合作社爲開導和扶助那些在家的婦女，並使她們對於集合有興趣，有了解，第一步牠們先由最簡易的法子入手。他們給與那般入社的主婦數種特牠的利益，例如：准許她們付債按照分期交還方法。當他們爲婦女召集會，他們很明白地不提出甚麼政治問題，因爲這些只會使她們感覺得無味；他們一開始先講些最關切家庭的瑣事。就像前章說過的，他們由兒童方面入手，因爲他們也都相信兒童的撫養是在社會化的方法中，社會的第一件職責。他們又幫她們組織母親和嬰兒的詢問處，白晝育嬰房和幼稚園。過過就臨到關於集合的購買與洗衣，縫紉和修補的班課，家政和飲食衛生的，討論會。所有這些事務概由各個合作社選舉的「文化委員會」擔任。此外的委會，裏面差不多有三個至五個委

員的則有如關於政治的，教育的，和衛生的幾種。這些委會的主席委員在合作社的管轄部分裏的一個職員的領導之下組成一種名為「合作社教育委員會」的機關。在文化的與衛生的委會裏，他們都企望委員中至少一半是婦女。衛生委員會是在衛生部指導之下，實行教育的工作，並檢驗廁所，廚房等處及提倡反對病症的運動，組織各種講演，柔輦體操，暑天休息住處等等。等到逐漸把婦女的興趣與活動力吸引到這幾方面，他們再吸引她們的興趣到文化工作與社會的活動上。在這些小社會裏慢慢地可以看見團體對於集合的活動的興趣的發達，有時竟把人對家的興趣都給蓋過。家庭還是菓子的核仁，但是個人的忠誠敬愛已然轉到較大的團體上面了。

住所的恐慌——建築的費用——花園式的城市。這幾個僅僅的字很熟識。我們在別處也何嘗不聽見這種的聲音。那末，在俄國又有什麼特別？不同？總共我們可以得到三個答案，每一個對於家庭和牠的連累的各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上，都有重要的意義。第一，物質上

的過於逼擠，把在家裏的快樂或安適的可能性完全消滅；這結果的刺激和神經的痛苦使無論家庭中的任何人能夠脫離尋求外方的他種滿足方法；祇加多幾方碼的地板的地位無非是緩和這個問題的一部分的和表面上的方法。第二，蘇維埃政府的一種自覺的政策，那便是把個人的利益代以集合的利益，並用下列的兩個方法以鼓勵對於集合單位的熱心：（一）發揚各種的團體的能力與娛樂，（二）實地地把一些從前屬於個人的功用的事務轉移到團體身上。第三和最末，努力地去尋找能合乎這個未完的過渡時代所需的一架轉運車，這架轉運車的本身須是為將來的更理想的形式的準備，而當新的形式臨到，牠又須不費事的變柔一點改用那些新方式，同時牠又祇需最少的破壞的才是合格。





## 第十章

### 母親和嬰孩

在蘇俄，對於婦女和兒童雖然沒有全國劃一的辦法，也沒有建立拍拉圖共和國 (Plato's Republic) 的共同扶養兒童的學說，不過我們應當認楚清，蘇維埃國家對於兒童所負的責任的程度比世界上的任何一國對於她的兒童所負的責任却為重大。兒童的物質上的供給概由社會保險法定出一定的範圍，並兒童的訓練可由白晝育嬰房與學校擔任。所計劃的訓練兒童的整個制度，不

祇賜與兒童本身更豐滿，更健全的生活，而且將母親由看護兒童的細綁解放出來，俾得參加社會家庭的許多活動上。

以下的幾段話是一九一九年列寧對一次婦工集會所說的話：

「婦女在家庭的地位還沒明白地決定。爲達到婦女的十足的解放，並保證她們和男子佔得真正的平等地位的目的起見，家中的一些功用有社會化的必要，而且婦女務須參與普通的生產勞動。

「我們刻下所討論的問題，自然不是祇限於婦女在勞動的生產，長度，量數和勞動的情形這幾方面的地位得以平等，乃是還要進一步保證婦女不爲家內的地位所奴隸，那就是單單男子所沒有的家務的纏累。你們須知道，雖然婦女得到充足的平等權利，她們實在還是受特殊的壓迫，因爲在她們的肩上重重地負着家務的擔子。在多數的家庭中的工作都是最易使人昏愚的，牠們也就是婦女的最艱難的工作。這種的工作是完全不關緊要的，作了之後沒有一方能幫助婦女的發達。

「依照一個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們要竭力爲社會主義的整個的實現奮鬥；在這裏一個大的工作戰鬥場向婦女們開放着。我們現在正爲這個社會主義的建造劉重地準備收拾場所，並且我們敢預斷，就是非要等婦女的真平等得到了手而且她們業已免除細小的，討厭的和無關緊要的辛苦的束縛來同男子攜手努力於新工作上，不會有確實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的建設的。這一件事就要讓我們忙個許多時候。一時我們決不會有忽然的結果或有力的影響。……」

兒童的看護，食物的預備，洗衣房和其他的各種家務事項——這些全是在解除婦女的家累的方式中所要考慮的幾個問題，在這幾個問題裏，兒童的撫育又佔首位。

在俄國，母親和嬰兒的工作全是集中於人民衛生委員會附設的「母嬰部」在雷比德發 (Lebedeva) 大醫士宰治之下。差不多到過俄國領略過這一部的工作的，沒有幾個能不貢獻一番讚美的，那末牠的成績怎樣可想而知了。

但是我們願意舉幾件事實。最可驚人的，是牠在河邊所辦的「母親大宮殿」，裏面設有：關於所有影響於母親與兒童的健全和福利的問題的科學的研究與臨診教授的工作；抵禦病症和死亡的計劃；訓練醫生，產婆，和看護的課程；模範的設立——最末地，麗華的展覽。在這裏有許多圖表和圖解指明在俄國的嬰兒死亡率與別國的比較，指明俄國在這一方面的特高。也有述說嬰兒死亡的理由的文字與圖畫張貼着，還連帶禦防的方法。他們又用模型去指示嬰兒成形的發達步驟，生育的程序，平常兒童的生長，病症與失常的原因與效果。常常都有人把工廠的和鄉村的婦女領進去見識見識。

俄國的最優等的美術家們：為這次的展覽作了許多美術的油畫。在這裏滿挂着送到全俄各方的張貼字畫的原作。有一張是用意於鄉村的，畫着一大串的母親和她們的嬰兒們在一個「母嬰詢問處」的等候室等着。對面儘是些小十字架子，牠的題語是：「當這些詢問處滿了，塚地可以空了。」又有一張表示：一個精神的農婦，一臂上抱着一個強健的孩提，一隻手拿着一本書——

—「母親趁有學識，孩兒越強健。」這樣的一個標語。還有一個打扮得很漂亮的農婦，她的腹部已是像個小山坡了，還擔負重量的柴束，另一張畫她在拋擲乾草，但是在畫兒的下部又畫着她的丈夫在很溫和地看護那同樣有孕的牛馬呢！其餘的描寫母親應食與不應食的食物，她應飼嬰兒的與不應飼他們的食物——指示害蟲，蒼蠅，灰塵，不衛生的環境等的危險，解釋為甚麼嬰兒不當遍體都是傷痕像個乾屍，並那不良的鄉下習慣把嬰兒的兩臂細在兩旁。各處都觸見讓母親自乳嬰兒的宣傳品。其中最出名的是一張畫着一隻小牛表示責罵地看着一個喝着牛奶的嬰兒的圖畫，小牛問着小孩兒「為甚麼你喝我母親的奶？」關於這個還有一張：一大羣的嬰兒在作示威運動，一個嬰兒指手畫腳地在演講，他們都為本身的權利出來運動，舉着旗幟要求：「抵禦蒼蠅！」，「乾的清潔的尿布！」，「我們母親的奶！」，「新鮮空氣與好光線！」，「產婆，不是「巴不卡」！」（見第一章註四），「健全的父母！」。

參觀的客人們看完這些之後，便到白晝育嬰房，看

看他們的一粒塵都沒有的潔淨樣子，看看他們的新式的設備，看看他們的科學方法的飼育。他們再參觀這許多詢問處，奶房，棄兒院，模範的產婦院。當那些母親在裏面的時候，這產婦院又可以當做她們的學校。這些參觀的外客實在被這些設施所感化，不得不信蘇俄對於母親和嬰兒的設計超過世界任何國家的情形。但是可惜，他們最後的結論又幾幾乎全是這樣：這許多計劃全是表面的，而且在莫斯科的這許多設施也祇是裝扮出來刺激外來的參觀者的誇示的地方，或者如果給他們一個好聽的評論：這些是在遠隔的將來，他們想着或者可以成功的一種幻像的希望罷了。

他們的計劃超過他們實踐的能力，是無可疑義的。缺乏款項一條就能阻止許多事情的實現。在小城市裏的一些兒童的設施有時竟是莫斯科的模型的一種很可惡的滑稽的變像。還有些村莊恐怕連母嬰部這個名字尙未聽見過呢！

但是我曾到莫斯科之東的伊凡諾夫。佛茨尼仙斯克，在那裏我參觀過一間白晝育嬰房，牠比我在莫斯科

所見的更好更完備。南面在端河岸上的羅斯托甫我也見過一些同樣好的，再南到皮阿提哥爾斯克 (Piatigorsk)——俗稱五山城——上面有厄爾布魯斯山 (Mt. Elbruz) 常年積雪的，也有。我從前已經親眼見過四年前「圭克兒教徒」們 (Quakers) 幫助開辦的村白晝育嬰房的起始，現在有人告訴我，在烏克蘭這種的工作比大俄還發達呢！我又看見這中心的計劃怎樣地伸廣出去，一直到一千「維爾賽特」外的馬斯羅甫，庫特還有這種的設施啊！

十一月，我在莫斯科聽見雷比德發怎樣地報告與農工婦女部的會議，她說：對於擴充村莊中的白晝育嬰房的工作，應取急進的方法。她又說：在工廠和工業的中心地方，雖然在這一方面仍是距滿意甚遠，但牠們總算長進着，不像在鄉村，農婦仍舊把嬰兒帶到田裏去，或是把嬰兒交託與家裏的一位小妹妹。

十二月在馬斯羅甫。庫特，我也看見由中央送來的訓令，因雷大夫的請求，牠已是有效了。阿基遮斯科葉 (Archangelskoye) 的農工婦女部組織人撒拍廷那有

一天帶着計劃來到這裏想開辦一個夏日白晝育嬰房。去年她果然在本縣開辦了第一間，今年她還打算開兩間。預備在阿契波夫卡(Archipovka)小村辦的一間已經籌得經費。馬斯羅甫。庫特的農民是又窮又落後，他們實在不會自動地做點事情。但是政府田地的工人們大都精神煥發不像村裏的貧農，他們在和田地的管理機關定立集合的贊同內已包含一條，就是：每年須保存一筆款項爲建設一間白晝育嬰房之用的條件。後來由這裏也收集到幾百的盧布。村的合作社與互助委會各擔保一百盧布。美國兒童委員會的代表對撒拍廷那已承認給這個機關準備所需的器具。所以只要再籌一小筆的錢就能保險在這夏天把這白晝育嬰房辦妥了的。

當村莊的婦女集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這裏產生很大的騷擾。有三個像頂富足的老農婦坐在會場一角的，圍着大毛衣，不停地對各件事情總是搖頭。

「我們並沒用白晝育嬰房養大我們的孩子呀！爲甚麼現在做母親的就不能照舊？」一個說。



「這不過是讓我們賦稅的一個方法就是了——她們裝樣子把嬰兒們送到那裏撫養，好收稅！」別的一位給這一點警告。

「大概她們還得把頸上的十字架取下來呢！那些不敬上帝的——你看罷！」第三個說。

看起來差不多所有年幾較老的婦女都反對白晝育嬰房的提議，年幾輕的則極力贊成，會中有一個女人名叫馬路撒，她是一個軍人的寡婦。她有一次把她的小兒子留在家裏和他的小堂弟兄們玩，自己却出去辦點事，不知怎地這個小孩淹死了。所以她老是忘不了，她這一次自然也發言贊成。

「說白晝育嬰房不能給我們的兒童良美適當的撫育，是不實在的。我親眼還見過一間，在別的村裏，小孩子餵得又肥又胖的，而且又乾淨——」

「是的，」坐在角邊的一位插嘴說，「你說對啦，可不是那樣！我聽說她們每天給小嬰兒洗澡——她們這樣待遇這般嬰兒，叫他們將來怎麼會強壯呢？」

「不要緊的，」馬路撒又接着說，「那總比我的兒子

發士亞所遭遇的好得多了——或是比比那在尼那的嬰兒看，祖母沒小心，他自己爬出來，查覺的時候，已被老豬嚼去一半了。我們自己就算沒有孩子，我們也應當竭力幫助別人的。婦女生育一個小孩子不是容易事呀——設若輸了死去，我們所忍受的痛苦有甚麼代價——有甚麼用處？」

在場角又一陣的喃喃怨聲。

「你別看錯了，要是你的發士亞確是溺死的，那是上帝的旨意啊！對於這一層你怎樣也是不能抵抗的。馬路撒！你不必難過。或者這樣更好。現在你的兒子在天上與衆神一起——你還有甚麼悲痛的！？」

年輕的佔大多數，便把這件議案通過了。他們贊同親身到全村勸說再籌一點不足的款項。三月八日他們公布這所白晝育嬰房到五月十五日便可以開幕了。

由政府田地派來的幾個木匠便把一間正空着的小民房刮刮磨磨，洗洗乾淨，油上白漆，又做些小兒臥床，棹子和椅子。美麗的字畫釘滿幾面牆壁，縹緞的帳幔挂着，窗台上擺着花兒。許多農人看着這些佈置——張着

大嘴的呆看。

「我的上帝呵！」聽見一個人這樣地呼喊，「花了這麼許多錢——做了這麼許多事——輸了全是爲小孩子——可惜！可惜！」

又一位——「拿穩地，這般潔清的地方，他們決不許小孩子進去。」

起初報名的人甚少，而且很慢地。有一個婦人，人家問她爲甚麼不把她的嬰兒送到白晝育嬰房，她却這樣回答道：「我用得着嗎？我有一個小看護在家呢。」她說「小看護」是指一個七八歲的女兒一步不離地帶着嬰兒的意思。但是到後來，報名的比牠所能容的還多了。

管理這所白晝育嬰房的是由城裏新來的一位育嬰房學校專家，名字是力得亞密克黑羅夫那，(Lydia Mikhailovua)本村又另派三個女人去學習，說是助手。就中的一位助手老薩士卡(Sascha)腦筋腐敗，滿不懂爲甚麼要清潔。當密氏告訴她：小孩們應當擺在沙房裏，不宜到田莊上的醜陋的地方，或是讓她把那些髒的衣服換換，她總反對——「在家裏他們還和豬玩，甚至

於和豬一起睡呢——大驚小怪作甚麼？」

雖然庫馬河的泥水離此較近，但她們還時時預備着一櫃井的清水在手旁的。當密氏叫薩士卡把洗用過的髒水由管放去，再放入清水的時候，薩士卡便扭擦她的手，說道：「唉！爲小孩兒用這樣潔淨的水，真是一件羞恥呀——你要讓我一盆洗幾個嬰兒，倒還不至於太耗費！」切實地，誰要想想農人家裏所用的一滴水都是由婦女背上負來的，他就很容易明白這種儉省的觀念了。

密氏預備一些乾淨的白方巾專爲嬰兒擦鼻涕的。但是密氏每次轉過身去，她的薩助手準不捨得用這些白手巾，換過來用自己的污穢的汗衫去擦小兒的醜醜的小臉兒。要是密氏說她不應當這樣，她便求說：「可是，密克黑羅夫那啊！他們的鼻子太髒了——這些手巾又這樣乾淨！」

上面所說的一段事情只是表明中央的奢望的計劃也漸能達到鄉村的事實的特別舉出來的一個比方罷了。前幾年在鄉村地方連一間白晝育嬰房也沒有。現在情形改變得多了。在城鎮的許多常年關着的白晝育嬰

房之外，在鄉下更有四千以上的夏日白晝育嬰房。牠們發展的程度不等。我敢斷說，有些還是不合衛生，但是我也敢斷說，比起平均的農民家庭，總算有些進步。衛生部的訓令頗形明晰，並且他們把標準提得很高。雖然是現在所由育嬰房撫養的農兒祇不過是一小部分，但是牠們代表一個好的起始，則是無可諱言的了。

關於這一方面的工作的進步，的確甚為可觀。我還記得在饑荒期間所見的一些蕭條的嬰兒院，滿着小黃鬼似的嬰兒們，他們的小手兒甚麼也沒有在悚動着不甯——許多茅舍，滿着小屍體，因為嬰兒死得比埋屍的人們掘塚快。不過這祇是在饑荒暫時的一種景況，而且這實在已是不易，這是勇敢的力量得到的效果了。那個時候醫生們與看護們自己已是餓得難過，但是他們還肯在這非常難堪的倒運情況中，救活了幾千的孩童。但是現在，在我參觀過數十間白晝育嬰房之後（其中多在城中），我所得的印像又是：寬大的光亮的房屋——一行行的小臥榻鋪着雪白的被單，一間間的遊戲室設着滑板，水槽和可以操練兒童四肢的滑板木階，五彩畫的

大方木塊，牆上釘着好多圖畫。一清早，母親們到工廠的時候，便順便把她們的嬰兒抱出來送到白晝育嬰房。到了這裏，嬰兒在家穿的衣裳全脫下來收在一個布袋裏，然後就給他們洗身；洗完再給換上乾淨的衣裳。他們睡眠，吃東西，遊戲都有規定的時候。在這一天內，母親們可以來餵她們的孩兒三次。沒有人來餵的，這裏有一個衛生的廚房給他們預備食物。還有一位飲食專家在管理他們所應食的食物，以他們年齡的大小以爲食物的類別。等到下午，母親們又來把她們的孩兒帶回家去，孩兒們澡也洗過了，餵飽了，真是滿足了。因爲科學與經驗指示我們這樣：就是最衛生最完備的環境和科學的看護也不一定能給與兒童智慧的初步啓發像他在家庭環境中所受的不同的刺激的那般的繁多，所以他們盡量地加增環境上的各種色彩。在城鎮的多數的白晝育嬰房要算組織得良善，設備得完全。但是在這般應受牠們扶助的母親之中，差不多才有四分之一確來享受這種福利的。不過我們看見這個數目仍在長進着。

我們要想切實地明瞭對於保護母嬰現在已成的事

業，還須注意小小的一段歷史。我們先要知道由舊制傳下來的兒童設施是非常的少。到了加倫斯基的時代則又把保護婦女的一點守中的俄皇的法律也給廢掉，這臨時政府未曾對於救濟婦女勞動的情形上採取過一個實在的方法，也未曾組織過一個機關帮着解決這個問題。

在蘇維埃政府成立的第一個星期內，這代表五萬婦女的第一次勞動婦女會議已集於彼得格勒，討論產婦的資助問題。這次會議的基礎就是科倫泰主張的擴充政府對於母嬰保護的範圍的一個提議，但是勞動婦女們又自己加了許多條件，她們的意見直接影響後來通過的那些社會保險法呢！蘇維埃政府充分地明白保持一個平常的生育率，保證一個健強的新世代，和婦女自身保衛她們的精神力量爲着社會有用的工作的需要，牠又承認母職是社會的職守與責任。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所頒布的「疾病保險」的法令就是後來爲保護婦女所制定的更廣括的更詳細的立法的根據。這一條法律興出一筆的保險經費不用由工人的工資內扣

除，並且這法律施及於在蘇維埃地域的一切被僱的工人，不論是何性別，人種，國籍，或是工作的性質和長短等等；後來把牠更擴充一下，牠更施及於所有用自己的力量工作而不壓制他人的人們。牠也沿用於工人的妻子，以及所有確在受傭於工業的婦女們。

所有關乎母道的保護和保證的計劃，均由以下兩機關擔任執行：（一）科倫泰治下的人民公益委員會（或稱作人民社會保險委員會）與（二）人民勞動委員會。前者專重於組織所需要的設施，和對於勞働婦女給與物質上的扶助使她們的母職的擔負因而減輕的工作上；後者則專為介紹工作準則與勞働保護的一些法律，這些在前面的一章裏已然略略述過了。一九一八年一月，這稱為「保護母嬰部」的——就是母嬰部——已正式的成立，所以一切保護母道的組織全屬本部的管理之下。同時這新設部中又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牠的職務是：

「（一）顧惜母親所以愛護兒童——嬰兒最適宜的「乳滴」是由母親的胸部所得。



(二)訓練兒童於廣闊的見解空氣中，使他適合為社會主義的家庭的一份子。

(三)為兒童創始那些能產生強健的智力的和體力的發達與對於人生的樂觀態度的條件。」

這新設部的領袖是雷比德發醫士。這個母嬰部有三遷的歷史，先是附屬於人民公益委員會，後來又移至人民勞働委員會之下，最後又改為衛生部的一部分。牠終於附入衛生部的原因是：這一部所注意的祇是三歲以下的嬰兒，所以重勢是在衛生的而不在社會的，雖然在人民勞働委會和本部之間仍有密切關係的存在。

一九二二年以前，這新設部設立的機關之數目經常不斷地增加到一九二二年這一條機關數目的曲線忽然地猛進，因為在本年饑荒發生；次年這條線又忽然地落下，因為國情的危急中央政府不得不撤銷牠對於這一方工作的擔負，於是就變成政府組織地方經營的形式了。

政府的原意本是國家完全擔負以下的兩種設施的責任：(一)在母親們作工時間內，所應有的看養兒童的

一般設施；(二)給與指導與醫藥幫助的一般設施。但是後來因情形的忽變，政府無能爲力了。可是那般當道者們決定在這方的進行工作不應稍見滯怠，他們竭力地在各方設法籌得經費使工作不停地繼續。母嬰部的廣佈的宣傳也得到相當的效力。好些工廠，店舖，衛生部，合作社，互助社，居處合作社，地方政府委員會，農工婦女部——差不多各機關的人們都與以助力。一九二六年爲村的白晝育嬰房費用的一，三〇〇，〇〇〇盧布之中，有一半是村組織們與農家自己所捐助的。其餘的一半則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雙方撥給。到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常久機關的總數(自然夏日白晝育嬰房在外)已實際地趕上在一九二二年的最高數目，並且自本年以往，仍是常度地增進。設若把夏日白晝育嬰房也括在一起計算，那就超逾先前多多了。

由下面的統計表(參閱第二十一頁)，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增加之處完全在爲「短時間」(註一)的一種設施方面，那種爲「長期」的設施業已逐漸減少；(二)詢問處的猛烈的添設。自一九二二年以來，健全兒

童的詢問處的數目比任何種設施都增加得多，並在近幾年來，又添設許多村詢問處，法律詢問處，和貧母院等的組織。

雖然在一方有許多共產黨員以為兒童的撫育應該完全社會化，而他方又以革命初期人民的極貧的景况已使大批的長期的設施的組織為必需，但是在這種事實和聲浪之中，我們仍聽得反方的宣傳。雷比德發是一位久有名望的共產黨員，我們總該以為她一定贊成兒童的撫育採完全社會化制度，但是她却正不是我們所料及的。一九二〇年她在討論母嬰福利的會議裏堅持地贊成那種能保存母嬰間最密切的關係的機關。關於嬰兒撫養院，她說：

「本部固然是承認孤棄兒童的撫育為必需的事情，但我們仍視這種的機關為最不合適，因為使嬰兒能離開母親的胸懷就難免嬰兒死亡率的增高。但是無論如何，當我們仍在過渡時代之中，棄兒的問題還未根本解決之前，我們還須繼續辦理這種的機關的。不過我們又有一件事實應該注意，就是：在專為短時間的一種設施

發達的地方，棄兒的數目也因之大減。」

在發現嬰兒在育兒院裏不斷地死亡以後，這個母嬰部便議決「把他們開墾出去」到私人的家庭裏。一九二四年他們戮力於勸說莫斯科蘇維埃讓後者保證送出並交託二百孤棄嬰兒於經謹慎選擇的私人家庭而付以嬰兒撫育的酬報，同時政府又常可調查他們在那裏的情形。黨的各組織起初以為這是退化的辦法予以極端反對，但是後來發現在這新制的辦法之下，的確地棄兒們死亡的率度果然減去一半，這種的事實又使黨的各組織不能不屈服了。自此以後，這個方法在許多地方沿用。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雷氏答我說：

「如果我們有較好的用具，較有訓練的人材在我們這些設施裏面，話就不同了。但是在現況之下，家庭對於嬰兒的發育較之撫養院給與更多的刺激的環境，這是無可疑義的。按這個新方法我們不特能減低嬰兒的死亡率，而且我們倒反能保證更大部分的嬰兒，能依常軌地發育。因為差不多十之八九我們由撫養院訓練出來的嬰兒們都是體智兩方頗形落後的。」

## 保護母嬰的設立一覽表

在R.S.F.S.R.

在U.S.S.R.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工廠的和縣立的 白晝育嬰房.....	14	78	126	565	668	914	447	503	536	603	631	739
永久的鄉村白晝 育嬰房.....	—	—	—	—	—	—	—	—	—	—	7	7
母嬰撫養院.....	0	10	17	99	125	237	110	91	80	94	106	104
育嬰院.....	7	92	21	370	418	765	491	362	313	287	245	439
貧婦勞働院.....	—	—	—	—	—	—	—	—	—	9	11	9
兒童詢問處.....	6	39	58	133	161	179	137	165	262	390	447	585
孕婦詢問處.....	—	—	—	—	—	—	29	28	95	169	199	270
法律詢問處.....	—	—	—	—	—	—	—	30	130	128	128	140
鄉村詢問處.....	—	—	—	—	—	—	—	7	117	122	268	317
總數.....	27	219	322	1,167	1,372	2,124	1,213	1,253	1,607	1,839	2,113	2,622

此外，夏日白晝育嬰房的數目有如下：

在R.S.F.S.R.——1921——

在烏克蘭——46

在U.S.S.R.——46

1922 —— 125

——123

——248

1923 —— 209

——266

——478

1924 —— 524

——426

——950

1125 —— 1,853

——738

——2,614

1926 —— 2,919

——873

——3,968

此  
页  
空  
白

雷氏又告訴我：自內爭時期以還，棄兒的數目減了許多。單說莫斯科從前一年就有二萬棄兒的產生，現在却遍蘇聯也不過這個數目。

我對於他們那些理論和事實的矛盾不無一點懷疑，一方面常常有共產黨的黨員們和農工婦女部的組織人們給我詳述他們將來要建設許多美滿的各種兒嬰撫養院，到那個時候，如何把兒童完全由他們的母親們完全地拿過來的一套話，他方又有這母嬰部似有背於前說的實在的計劃。我對於這一層實在有點不明真像，所以趁這個機會問了雷大夫國家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到底是採那一個政策。

「蘇維埃政府，」她解釋着，「自認看顧母親的和各級年齡的兒童的身體健全與少年人的社會訓練為本身的責任。這些事情是由兩個政府機關擔負，牠們便是：衛生部與教育部。但是他們認為最佔前提的還是健全的維持，如果至不得已時，社會訓練的原則，也要為前者犧牲。目下集合教育的原則祇能沿用一部分，原因可以分為三層說：（一）經費的缺乏，（二）社會訓練的方法

還沒有相當地計劃出來，和(三)民衆的行爲與心理仍不夠集合訓練的資格。我們現在用的方法是那些實際上有益於兒童的，我們將來也是這樣。」

雷大夫深信詢問處的發達是她的一部裏的最緊要的事務中的一件。

舊俄所遺下的幾間詢問處是專爲嬰兒的，牠們並不包括懷孕時期的看護。牠們對於家庭並不扶助一點，也不執行一點教育的工作。但是現在的詢問處大與先前不同了，牠們是非常地發達就和在德美的最好的模範機關比較也不分上下。那些最講究的，有牠們自己的乳場的設備做那些需要補充養育的供給。牠們看護產婦和嬰兒的時期很長——自懷胎以後的三年中。牠們有公開演講，圖書室和展覽會。有幾處設施是由特別團體加力專心的工作，他們還作許多調查以爲禦防工作的初步和美國的社會機關的按件調查的工作(Dase work)相合符節。婦女的代表以她們的熟練的社會工人的資格與前述的團體合作。按照原則上「巡遊看護」的主義已爲俄國所接納，但是要牠達到在美國的這種工作



的程度，時還太早罷！我們也許要很奇怪俄國也漸漸明瞭「社會工人」是她的計劃的實現的一大要件。衛生部部長塞馬時科 (Semcshko) 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說裏給社會衛生學一個定義，那便是：「那些對於健全有損害的影響的社會原素的研究，和消滅他們的方法。」並舉明社會衛生學濫始於一九二二年各醫科大學裏。他又說：在俄國，貧窮就是消滅一切有害的社會原素的唯一障礙物，並就事實而言，他們的醫生全變成社會工人了。

在鄉下，詢問處的目的是使牠們成爲社會的中心，在給與婦女養育嬰兒的指導之外，更助以關於他項事體的勸告，教以衛生的原理等等。在鄉下，婦女的代表們也常訪問人民的家，她們代替「巡遊看護」的職務，從事於使母親們和詢問處互通聲氣。在獨立的詢問處還未組織的地方，村的醫院或藥房常常可以定出某日或某幾日讓母親們把她們的嬰兒送去查驗。村的醫生當中，許多是婦女，他們對於工作的這一方貢獻許多，時常規定特別的時間自動地努力於工作的進展。不過，使

醫生們或看護們到鄉間服務去仍屬極難的事體，並且雖當醫界有失業的現象，而許多鄉村中仍忍受缺乏醫助的痛苦。

我們看着社會保險的法律總算得廣寬了，但是牠們只還限於工業的，公職員的和專業的工人，與農業勞動者們。對於農婦仍舊沒有保險。但是所應明瞭的是：蘇維埃政府並不以這現存的社會保險法為最後的形式，而且她目下還不能更進一步。雖是這樣，母嬰部現在已開始企圖彌補這個裂口以添設鄉間「互相保險機關」的組織，牠的辦法是農婦各人依照年齡與生養兒童的可能性之程度，祇要交納一筆小費，便能得到生育扶助的保證了。不過這個運動沒見着多少成效。還是該部統治下的「社會扶助理事會」的組織散佈得較為廣遠。牠們的工作是籌款扶助無依無靠的又無規定的保險形式料理的，母親們。

這生命統計表要算是所有的表記中最好的一個了。雖則俄國的統計表是最不可靠的，我們這一次可還有充足的理由去深信這件披露的陳述，就是：自從革

命以後嬰兒的死亡率差不多去一半，至少在大城市地方是這樣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間，在母嬰部的第三次會議裏密歧勒夫斯啓大夫(Michailovsky)指出以下的理論：依照歷史的背景看，每當戰爭的時候，一定有結婚和生育數目的跌落，和死亡數目的增高。等戰爭一過去，我們很容易發現結婚數目的增多，跟隨着三四年生育率的增高，再過過却又見生育率的跌落了。自世界大戰後，歐洲也曾經過這個循環。但是俄國和各國相反，她的生育率並沒有降下。在一九二〇年俄國結婚的總數二倍於戰前的數目。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數目又跌回戰前的線上，每千人中有八件婚姻，生育的數目則又較戰前為遜。到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間每千人中有十三件婚事，這個均數一直到如今還沒有更改。雖然在離婚法令頒布的幾年這裏有非常之多的離婚案件，因為有許多久耐不和的夫婦乍聽見這告示不敢再失良機地快去離異了，但是現在離婚的數目祇不過是結婚數目的百分之五或六呢！（另有一派人說，百分之十為

最高點)。

戰前歐俄的生育率是每萬人四三八個，在一九二三年這數目降至每萬人四二五個，到一九二五年又增至四三〇個。從一九二五年以後生育率的增高恰和超過戰前的結婚夫婦的實數成爲正比例，同時嬰兒死亡率大減。在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的一千個勞動婦女當中舉行了一個調查測驗，結果是：在一九一七年嬰兒死亡率爲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二五年減低到百分之十七。雖然關於這一節全俄沒有確實的統計，但是由全俄各方調查的結果也和上面所給的數目相仿。在戰前的時候（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歐俄人口的自然增加是每萬人一六五個，到一九二五年則又增至每萬人二〇一。按密大夫說，這種生育率的增高和死亡率的降低是在戰爭時，沒有別國有這樣的現象的。

我們知道節制生育與墮胎等問題並不直接歸於母嬰部管理之下，但是該部對於牠們的解決也十分的關心並互有連帶。既然牠們對於母道有密切的關係，在這裏好像也應當把牠們提提。

在俄國墮胎已有法律的規定，時常被人誤解以為牠們是法律鼓勵的。其實正相反，牠們的增加正是醫界和政府各機關的最大的驚慌的原因。現在在我這裏有七本書冊，牠們都是我在莫斯科的幾間書店買來的，並且都是由母嬰部，衛生部或是政府印刷所出版的。牠們不特解明——十分詳細牠解明——關於墮胎的法律和可以施用外科手術的情形，而且牠們又異口同聲地指明假設在最走運的情形之下，也還不免那些傷害的可能性，又紀載因為墮胎而生的死亡與病疾的統計；並促令婦女不要依賴墮胎，除非在極端必要的情形之下，就是因生產這嬰兒，生命以致於危險，或是她或她的丈夫有一種病症對於兒童的健全有害的，或是她的經濟狀況太壞，她簡直撫養不起這個小孩兒才是例外。牠們又極謹慎地解釋：說墮胎所以制定法律的唯一理由是：減少由於不合法的和因無知而釀成的墮胎的死亡與疾病，並為保險最少的冒險之可能。

反對墮胎的宣傳不只限於文字。有一套電影解述牠的傷害的也用作普遍的宣傳；而且給與生育全部程

序的教訓，同時農工婦女部出版刊物並對於那般產婆和其他不合法施行墮胎的人們，舉行「侮慢的試驗」的公開表演。假若發現某個產婆或醫生有違法的行爲，就要讓他或她受法律上的刑罰。在鄰村有一個產婆「坐首監」祇因為她去年所施的一次開割。莫斯科的報紙近來儘登載高特力埃大夫(Gottlieb)的一件案子。這位高大夫是個出名而且大家敬重的大醫生，祇因他治死了一個病人而被人告了。後來發現他爲自己的利益就在家裏用手術而且這次的開割又不在相當的衛生情形之下。原告律師請求法庭罰他最重的刑罰五年有期徒刑並褫奪五年有期的爲醫權。

對於這個問題的查攷最細的首推母嬰部的一位大夫詹斯(Gens)，他在人民的各種團體當中盡力地詳細調查希望得到墮胎的一些主要原因。他告訴我：雖然無可疑義地現在在俄國墮胎的數目比革命前還多，並且牠的數目仍在增加着，但是這增加的速率和數目却不像那般主張節制辦法所給的那樣離奇可怕。我們應當知道從前是沒有登記的，所以現在增加的原因也有一

部分是根據這個事實，就是：他們現在有較好的統計了。合法的墮胎的數目的增加並不能指示墮胎總數的增加，這更是應當明瞭的，因為法律既有規定，就有更多的婦人曉得在必要時是可以施用相當的手術，那末，反過來說就是較少的婦人沿用舊法。這樣一來，「祕密墮胎」的數目每年當然地減少許多。在每年墮胎的確數上雖有小小的增加，但是牠和生育數目的比例所得的百分數實在是減少了。試拿莫斯科做比方罷。牠這裏在一九二五年的統計是每二一，〇〇〇生育當中有七，〇〇〇墮胎之事，一九二六年，每四〇，〇〇〇生育當中一，〇〇〇小產。按詹斯大夫的意見，嬰兒死亡率與棄兒的數目的降低大半也須歸功於墮胎制法的實現。多數的墮胎都在城市地方產生 祇因農婦的無知與許多事情的不便，在鄉村的墮胎數目中差不多百分之五十或六十是不合法的。比較起來，沒有兒女的婦人很少有墮胎的。在城市中，大多數患墮胎的婦女是在二十歲與三十歲的年限裏頭而且只有一個孩子的；在鄉村中，則多在三十歲與四十歲之間而且有三四個孩子的婦人。

撮要而言，在許多調查測驗裏所給的一些理由當中，墮胎的原因佔最多數的，是：物質的缺少或是家庭過大，其次便推醫藥的原因，再次是各種的原由，有些是優生的關係，有時則在未婚的婦女中，她們以感覺這種的生育的可恥而致。對於這最後的原因又有一種現象，就是鄉村這種的事情比城市多，那自然是因為前者的較不開通以致發生這樣的差別了。有幾個把現行婚姻關係的不堅，做墮胎的原由。至於詹大夫的見解却以居所恐慌為釀成若多墮胎發生的主要原由之一，因為許多的投報墮胎的婦女都是至少和三個或三個以上的人同住一間小房子裏的。

這母嬰部以他們的工作大綱的發展和他們的教育工作為抵禦將來有若般多的墮胎的繼續的最好的保證。他們雖尋不到些直接的實際方法去撲滅這件惡事，而且這個問題實在難於解決，不過他們的確設想一種臨時的救濟辦法。一九二五年的十二月雷比德發大夫和詹斯大夫在給母嬰會議的報告書中，兩個人却都主張節制生育的方法的宣傳為壓下墮胎的唯一防禦之



方。

在幾年前我第一次到俄國的時候，關於這個問題我十分地被那表面似為國家的態度所擾——或者我們可以說因國家的態度的不明使我弄得不清不楚。不過的確政府並沒有甚麼壓制。在城裏的橡皮托辣斯(Reznotrest)裏的一些藥房和藥舖，牠們倒頂觸目地設出多種的生育預防方法並贈送指導的書本。不過這那裏能救助村間的人民，就說在城市中那般連牠們的存在也還不知道的或是沒有這許多錢去買所需的東西的，也仍是佔人口當中的大部分。那個時候，我空費了許多時間與力量也找不出國家對於這個問題所取的確實的態度。衛生部的公務員和中央政府都好像不甘表示任何的意見。他們這一種消極的態度一部分也是因為他們對於這個問題自己沒有澈底的明瞭。許多共產黨員，因為西方各國所宣傳的生育節制所表白的文字，多半他們不懂，漸而趨於以生育節制當做是資產階級療治社會病症的萬靈藥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是沒有立足地的。他們解釋這個問題的方法不是讓婦女自己去選擇

是否願意生產一大串的兒女而是由他們的人種限制的自覺上着眼的。

當然共產黨並不在任何方面以食物供給的缺少和富源的缺短為貧窮的原因，牠承認的原因乃是他們的不平的和不公道的分配，與下面的事實，就是：在現時的社會制度之下，這大批的生產全歸到一小部分的人口家裏。人口過剩的問題從未嘗騷擾過俄國。她的固有的富源足以供給人口洪大的增加。我們如果觀查俄國現有的地位，就知道她所以不輕易採用辦法的緣故。俄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共產主義國，四圍全是敵人，她怎麼能不小心採用方針呢？這是沒有甚麼奇怪的，她惟恐人口之不增，若再實行一些節制的方法，則更背道而馳了。還有一層，在對於生育預防方法的學識與實驗方面，俄國又遠不如歐美各國。好多方法別處早已屏棄之於一角的俄國仍在沿用。民衆方面既是這樣的無知，自然許多婦女也因之不能想出什麼好方法以致失望，有滿意的結果的祇居少數，有害的却是平常。所以有許多懷着這樣的意見，就是：沒有一個方法是保險

的，全都是有害。

不久這些反對全依次的消滅了。在現在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和在四年前的大不相同。政府的第一步是始於一九二三年母嬰部的第二次會議裏，牠並沒有這樣地表示允許節制生育，但已公認要組織一個委會，讓這個委員會去調查所有已知的方法，去創作新的，並去舉出提議以備他們的採用。列飛大夫是這個委會中的一位委員並是克盧普卡雅產婦院 (Krupskaya Moternity Home)的總大夫，她發表了一篇謹慎的文字刊成一本小冊子，裏面已經申述委會在調查的一些方法但是沒有作何種明白的舉薦。次年夏天，正當以國家和社會的利益為前提而垢罵生育節制的學說盛行的時候，本部在列甯格勒開的一次會議竟允許經醫生贊同的某幾種方法。在一九二五年母嬰部會議後，國家才開始採取態度，確實的承認生育節制是抵禦墮胎的一個方法並由詢問處傳播生育節制的知識。

這委會仍在工作於尋覓那般能十分可靠的方法。有好些醫生正在試驗給牝獸打針防禦其懷孕，並且他

們這樣的報告大家，就是：照這個方法牠們可以保證六個月至一年的不生產，並有一半可以無論怎樣也不冒以後就不能有子孫的危險。差不多是上年罷，衛生部刊印了幾種政府的論著和文字，詳述一切已知的方法，到現在這類的文章在甚麼地方都可以買到。



[註一]

按所稱「爲短時間的設施」和「爲長期的設施」，原文作 Open institution 和 Closed institution，前者是指那些設施，在那裏兒童得留一天或幾點鐘，不是天天都住在這設施裏受撫育的，或是專給兒童查驗身體或與以治療的機關；至於後者是指那些設施，兒童可常年地或常時間地在住的。詢問處代表前者，育兒院代表後者。

## 第十一章

# 人民的治食工作

假若依照列甯所主張的「每個廚子須學習料理政務，」的話，那末，很明顯地對於他的其他的差事要設法處置才行。你看一個婦人把她所有的精神全副放在烹煮，洗衣，縫補和看護幾個兒童，常常更加上工廠的職業或是公事房的職務，她還有多少力量或是精神剩下去料理政務？在使他們的家庭得着相當住所與設計並兒童的撫育兩大問題解決後，其次的問題便是：把家庭

治食的一事轉移到社會身上。

其實緊跟着革命告終，當貨幣已經廢除，同時人民需要食糧那青黃不接的時候，這「羣衆治食」已是先決問題之中的一個。在那個時候，支配食糧的機關有兩個，一是合作社，一是特組的人民食糧委員會。合作社們組織了許多膳堂，辦的總算廣括，同一時候可以供應三、〇〇〇、〇〇〇人民的飯食。不過牠們的缺點是管理得太壞，後來到內爭時期那食糧恐慌到了非常危險的時候，其中的一部分膳堂又祇得關門了。而且在這個時期的「集合用膳」，許多人混雜着擁擠着吃黑麵包，喝油膩的清湯，那種的情景留下了與人們一種可怕的記憶，真是非多年的宣傳和示衆不能刮除人們對於牠的壞印像啊！

按照一種大綱去組織集合用膳的問題是首次在一九二一年春季的「全俄食糧會議」提出的。這次的會議議決：爲適合一切的新形式，烹煮與膳食均須根據新基重組。那些消費合作社應當縱橫密布地組織公共膳堂於全俄的各部，這樣，家庭裏面的私人飯堂漸漸可以消

滅。但是可惜不久饑荒臨到，他們對於這建設的工作的力量不能不先用之於預備一些「食物地點」以救一般人民的急需。這個問題死了許多時日，直等到一九二三年才又復活。鐵路界首先創舉，他們為鐵路工人辦了許多公共食堂。在一九二三年，五月有所謂「人民治食會」（Narpit）的成立，牠的宗旨在牠的憲章裏明文的規定：「組織模範的企圖，並以借債，出產與用具去扶助所有的合作社與社會的設施；宣傳集合用膳的意義並給與關於這種企圖的組織方法的指導；組織麵包房，罐頭和瓶食工廠；排置出產物的銷路；促進借債的利便；並在全俄開辦支部。」

人民治食會發出一萬張股票，每股一百盧布。這些股份全支分於各行工業，合作社和工會組織。牠在一九二三年的上半年開幕，基金為一百萬盧布。至一九二六年，牠組成了五〇八個膳堂，計有每日開四七八。〇〇〇餐飯的能力。總計在全蘇聯，政府和合作社根據這個辦法組織的公共膳堂有一。二三〇處，自然私人經辦的飯館不在內。平均工人每餐的費用可以分作三種，一

種是二十戈比，一種是三十戈比，還有一種是四十戈比。在牠們之中，有些依照這種的辦法賴以維持，就是：對於普通人給他們價格較高的餐食，而對於工人和本處職員特定優待價格。在去年光景，他們又注重到學校的補充飯食的一個問題上，因為身體查驗示知我們這樣的結果：在城裏一大部分的兒童都滋養不足。所以他們為學校又另開設了一些膳堂，在這些膳堂裏，兒童們可以食熱飯了。在人民治食會之照顧下，他們又設立了一些學員膳堂在莫斯科，總共每日供給五九，〇〇〇餐飯食，價格也不貴，每餐祇要三十五戈比。

起先這些膳堂祇吸引一般的單獨工人們，不過漸漸地家庭也開始加入了。有一個農工檢查委員會曾調查在一九二六年春季在莫斯科的人民用膳的情形，牠宣稱那時的景況還是極不能滿意，因為常年的主顧祇佔工人中的百分之十一，佔所有的人口百分之五零二分之一。這委會又查得在公共膳堂用飯的工人稀少的一些主要原因，那便是：膳堂實在不足以容納多少人數；他們設若到公共膳堂用飯他們反不上算，因為，家



中飯食的費用不見比牠貴，膳堂所定的一餐價格有時竟高至五十戈比；許多的膳堂設備過於不好並且又是不講衛生；周圍又是非常的不雅。說起來，許多的膳堂不過是代替一部分的舊飯店和茶館，祇仍舊繼續從前的呆笨的和不衛生的方法，設備也極不完全和不周密。在莫斯科祇有六間膳堂是施用食物預備的機械方法，至於一大部分的工人膳堂都是苟延殘喘的呢！

這個運動的緩進，還有一個有趣而且實在的原因，這就是：多數的俄羅斯婦女十二分的不情願廢棄她們自己家中的爐竈——雖然這好似是奴隸的符號喇！這就是許多集合的試驗不幸而碰着的焦石。在這裏又曾有關「俄美聯莊」的一件事，這足以表示他們介紹利便的家務組織方法的非常困難。起先美國人單佔一座大樓房，他們辦了一個公用的廚房，自然連帶着膳堂和其他的家務瑣碎，他們為應一切的便利和一個好用的集中的廚房，還不辭勞苦地去改造房屋的構造和設備。後來這些美國人遷移的時機到了，他們就把牠歸還俄國機關，他們想着那般俄國朋友能夠得着這樣經濟的

住所，一定很快活的。誰知一起首沒有半個人想搬進去。到後來經一番的勸說才有幾家肯搬入，可是一個星期之內，裏面又大改造了。有兩家在自己的房裏築起大竈來，其餘的家眷都擠在廚房裏，自己做自己的飯，預備送到自己房子裏。

在莫斯科的人民治食會總會所，我有一次見着牠的總幹事微靈欽(Vilenkin)。他懂得一點英文，但是他非常熱心，賣盡九牛二虎的力量從事於翻譯那在歐戰時「臨時軍艦會社」為千數的船廠工人治食的一個大試驗的報告書。

「你看看這表，」他對我說，「你能替我找些關於美國工人的治食工作的書籍嗎？貴國有沒有關於「兒童飯館」的出版物？我想你們那裏一定有許多的新方法若是我們效用了會發生更大的利益的。」他說着把我領到一間華麗而且設備完善的實驗室，有幾個靈敏的衣白圍裙的工人在忙着於一些表記，試驗管，和天平度尺之中。

「我們，」他說，「在這裏化驗各個膳堂開出的飯食。他們每天都把菜目的樣物送來備驗。我們這裏就細驗

這些食物所含的原質的均抵，熱力的價值多少和牠們的潔淨與否。根據我們所得的結果，我們發表訓令和給他們預備菜目的建議。不時地我們有稽查員到各膳堂裏巡察，看看他們是否遵照我們的訓令做去，並勵行我們給定的規則。」

他跟着跑到食櫥旁邊，拿了許多許多紙章出來。這些篇幅全是些關於規則，熱力單位 (calorie) 蛋白質 (Protein) 炭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s) 和脂肪 (fats) 的。

「在過去世程中，俄國差不多沒有注意過食物的質料的一件事，」他又申其說，「我們甚至於有這樣的俗語：『腹不是鏡——你往裏裝的東西是再也看不見的。』麵包和羹湯是我們食物中的主要物件。「生活素」的重要一直沒有多少人知曉。現在我們既經歷了這許多年的惡運，特別應當注重人民健全身體的建設了。這件事的成就惟由依照科學方法設備完善的廚房和膳堂才能達到目的。在多數工人家中所吃的食物雖然很劣，但是我們要使他們除去他們老習慣非貢獻他們一些很可滿意

的食物不可——不過這件事我們還沒做到呢！此外，還有一件事很當注意的，就是：工人所吃的食物對於生產有莫大的影響。從我們的調查中，我們已找着，俄國工人的生產能力比別的國家的工人的生產能力低少的主要原因是在其中的一個就是飲食惡劣的原因呢！]

這人民治食會組織了一個「科學食物理事會」。這個理事會的工作是攷查並建設：由滋養方面和味道方面着眼的食物產品的最適合的變用；購買，保存和預備的方法；那根據各種不同的工作所需的菜目和規則；各種膳堂的詳細事務；設備廚房和別的房屋的方法；餘餐的利用；以及關於羣衆治食問題的科學的和專門的材料的表列和刊印。

因爲得有相當訓練的人材的缺乏，人民治食會便與莫斯科大學商議完妥，在後者的生理學系加一門飲食的衛生學。這個新辦法的試驗開始以來總算得滿意，學生們現在學了這一門功課，在夏天便到外面實地去練習。此外，人民治食會又另自開辦一科，課程的內容包含：衛生學，飲食生理學，勞力的保護，黴菌學，會計

學，「社會治食」的經濟與專法，公共膳堂的和廚房的組織與管理，食糧的預備和烹調之方等等。

人民治食會的工作又不祇限於本問題的科學化與專門兩方。他們深感着用飯的環境足以影響到食物消化的易難性上，所以環境逾可嘉，逾舒服，則男女離家出來吃飯的時期就隔到越快，越近。在人民治食會裏又有一個特設的文化科，這一科是處於一位共產黨員莫盧發（Mo'rova）的領導下。牠的工作是宣傳，訓導，組織，並鼓勵社會方面的公共伙食。關於這一層，人民治食會復而鼓勵並扶助在膳堂旁邊添設一間閱報室的組織，簡單地預備些報紙，雜誌和書籍。牠又建議四壁應懸掛富有宣傳性和美術性的張貼；應有特別展覽的舉行。在這小圖書室裏常常應有講演，電影，音樂會和班課的舉行。牆報也是鼓勵的，這些牆報極歡迎用膳的主顧和辦事人員的捐助。許多膳堂通訊員（Stolkors）的團體業已組成了。牠又給這樣的忠告，就是：組織特別委員會到別的工人中鼓吹，並招引主顧；更組織一個機關做通知和法律詢問的事宜，另預備一塊黑板紀載最近的新聞

消息。在莫斯科的人民治食會的一個模範膳堂幾乎擔負上述一切的活動與事務了。其餘的則成績不等，或至沒有甚麼成績可言。

現下在討論中的問題是到底採取設立分開的膳堂各膳堂連帶廚房，還是設立一間中央「工廠廚房」由牠預備伙食送到各支膳堂；二者之間，那一個辦法更為滿意。這上述的兩種辦法業已實地地試驗過。人民治食會的工廠廚房給獎展覽會已在伊凡諾夫，佛茨尼仙斯克舉行。在大工業中心地方，工人集於一縣的以萬計，假若每個工廠分設幾處膳堂似乎太浪費了。這裏有地方工業的和社會的機關，共合十七處牠們已連合起來，為這個目的籌出修理和設備一座大樓的所需費用四〇〇，〇〇〇盧布。

這寬大的廚房燦爛着機器——不可思議的機器——在洗滌切割蔬菜，研磨肉類。在日常預備的一百以上「浦得」（每一「浦得」約等於三十六磅）的蔬菜，祇需用兩個工人便足能辦妥。一個廚子很可以看管五個大蒸氣鍋，同時還能作別的事。髒的碟子可以由膳堂的一個

窗口送到旁邊的一間小房裏，這小房裏專設置洗碟機。用這副機器一個婦人就可以做完幾百個婦人分開做的事。這廚房的空氣很流通，光線也好，潔淨一層，自然更不必說，更能完全脫離油氣，怪味和攪攪聲等等的劣點。靠着廚房又有幾間房子，這裏面設置涼熱兩種的灑浴幕為廚子們和別的受僱者用的。

每天預備由四，八〇〇至五，〇〇〇餐飯，祇用九個廚子和二十個工人，他們工作八小時——均算起來，一個廚子擔任九三〇餐，比之普通人民治食會的膳堂每個廚子平均擔任二〇〇餐的，節省了多少？和這工廠廚房直接連貫的大膳堂每日至少供給二，〇〇〇餐飯，其餘的由工廠廚房用保存熱度的器皿送到各個工廠膳堂去。因為怕食物送到已經全都冷了，所以他們才特由德國購運一批暖器(ther Mose或稱暖箱)。計算起來食物的一次轉運，祇減失五度熱，因為假設食物放進暖器裏的時候是九十五度，兩三小時之後再拿出來才不過失去八度至十度的樣子。這都有試驗證明的。這種的暖器他們還不認為十分的滿意。現在他們又正在試用

一個俄國人發明的新樣物。如果試驗的結果認為圓滿，那末，他們將照樣的大批製造。他們今年又拿一種俄產和外國換一些洗番薯機。但是他們的願望仍是願望，蘇維埃的工業還不十分發達足以供給一切本國所需的用具，所以人民治食會又由外洋訂購五百隻暖器，並且預備出二〇〇，〇〇〇盧布做爲工廠廚房購置傢具之用。

在伊凡諾夫，佛茨尼仙斯克的工廠廚房所開的伙食分爲三種，就是二十戈比，三十戈比和四十戈比。我有一次也在牠的分支的膳堂裏用過一餐極美滿的飯。一起首是開來一碟美味的焗番薯——上面稍微有點肉但是肉汁很多，底下是爛爛的番薯，熱噴噴地由暖器內取出來——還有茶和黑麵包。周圍是非常簡單，有幾盆花草點綴點綴，滿擺着小棹子——大概是爲四五個人的——棹上鋪着油布，每一餐食畢都小心地擦洗。刀叉和匙子要自己去取，你先須到櫃台告訴一句，同時把這些食具領到自己的棹子。吃完你須把他們給你的單子和所領的食具一起送還到原處。



這工廠廚房是一九二五年三月開幕的。在四月的一個月裏頭，牠供給了六四。七一八餐飯食。本年的十月牠供給了一五〇，〇〇〇餐飯食。到第二年主顧增了一倍。開辦以來雖然費用了大約五〇〇，〇〇〇盧布，但是祇有兩年的時期他們竟能收回償還金六〇，〇〇〇盧布，並淨餘一〇，〇〇〇盧布為擴充的事業。在諾弗哥羅(Nijni Norgorof)同樣的一座工廠廚房也建成了，並且在端阿流域和聶伯佩托羅夫斯克(Dnieperpetrorsk)又有些正在起始。現在我們無論由取得物產的經濟，方法的機械化，「一般的費用」(註一)的減輕，衛生情形和工人情形的促進等方面着眼去，所得的經驗都這樣地告訴我們：工廠廚房是比較私人膳堂的純粹地自備飲食更為滿意。

一九二七年，人民治食會在莫斯科聚了一次會議，他們對於他們這一方的工作嚴厲地考究牠的缺短，並議決此後加倍地努力於：一般的費用的減輕和飯餐價格的減低兩項事務上，因為刻下俄國的工人要將他們工資的一半花費在飲食上面，那未免太苦了罷！



[註一]

「一般的費用」原文為overhead cost。這是為別於「特別的費用」Special cost而言。若以商店為例而言，伙計工錢和舖租等等為「一般的費用」；為某種特別貨物的購入而支出的為「特別的費用」。

## 第十二章

# 將來社會的建設

這是毫無疑問的，在俄國，那生活新方法正在長毛換翼時期的地方，家庭的範圍因之而逐漸縮小，牠的社會的重要也因之而逐漸降低，同時這集合的單位帶着牠在一個社會和文化生活富足的社會裏所能貢獻的又出來在一點一點地代替家庭的地位，而且最要緊的是牠將在過去程中綑綁婦女們的界域擴大至於無限量。今日家庭的重要祇不過是在未來的公民的生育和

訓練所需的相對的穩固一點上。至於家庭保持牠現在的功用到若干時間為止是並沒有定數的；不過這件事完全是以國家有無充分的能力去處理牠為轉移點罷了。

既然事實方面家庭是在傾向於集合方面了，我們立刻要發生的問題一定是：由這一次的改革，個人的所得和這正在發展中的集合始終是否比那古代的家庭關係貢獻與人民的福利更多更滿意？要解決這個問題，那就不能避免考查俄國生活的面面，因為這集合單位沒有一處不影響於生活的。我們當然不能麻麻糊糊地按照一日所見的情形而為斷定。在舊日構成那生活情形的一切原素，近代的歷史以及所有計劃的事項都須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先，深加以考慮。

蘇維埃政府受了這共產黨黨綱——就是根據牠，蘇維埃政府所以能奪得政權的——的委託，之中一段是：「介紹社會的與生產的方法的已有成劃的組織所以保證社會中的每個個人的福利和他四圍的發展。」土地私有權的廢除，富源和實業的國有，統一的經濟組織，

實業與農業的密切關係，和他們國家仍是近乎未開化與未發達的事實，以上這些條件特賜俄國其他國家前所未曾有過的一個好機會，這便是：她可以將她自己將來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構造，預先清清楚楚地作出進程的圖樣。

他們爲達到這種採用預計的目的，的確有了稱爲「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Gosplan)的誕生。自成立以來，牠的工作完全是在使各種工業佔在同等地位的一事上，換言之，就是設法防禦某方的發展對於某他方有侵害事件的發生。表面看看，好像這委會並沒有多麼大的任務，但是事實上和理論上，毫無可違地牠在將來社會的發展上漸漸增加牠的重要。當牠從事在這個問題的解決，並且面對着各個小社會的互相關係和牠們各個倚賴的工業，農業和轉運的發達等問題的時候，牠便自然而而且不得不然地要走進區域畫分的計劃上。這不特關係下列三事——巨大的水電力應在力大的源本地方安設，工廠應離原料的出產地接近，貨物的合宜的流動，而且(一)逐漸剷除那壓制束縛人民——千千

萬萬人民——的那些實業大瘡瘍；詳言之，就是使人民不能享受：相宜的和衛生的生活景況，充足的飲食供給，或是，常例的家庭生活或隨便其他的生活的所應有的住所地位和休息，與(二)新社會的發展——混合並調和工作與文化，城市與鄉村的美點。

他們現在祇就他們的工作大綱的頭一步。在目下的城鎮和新社會有許多樓房的建築進程都不是依照刻下需要而計劃的。他們的障礙物不祇是資材的缺少，而且不幸有「紅帶尺」(註一 (red tape) 與官僚政治的參入。考究牠們二者參入的原因則無非是僱用舊日的工程師和專門家的不能避免的需要，而他們這般頑固的人們又完全和新制不能表同情的。他們又走到進退兩難的十字路上；到底是向暫應危急的恐慌方面工作去，還是按着一個更能耐久的計劃建設？關於這一層，我們用建築住所一事尤能表明這個道理。建築住所的方針祇有兩個，一個就是依照價廉的暫時的構造辦法，一個便是根據較永久的那種禦火的建築方法，這前者只能暫應急需，而後者却適宜將來社會的組織，按這個情

形，他們應怎樣的選擇呢？但是事實上總是前者勝利的了。他們努力消除浪費是不錯的，可憐他們這種的努力本身又不免有浪費。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極明顯地看出俄國今日需要改革牠們——這些舊生活方式——的事實。

他們向界域計劃的方向動腳的第一步實際步驟要算是幾年前全國的重分區域了。這一次的分法是根據經濟的條件的，而不是依照他們從前界分政府行政單位所採用的獨裁的地理分域法。後來他們發覺這種建築的方法太麻糊了，於是在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底下加組一個機關司理統一建築的事宜，但是由這個機關才又發覺他們的建築大綱並不苦於計劃的缺乏，而反失之於過多！單說莫斯科一個地方在三年之間竟有五千份關於工人住所計劃的投稿——這般多的幾乎相同的計劃簡直沒有那麼許多時間和力量去一個個地細細看牠們了，因為限於資料，計劃這種簡單的工人住所差不多不能有多少的選擇。但是有幾個組織嘗為這件事情紛忙地競爭。國民經濟計劃委會便邀請不祇關於住

所有明顯的關係的一切組織來開一次會，並請國家經濟最高理事會(人民工業委員會)，農務部，鐵道及水路部派代表參加。

這次會議的大部是側重在建築與城鎮計劃的一些專門問題。內中有一件事很可注目的就是一個個的發言者全先後一致地提出這件事實：他們不能再仍把他們的計劃限制在某座或某幾座房屋的建築上，再者，計劃不特應為全部分而且要為全區域地方設想並且混合所有包括在一個區域的要素。

雖然有些人以為全國的標準的計劃可以在莫斯科立一個中央機關規定出來，又有一些人主張不能作出任何的標準計劃，因為全俄各處的天氣的，社會的與經濟的情形大不相同，但是大多數的意見已是贊同下面的辦法：某種關於地的面積，光線，空氣，衛生等事的普通規則可以照他們經驗所得在中央規劃妥定，把材料排列的詳細規定讓地方自己籌謀，或是由地方按情形酌量更改。結果，國民經濟計劃委會頒布一種臨時的新社會計劃與建築的訓令。某個新社會在未着手建



築以先，應依照訓令的條件邀請工程師，醫生，農學家和建築家各一，到這個打算建立新社會的所在，作一個第一步的測驗。在任何的計劃以前，所有關於土壤與天氣，衛生關係和四圍地界的情形等都要先加攷慮，此外，還須先決定這個地方的水源好不好和一切病症瘟疫的根基的剷除。訓令又明文的規定：每一社會至少要有一處大的公共體育場，一處會所，許多的空曠地，許多公共花園，公園的面積至少要有十分之一用作「青地」，並且每五十個兒童中應有遊戲場一處。單是房屋不准超過全地的四分之一，並須依照這個統一的計劃建築——設若有些房子是建成彼此的牆壁合攏不分的，在全地不准超逾四座這樣的房子或是十六所房的數目。所建的房屋不准超逾三層樓，不能高過街道的寬之十分之九，並且要建築得非常得法，保險所有的居住者們都有充足的熱，光和空氣，同時不致侵害旁邊的房屋所應有的這三條要件。對於房屋的面積大小，禦防火險的方法以及廢物處置的辦法都有規定。訓令又主張天然美和有歷史價值的地點的保存。牠建議的房子共

有三種：(一)私人居住的房所並分開的家事設置；(二)公共家事設計的住所，或是單人的公共住所，還有這不可少的(三)爲行政的，文化的和衛生的目的建立的公事大樓。

關於計劃一節，莫斯科省政府規定得更形詳細。牠要算是最先進的了。莫斯科蘇維埃命令在本省的一切建築，必須遵照規定的計劃與章程，頒布關於在本省所有的新城及新村一切的建設詳細標準以及關於現已存在的城村依照原來的計劃改良牠們的特定的計劃。單有一個特別委會司理莫斯科的計劃——舊房子一點一點地拆毀使街道可以擴大，同時不忘保留一切賦有歷史價值的和天然意味或美的房所與地點。增進公益的計劃必要增加許多事件的機械化，但是他們又作擴允許多空曠之地，公園與遊散場的準備。每城要劃分爲若干道，中心專爲行政的和商業的設立與旅館，第二道專爲縣設立與醫藥的，科學的和文化的機關。至於莫斯科的郊野還是真正俄國鄉村的模樣，這裏並沒有一間大樓房的建設，所以在這一部分最易於依着新計劃與

辦。有許多人提議將這一部分的地方蓋成最模範式的樣子並把一切工業的企圖排在更外的道上。

國民經濟計劃委會業已鑄出全俄城市計劃的初步計策了。這計策的序內有下列的一句：「每個城市必要有個通盤的計劃，持着經濟的，衛生的與文化的最十全的景況的創造為牠的目的。」這計策中並包含一些訓令——一本着改良的觀念作現有城市的整個的調查測驗和關於新城市的建築的訓令。假若這個城在經濟方面，文化方面，或是其他方面與鄰縣發生密切關係，那末，他們更要根據較大的區域設計，務使牠們彼此連貫一致才行。

這是敢下斷言的，祇有根據上述的新社會的和這上述的計劃的發達，我們才能斷定將來家庭的確實形式；在這種生活裏，人民才可以自由選擇他們所欲的生活方法，而不是聽經濟的景況硬硬地壓逼他們，塞給他們。刻下的混亂擁逼的生活業已破裂不少的家庭了，因為他們不能逃避這種不自然的和歪扭的景況唯有放棄全家，在他一方，又把許多素不相識的人們頂不自然地放在一起，因為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居住了麼！但是現在

他們可以見着一點光明了。當刻下的住所恐慌解決，並新式的社會發現人間，那末，那些想住在一塊兒的家庭不是很可以隨願？同時又得着居住在適宜的情形之下的良機了嗎？在他一方，那般不自然的不好受的同居者又可解除壓迫——無論是經濟的或社會的——用不着仍繼續住往下去。大概許多年代以後有一些家庭不免再要保守他們的舊式，這是無可如何，同時也不關緊要的，但是由目下的趨勢看去，反方的人們一定是日見增多。他們必不再打算繼守這種家庭的約束，並且把從先用在家事上面的時間移到社會的公共事務上。

在國民經濟計劃委會之外，還有其他的許多組織和個人對於這個計劃問題也非常注意。伊茲維斯提亞 (Izvestia) ——蘇維埃政府的公報機關(說是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的)——的一篇主要社評裏，在列舉人口過於擁擠的危險之餘，明白地評說：好像新房屋的建築和開闢水道新源這類計劃無非是推託的消極的辦法罷了，但是現在我們應當快作的是澈底地整頓人口流動的本身問題。「有計劃的規定，」這篇社評紀載着，「並不

指一個臨機應變的暫時特設的計劃而言，乃是一個準備長時間費用而已仔細考慮過的制度。這個制度還要能消滅大城市速增的原因才稱合格。」

著者隨後又述明一點。他說：過剩的勞動力現正泛溢到城裏去，牠的速度比起戰前要快一倍的樣子。他又說：救濟這種不祥的現象最適宜的方法便是把牠們（過剩的勞動力）吸引到別的地方，而且很可幸的，刻下已有這種運動的動機了。這些運動我們可以略舉幾個，例如：新收成方法與改良的耕植方法的介紹到鄉村去；農具和機器的分配，這樣農人們便可在那些能耕的地方多種植一點；農業集合的組成；在鄉村某種家庭工業的發達；無人耕種的土地的收回國有（在蘇聯約有四分之一有奇的肥沃田地現在荒蕪着）和人民往稀少地方移殖。

在上述之外，還有一條要件這位著者深信的，這便是：工業的分散。現下一切的工業幾乎完全集中於大城市和某幾部分地方，但是這不是所希望的，牠們將來應要發達於小城鎮，甚至於鄉下的地方才好。「這件事，」他在結論說，「要引我們入到一個問題，這就是：依照

全國的經濟狀況的利害怎樣地分配工業及於蘇聯各處？關於地方工業發達的需要雖然有了許多的討論，這種的討論現仍在增加；而且對於政府田地的農產的製造企圖，他們也已然採取了步驟。

我們現在試考察他們對於拓殖新地的事業進行得怎樣？有無依照某種的規定計劃實行？這些是很值得注意的。我們先大體的看去，在俄國因為收成不好或是田地太少的緣故，從來已有農人們離去故鄉，常常一批由這方搬到他方的事情。固然內中有些是因政府的命令，但是政府也沒有確定的計劃，祇是以應某種的政治原因罷了。多數的遷移還是農民自動的，他們或是個人地或是羣地離棄故鄉，乘着布蓬的車輛在曠野上遊蕩，直等到遇着相宜的地點才打住。在饑荒過去的那年，我們可以看見成羣集隊的人馬——襤褸的憔悴的人們和可憐的祇剩皮包骨的馬匹——由東方遠行千里的路程，向着他們離了十五寒暑的薩麻拉省（Sarmara）的故鄉而來。這個地方一直是擁逼得很，這一次他們回轉來還是因為謠言所致——說是自饑荒以後這個地方人口少

得多了，好些田地沒有人去耕種呢！其實那裏有這樣的事，可是許多人信以為真，頂歡喜地回來了。現政府看着這樣總不是事，於是設法停止這種無目的的移動，同時牠將那般在田地饑荒的縣府忍受痛苦的過剩人口原本的情形調查明晰，好按他們的原本的生活分與他們在別處的合宜的田地而不致讓他們感受新情形的不慣之苦，並且這種移動的分配要能和大體沒有損害而有益處才為合格。總計在俄國比較人口稠密的地方，那些應照上述方法處置的過剩人口約達二千萬，依着他們的計劃是在這未來的十年之中至少把本數的四分之一處理妥當。那些將要開闢的新地，他們滿去仔細測驗了，對於那般準備作殖民的給與他們詳細的指示了。有些地方，還有小的博物館之組織，在這些博物館裏面陳設些各地的土壤，植物以及每個農人在未搬到他打算去的地方所願先知的一切樣物，很公開地展覽着。這般殖民更有其他的優待。他們可以得着借債；初遷到的幾年免納國家的稅則；而且為這些新社會，政府又給籌備所需的行政的，經濟的，醫藥的，教育的和社會的等等

設施。在上年所辦的拓殖事業，頗稱滿意，因為牠們全是按着上列計劃實行的。在上年殖民返回的祇佔全數的百分之八九——極少的人數。他們得到這樣的結果，當真利用這個拓殖新地的辦法來促進社會化的進程了。至於家庭情況的解決，經濟的關係竟影響鄉村比城市還厲害。家庭的束縛不能不解脫了，因為有些以田地的不足離鄉奔往他處，又有些以工作者的不足，家庭添入幾個外人。實在，土地的一個更合宜分配必給與農民，男的和女的，對於他們自己家庭生活的一個更自由的選擇。至於那般自然而然要破裂的家庭也不要緊，他們要再成新的社會結合，猶如反掌一般，因為在開闢新地，許多有同類的習慣和經驗的同情的人們在一起工作，實在，在這種的新社會裏頭介紹社會的組織比在從前的舊情況之下，容易得多。

由外表觀去，我們祇好說俄國鄉村的改革仍是不多。建築的計劃，多是集中於工人身上，這些稱為社會化的進程在農民中也進步得很慢。一些合作社，互助委會和文化的組織都是為預備這個將來的重要物件，即



說今日也在鄉村的工作上佔據緊要的地位，祇是牠們確對於農民的實在家庭生活沒有施以多少改革。包括在農業集合和公社的人數不過等於鄉村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但是，年復一年，這種團體離開他們僻陋鄉村的日多一日，並且看現在的趨勢，好像他們是在打破這些舊有的鄉村而從事於建立較小的，更便利的勞働單位。

剛在命革之後，政府已曾鼓勵許多農民在原有的土地上組織公社。但是這種的遷渡比起本來的老式的個人生活方法未免於太急促和改得太多，所以許多的試驗失敗了。在這個時候，我們又發現其他的一種集合的農業在不斷地展着。這運動起始之時正當那農民在他的最忙的幾個月，正感覺他的田莊和往所遠距的困難。後來，他麻麻糊糊地建立一所茅舍專為夏日之用。過些時候，他又聽得一件政府的消息，說政府要為一般自願合作生產的農民，準備一些田地，在這個地方，甚麼都是很便當的。但是他想自己那裏有這許多銀錢去建築一所新屋，永遠搬到彼處，而且農民們全都是不慣

於孤獨生活的！於是他便與其他農夫們聯合起來，他們共同組成一種集合，那就是農業協作社。這種的集合的發達程度各地不同。簡單地可以把各種的程度分爲三級。有些農民仍是住在鄉村的老家，祇是共同耕種某一大塊田地罷了。第二級的是在田地的附近建立幾間粗劣的房子，他們輪流住在那裏。最末地，建築新房屋，設立新社會。

我們應當知曉這整個的集合的運動是俄國革命後關於她的農業的最重要的發展中的一個。這集合的運動已被卡爾·波德爾斯 (Karl Bordes) 在他所寫的關於鄉村的一本書裏面敘述殆盡。牠(集合的運動)不但是關於農業至重至大，並且是關於農民家庭的新生活方法的發展至密至切。但是從來對於這個運動所採取的計劃不外於純粹的農業方面——土地的分配，債務和機器的供給。他們對於建築和新社會兩方還沒有計劃。不過現在他們也將注目到計劃組織的價值了。關於在某單位的土地應給多少個人民才是最能致效，對於這種發展那類的房屋最爲合宜，因機器的改用，人工的過

剩問題，和工業企圖的介紹這等等的問題都已有確實的攷察。由社會方面講，牠們還是太孤單——竟在鄉村固有的社會利益也消除殆盡。這是有緣故的，因為牠們還是太小，太窮，還是在他們的前鋒時代，還未將最適宜的經濟組織考究出來所致。在任何關於將來發展的真實的計劃成立以前，他們先須多多地積集經驗確實地把問題全體解決。這是老實話。等到能沿用於所有的集合單位的計劃成形，那個時候，牠們必定比舊鄉村貢獻更多——多得多——的社會組織的機會。

此外，還有一條關於建設將來的村社會的要件，那便是政府田地。牠們是在一些舊境地設置的，設立牠們的用意就是給農民知道大部分用機器的農業所得的利益，給他們看看這個榜樣。這種政府田地的效力總算不小，那些工業組織的進化的思想賴牠們得以輸入鄉村。牠們的地位就如農民的職務中心，讓他們常常與這些較進化的組織形式接觸，牠們以後必要成為鄉村的社會引火線。牠們又指示另一種新生活的道路，在這所說的新生活裏面農民仍是住在鄉村內，但是要跑到那大

片田地耕種就如城裡的工人在工廠一個樣子，他所能分得的利贏和他自己經理一切所能得到一般的多，但是工作的情形比自己所能設備的好多了。

政府在這許多發展當中，對於集合組織的紹介所取的態度，曾被在住所設計會議的一位發言者敘述得最爲透澈和準確。他的話是：「我們應當爲達到集合形式的過渡時期奮鬥，但是我們要思慮人民的舊習慣和他們對於個人形式的原有態度，並謹慎地從事集合化的介紹。在十年二十年之內，我們真不敢斷定我們將採用那一種的形式。」

既有計劃與機械化的增加，他們不等地臨到科學的組織，大批生產和規定準則的問題了。機器見得越來越多，好似是製造全個人生的一个大刀。牠是在把那些使全村在假日華美的家製布疋驅逐到一邊，在把那些使旅客愉快的粗木碗和匙子驅逐到一邊，在把那千百的奇形美景會是好多世代以爲美術與詩詞材料的完全地也驅逐到一邊去。有些人責貶這「機器時代」，有些人罵詈共產黨好把這許多給與人生美的觀念和滋潤的東

西剷除。但是，那些古董雖是好看，牠們有一方面不可以忘記的。這些家製布疋代表一切魚肉婦女的事情和她們在家看孩子的辛苦——因為從前這些虐待全壓在她們身上。要是有人站在一個農婦的旁邊，看她在那死水的惡臭當中洗弄，扱打和斫斷那些大麻；工作的時間是足以使她腰骨痛得要命的那般長，或是看看由大麻搓成細線的那種耐煩的手續，在頂黑漆漆的小草廬裏紡，織，這所有的人工的耗費結果不過是幾碼布疋，這點東西要在工廠做簡直不當事的——等到看見這塊布成材了而洞悉在成材進程中的醜陋——那末，這個人對於這塊布——華麗的布——也多少失去牠的美麗了。

但是在舊俄羅斯的美——現已特意毀滅的美——並不是他們的自覺的產品。舊俄的景緻特賦的一種豐富的，野蠻的美就好比是日落時刻在一個狂風暴雨之中所見的生野而雜亂的美一樣，強烈的顏色好比是讓一個小孩子給塗成的——海盜的粗暴莊嚴，與東方的空虛豪華，和拜占庭 (Byzantine) 的曲線，色彩混合一起

就成爲我們所知的俄羅斯美術的背景。俄國城市的美不在私人住宅可以看見，也不是在牠的那些散漫的，毫無計劃的，紜繁的街道模樣中可以發見，而是在那羣衆集合的效果，安排的樣式與年來所得的風味中可以求得。那許多教堂本身已是很醜陋了，再不嫌難看地詳爲粉飾成一間間似球的屋宇和許多太多餘的小十字架子，真不可觀，但是大體說城市裏儘是些有色的屋宇和金製的十架，那倒是煥煥然奪目得很。

邇來在俄國研究的問題是怎樣工業化使能輔助文化和美；他們怎樣便能作機器的主人不做牠的奴隸。設若有些舊的物件應當在今日消滅，必須有其他物件來代其位才行。那種舊的不自覺的羣集的美仍是存在啊！我們試看看某次的公共大會，在莫斯科的街道滿着熱烈的旗幟，舊的美那裏消滅？全國窮困不能不製造大批的黑色皮短衣使工人免得受凍，並製造一些簡花的布匹以應急需。但這不過是暫時的需要。愛惜顏色的種子是早已深種在俄國人民心裏的了。斷非革命或機器所能剷除牠的。

機器介紹到俄國不祇發生便宜材料的大批出產而在此外還其他的意義。機器本身含有剛健的美。牠的胆大的確實的草形可以矯正俄國舊美術所含的曲線。在繪畫，文學和戲劇裏全都添入一種「簡單」的原素。試驗種類的繁多甚至於沒有一個模樣可以備為將來社會的標準。他們在紛忙着介紹新事物，他們也在保留舊事物中的善良的。在一方面，我們得見邁爾和爾得（Meyershold）在奏演新奇的著作——一些有節拍的集合動作，和關於他們的集合英雄等等，在他一方面，我們得見「小戲院」（Little Theater）還依照那好的老式方法排演古劇，與「美術」戲院和牠的美術室還在拿名着的個人動作，吸引感動堂堂的觀眾。

機器的精密現正把秩序和計劃的需要擺在俄國的路前。在像有這樣不進化背景的俄國，一旦遷移到機器時代，他們一定要脫免，也實在可以脫免，踏踐那許多在別處的機器發達及於現代程度所經歷過的謬誤的覆轍了。他們處在這個保險地位，又加上他們的工作大綱的性質，那末足可以預防像「大道」這樣沒有意思的東西，或是像「紐約」這樣殘忍的發現，再在將的來俄國產生。

最末，在機器化的呆板和無味之外，更有空前未曾有過的將藝術引入生活之中。這一件事由三方面着手。第一：收集個人保藏的古代的藝術寶貝使爲人民公共的財產；博物院的建设 and 舊樓閣的保留。第二，開發個人藝術的表現的機會，或由學校，俱樂部和戲院擔任這種的事務。第三，那般革命派的藝術家——「建設派」——努力發藝術的新意義，直接地振發人民的興趣。他們（這般藝術家）深信世界上沒有「純粹美術」這件東西，一件東西的美就在牠能適合牠的本來功用罷了！他們深信在近代的世界已沒有「畫架子」的藝術家（指純粹藝術家）的地盤，在這個時代一個藝術家應當變做一個技藝家或工程師，他也要從事生產工作，並且要給衣服材料，家具，房屋，俱樂部和城市等等事情設計的。

阿拉圖夫 (Aratov) 作了一書叫 藝術與階級 (Art & Class)。作者在這本書上面敘述這般人的哲學要如下面的幾個字：「促進一個美的生活而不祇要反射牠，並且掣藝術做生產的引火藥，按照人民生活的資料將人們的集合單位所有的富裕轉爲社會的有用事物——



——這真是「善哉斯言」——無產級級所值得做的。」

雖然這個運動有時領導人們去建立那些灰黑而粗糙的房子以爲是表現實利派的哲學和無產階級的精神，有時牠却引領人們至那種巧詐的城市的奧妙莫測之計策——懸空的側道，曲曲折折的地道運輸，那種新奇構造絕非今世所建造的所能與比，你要去甚麼地方祇要按一粒機關鈕便可以把你送到；是的，雖然有時這種表現過於極端，甚至於似乎反叛的樣式，但是無論怎樣，牠確給與那般藝術家——致力於使用他們的天資爲社會的利益的艺术家們——一個新的動的工具。從前的「畫架子」的藝術家當中，有許多現在在織工廠裏給作線條的花樣，有些在作訂書的圖樣，或是家具的樣式，又有些在給人民俱樂部和一些遊藝室跟養病院設計。他們在設法使戲院成爲求得更完美的人民和創造新的社會制度的一個有力的工具。宣傳，是的——不過是屬於要得到情感的創造的宣傳，不是要那種消極的降服。在普盧利科爾特 (Prolect) 戲院，他們竟要把男女工人藝術化了。他們把戲院立在工廠裏面，就在機

器和汽爐的房邊做起戲來，這實在是好玩，可以說是工業戲劇化了。在這新戲台之上，再沒有演作一兩個英雄的得意事，而是他們全體本身參加。現在參與的人們越來越多了。革命慶祝的假日變成戲會，工人全體加入。我曾親眼見過在莫斯科的一次慶祝，在那天慶祝日，一切的空場地方滿是啞劇或戲劇的排演。對於他們，詩歌和音樂是他們連帶的生活之節拍。這些音樂和詩歌，必須是革命的形式和內容，可以連結人民的感情，並把他們鼓動起來大家都自然地動作。是的，在電影之中，他們也得着解釋和鑄作新生活的無限之機會。

我有一次遇見一位女朋友伊利那，善米安娜華 (Elna Semionove)，他是建設派團體裏幾個最先進藝術家之一，年幾約三十，氣色很光明。她曾被委任為革命第十屆紀念會佈置「赤場」(Red Square)——一件很榮耀的事情啊！她對於這新藝術的一腔熱血比起她的那些在農工婦女部裏任公職，較有政治頭腦的姊妹們，實不在以下。她將自己為工人俱樂部，圖畫館和膳堂等所作的圖樣——許多有意思的計劃——示與我看。

還有一位女朋友。她的名字是斯忒判娜華(Stepanova)。她在革命開始之前就是預備作未來派的畫家，等到革命過後，她轉而給織工業設計，司理幾個戲院與工人俱樂部裏所需的戲衣，她又是邁爾和爾得的一些劇本所用的新佈景的創始人。現在她在作電影的導演。我問她：她以為女藝術家在今日是否比在革命前得到較好的機會，她毫無躊躇地答道：

「自然啦！在從前人們都有性別的問題，對於婦女有特殊的觀念——現在只是天才的問題——現在可不是這樣，我的丈夫與我是有同等的機會，而且現在許多婦女可以發展她們的天才。在舊時則祇限於富裕的人們，尋常婦女是絕對沒有這個機會的。」

雖然現在破天荒地有女人入走藝術的田地來，但是在這藝術世界裏面並沒有聽見多少著名的女藝術家的大名，這是甚麼緣故呢？沒有別的，就是女藝術家，除了那有數的幾個賦有非常天才與非常能力的之外，都祇能倚靠她們所在的地位與她們所有的自由以發展她們個人的天資。是的，現在婦女參與藝術界還沒有多長

的歷史，這種影響大概不甚容易辨明。我們知道的，要使才子充分的啓發他的或他的創造力，必不免先需要他人的一些犧牲，而婦女却從來不能求得這種他人給與的犧牲。一個男子能夠犧牲他的家庭，他的朋友們以及他的全生，專爲他的藝術觀念或是他的事業，但是大多的婦女却太偏於情感作用，不能離開這小小的家事——這纏着她們心絃的小事——去到外面從事創造的工作啊！這要等到將來社會的組織能夠把婦女的許多舊負擔取將有下來，婦女才能獨自地成爲藝術家了。

我的意志並不是說，在俄國目下雖然有了一個極平穩的計劃，按照牠俄國可以一步一步地建設他們將來的社會，或是牠足以供給人民一切的文化方面與物質方面的需要——不是的，我祇指示她的現存的一些可能罷了！我的意思簡單說起來：就是俄國現在有個機會。關於俄國的重要並不祇是那般人民所夢想的勇敢的吉夢，而倒是她的懦弱的曖昧的許多個人們——賴這般人世界所以組成的——他們一致地努力使這個吉夢實現，他們一點也沒有自欺，他們確相信向這個想像

做去實在是有實現的可能。

我們看看杜洛茨基所說的話：「在人類的過去歷史當中，社會組織範圍內的自覺創造，實在佔據很無關重要的地位上……我們不能硬把新生活的方法造成某種的形式指尖擠挾出來。在我們建設之先，我們要明察現在有甚麼。……請指示我們從革命的爐灶裏已曾取出甚麼樣的生活來。……要把文化的程度提高，這勞動階級必須自己為生活的方法打算……並且我們生活方法之新建設的關鍵又必要是把婦女的家政的奴隸工作解除，用社會方法訓練我們的兒童，並使婚姻脫離經濟壓迫的束縛……」

在刻下雖然這些共產黨黨員們洞悉他們眼前還沒有物質的基礎與人類的根基能依照他們的心願，把這世界的六分之一，在他們的統治下重新鑄造，但是他們至少已在準備那些能適用於將來的模樣的圖稿的一點一片吧！



## 〔註一〕

按「紅帶尺」一名是指一種邁方步的腐敗官僚；他們是非常守舊的。

真 江 御 大  
捐 贈 覽 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177B

1.16.7 6000

柳亞子藏書

No4175